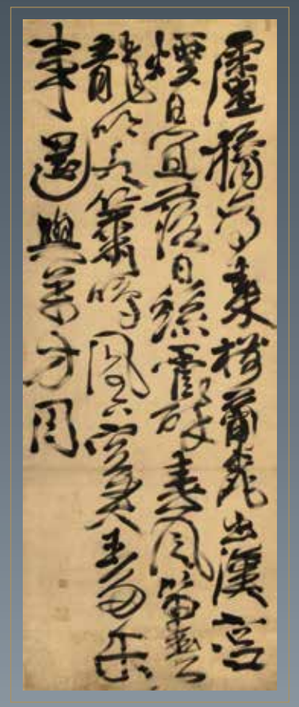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08-3878-9
9 787550 838789 >
定价：60.00 元

绍兴博物馆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SHAOXING WENBO

绍興文博　二〇二一

绍兴博物馆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紹興文博

二〇二一

紹興文博

二〇二一

SHAOXING WENBO

绍兴博物馆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绍兴文博》编委会

主编：何鸣雷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史　霖　李櫹璐　吴丹娟　何志方　何鸣雷

沈一萍　沈方圆　张丽君　金　燕　胡秀苇

娄　烈　董维倩　傅向东

目 录

1 人文绍兴

002 新发现的鲁迅佚简及其有关的绍兴元素 裘士雄

012 陈洪绶丙戌年避难相关史事钩沉 封晓东

019 故址、戏曲及本事诗
——沈园文化略说 俞正来

027 南宋山阴诗人葛天民诗文辑佚 李 娟

033 熊汝霖之伯乐陈则采家世、生平、师承考实
——以厦门出土的陈则采之父陈世准墓志铭为中心 刘 涛

2 史海钩沉

044 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村鲁氏家史口述史拾遗与考辨
杨晔城 斯红军

053 浅谈绍兴书画 史 霖

055 新发现的秋瑾《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手稿 夏汇丰

058 绍兴博物馆馆藏《明拓怀仁集圣教序》的故事 张幸幸

062 再论许寿裳对鲁迅及其思想的传播 蒋玲玲

3 文博论坛

070 博物馆在景区化建设中的探索与研究
——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 周玉儿
076 五百年来一青藤
——“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特展策展记 沈一萍
081 疫情之下博物馆线上传播探析
——以《线上绍博》为例 胡秀苇
084 浅谈绍兴台门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马峰燕
087 浅述“绍锁” 胡关健

4 文物鉴赏

092 绍兴博物馆再添镇馆重器 —— 越王州句剑 何志方
094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馆藏越窑青瓷墓志罐赏析 陈少锋
098 晋代动物造型瓷灯具赏析 许丹阳
101 绍兴博物馆藏明代黄景昉书法赏析 朱文琼
103 何周福抗战时期笔记一篇 申伊欣 何 旷 张 依

5 学术研究

106 绍兴古纤道创建修缮功勋人物考述 周燕儿
121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遗存调查 王鑫君
130 浙江绍兴江桃村东晋墓发掘简报 王 策
136 刘宗周绍兴府城旧居考 张 慧
146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性质及诸陵位置蠡测 雷长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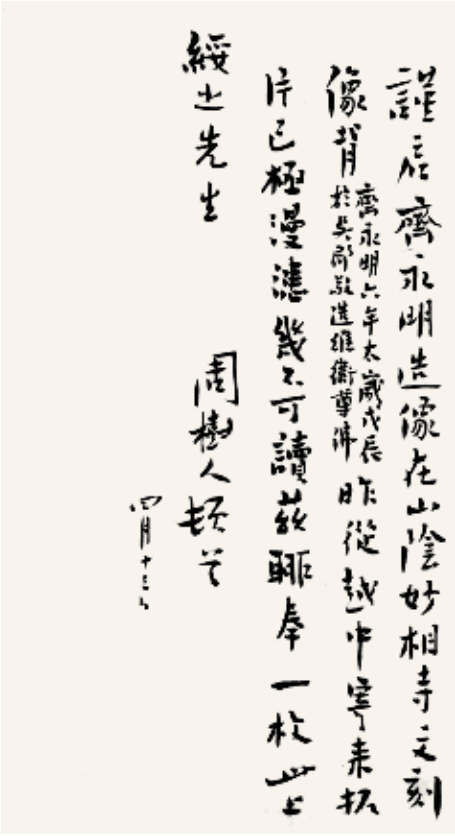
RENWEN SHAOXING

人文绍兴

新发现的鲁迅佚简及其有关的绍兴元素

绍兴鲁迅纪念馆　裘士雄

最近，从北京传来一个好消息，参与编纂《鲁迅手稿全集》的国家图书馆吴密副研究馆员从新加坡藏家杜南发先生那里得以确认，他慨然提供鲁迅佚简照片及其相关资料。令我们绍兴人尤为高兴的是，这件鲁迅文物与鲁迅故乡直接有关。杜南发撰写过《鲁迅寻佛记：1915年周树人的维卫尊佛的故事》，吴密也发表《新发现鲁迅致胡绥之书简并永明六年造像拓片考述》一文，甚为翔实。笔者拟在此基础上再做些史料补充。



周树人1915年4月13日致胡绥之短简

关于周树人致胡绥之佚简概况

据杜、吴两氏提供的数据，周树人致胡绥之佚简高23.5厘米，宽12.5厘米，直书，计五行七十二字，原无标点，现为试加。该信全文如下：

谨启：齐永明造像在山阴妙相寺，文刻像背：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昨从越中寄来。拓片已极漫漶，几不可读。兹聊奉一枚。

此上绥之先生

周树人顿首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许多人知道，周树人要到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才首次采用“鲁迅”这一笔名，并以此闻名于世。但为行文方便，周树人致胡绥之佚简不妨称为“鲁迅致胡绥之佚简”之名。

“昨从越中寄来”，我们可从《周作人日记》《鲁迅日记》中得到印证。《周作人日记》载：周树人1915年4月12日致胡绥之短简“九日晴。上午住校，至大路寄北京拓片一包”。其时，鲁迅、周作人“兄弟怡怡”，周作人在水澄巷（今胜利西路）的绍兴省立第五中学（以下简称“省立五中”）任英语教员，还担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教育杂志》（其前身为《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大路，即上大路，是当时

绍兴水陆交通方便，店铺林立和金融、邮电、医院齐全的商业街，与水澄巷平行，省立五中更是近在咫尺。是年4月13日《鲁迅日记》亦载："十三日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四）。得二弟所寄《建初摩厓》《永明造象》拓片各二分，九日付邮。……"翌日，《鲁迅日记》又记述："十四日晴，风。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象》拓片一枚。"十五日《鲁迅日记》则有"夜得胡绥之信"的记载。礼尚往来，人之常情。胡绥之的这封信无疑是写给鲁迅的感谢信。周氏兄弟的日记记载明白无误，是铁证。

至于鲁迅佚简为何流落海外，据杜南发介绍和吴密考证，胡绥之1940年辞世后，包括此鲁迅佚简在内的文物、图书流散到社会，辗转到上海，杜南发在友人为其代购的一批图书中发现了这封鲁迅佚简、拓片，如获至宝，一直妥善保存在他工作和生活的新加坡。

历尽劫难的维卫尊佛及妙相寺

维卫尊佛是南齐石刻造像，系古越一尊稀罕的古佛像，实属珍贵的历史文物。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维卫尊佛是小乘教七佛之首。一生向佛的"老绍兴"朱仲华说过：维卫尊佛很珍贵。首先从雕凿时间看，历史悠久。其刻于南齐武帝（萧赜）永明六年，即公元488年，距今已有1530余年历史，早于新昌大佛（凿成于梁天监十五

维卫尊佛（今藏绍兴博物馆）及其背面的铭文

年，即公元516年）、柯岩大佛（竣工于初唐，即公元627年后）和下方桥石佛（凿成于隋开皇年间，即公元600年后），在江南实属罕见。再从造像背面刻有的十八字铭文看，颇有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鲁迅说："文刻像背：'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人称"留南齐一朝有数文字"，弥足珍贵。近代著名绍兴书画家、诗人袁梦白（天庚）曾吟诗赞曰："南齐石藻翰，压倒东西汉。"第三从维卫尊佛的宝相看，慈祥，和蔼，形象栩栩如生。香火旺盛时，维卫尊佛烟熏持久；厄运降临时，水火、兵燹等种种自然和人为的摧残，让其痛苦得无语。庆幸的是，维卫尊佛得以幸存，且基本完好，故其在艺术、历史和佛教诸多领域极具欣赏、研究价值。

维卫尊佛像背文刻"于吴郡敬造"。为何来到越地？《两浙金石志》载述："汉顺帝时分浙江（今之钱塘江——笔者注），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自晋至陈又于此置东扬州，隋改吴州，又为越州。此南齐石刻而称吴郡，则当时亦有并改之事，为诸书所未载欤？"既然维卫尊佛是南齐吴郡的能工巧匠无名氏所"敬造"，那么，历经近1430个春秋，鲁迅馈赠永明造像拓片给同事、同好、造像制造者的同乡（后人）胡绥之，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美事。

历史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维卫尊佛命运多舛，历尽劫

难。在绍兴，传说这尊维卫尊佛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年间(936—944)，一位法名为行钦的和尚从会稽县东一个废刹前的水塘中捞取的。南宋《嘉泰会稽志》亦载："此石佛既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负而趋者，安知非吴郡所造而迁徙在会稽耶？"吴越毗邻，仅一江之隔，"吴郡敬造"，越地佚名的佛寺大小和尚和善男信女将其"敬请"到绍兴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深究。维卫尊佛出水后，适逢崇奉佛教的辰光，人们重新认识它，礼遇它，敬请它到修缮一新的山阴妙相寺，地点在五云门外的散花亭，也就是《周作人日记》所写的"塘下金"，他多次前去拓片。据朱仲华居士相告：此寺始建于唐大(太)和九年(835)，山门前临浙东古运河，后门快到瓦窑头了，可以想见寺大僧众。绍兴石矿蕴藏量极其丰富，古往今来，历代绍兴人采石用以建房、筑城墙、造桥、铺路、砌坎、垒海塘和避塘、营造坟墓、竖牌坊、刻碑碣、制生产工具和武器等等。寺庙里的菩萨固然以泥塑木雕居多，但在绍兴，人们在柯岩、羊山等地利用残剩的岩石凿出硕大的石佛，所在寺庙统称"石佛寺"。它们与维卫尊佛均为石质，但亦有不同之处，前者硕大，与山体浑然一体；后者体量小，届时可动，亦为旧时庙会菩萨出庙巡行所需。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北宋治平三年(1066)，沿用了230多年的"石佛妙相寺"改额简称为"石佛寺"，并沿用至清代。羊山石佛寺的名声渐隆，常有混淆不清的尴尬事发生。由于它离绍兴五云门不远，绍兴人习惯于称之为"五云门石佛寺"，以与"羊山石佛寺"区别。所以，维卫尊佛应在五云门石佛寺。不过，五云门石佛寺历经一个多世纪风雨，除维卫尊佛外，其他已荡然无存。

现在，再简要地说说维卫尊佛的前世今生。辛亥革命后，五云门石佛寺年久失修，衰败不堪，几近倾圮，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1917年2月，周作人两次前往该寺拓石佛铭文。

10日《周作人日记》载："晴。下午同乔风及崔招乘舟至塘下金石佛寺拓铭四纸。"18日《周作人日记》又载："阴。上午同崔招乘小舟往塘下金又拓石佛铭八纸，一时返。"也就是说，第一次，周作人带了三弟周建人和佣工王鹤招前去妙相寺拓维卫尊佛铭文四枚。第二次则只带王鹤招帮忙，在妙相寺居然"拓石佛铭八纸"，大概是熟能生巧，效率大为提高，加上兴趣勃发，废寝忘食，到午后一时才踏上归程。从这两则《周作人日记》记载来看，此时这个废寺任人随便出入。维卫尊佛已身处险境，此事引起徐逖园、袁梦白等绍兴有识之士的忧虑。就在周作人拓铭后不久，他们将石佛造像敬请到城内蕺山南麓的戒珠寺内，与王羲之为伍。可是没过多久，孙传芳部队自闽入浙，屯师戒珠寺，徐逖园等人又匆忙将维卫尊佛转移到水澄巷绍兴县商会(今绍兴一中初中部)。不知怎的，一个日本商人得此信息，表示愿出十二万银元的高价购取。王子余、袁梦白等一批绍兴爱国绅商形成共识，决不能让这尊国宝流落海外，于是发起募捐，得到绍兴民众的热烈响应，很快在闹市区千年古刹开元寺中兴建了藏经楼，并量体裁衣，为这尊古佛像定制了庄严美观的佛龛。袁梦白特地创作《南齐维卫尊佛开元寺藏经楼志胜》，词云："记曾迎佛来城市，戒珠寺又开元寺。香火话前缘，金身照大千。"词末还自注："十余年前，徐逖园约薛逸臣及余同诣妙相寺舁佛入城供戒珠寺，今复由王子余、朱仲华诸君移至开元古刹设龛供养，所以崇佛教，亦所以保古迹也，甚为盛举。"遗憾的是，维卫尊佛只风光了十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绍兴于1941年4月17日陷于敌手，开元寺沦为日伪保安司令部，寺僧星散。日军驻绍兴头目北岛下令拆毁佛龛，将维卫尊佛装箱，暂放于伪绍兴维持会内，伺机盗运日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维卫尊佛随之化险为

夷。抗战胜利后，开元寺旧址移作他用办医院，维卫尊佛又先后徙居戒珠寺、龙华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市副市长兼市文管会主任王贶甫像其父亲王子余一样，爱国爱乡，重视和保护文物，将维卫尊佛送交市文管处妥善保护。绍兴博物馆建立后，维卫尊佛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从周氏兄弟日记试析两人如何搜集、研究碑拓等文物资料

旧时，大凡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多嗜书成癖，均有读书、购书、写书和藏书的风气。自清代中晚期以来，文人们热衷于集古玩碑，盛行成风，鲁迅、周作人兄弟亦被裹挟其中。他们据此研究、解读古今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军事、人物和民俗等方方面面。笔者粗翻《周作人日记》，发现1915年前关于集古玩碑的记载并不多，1912年至1914年三年逛旧书店、古玩店不过十余次，并且多数是买古旧书，只有6次是买古钱币，其中1914年11月18日“在大路摊上为大嫂购廿字钱一副、嘉泰等泉五枚、秘戏泉一枚”。集古玩碑主要集中在1915年及其后的一段岁月，故笔者选取1915年1月至1917年3月周作人离绍赴京工作的27个月（下面简称“27个月《日记》”）进行分析。周氏兄弟之所以怀着极大的热情，耗费较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并取得骄人的成果（这方面，鲁迅、周作人兄弟有《俟堂专文杂集》等专著和文章，姚锡佩、叶淑穗、杨燕丽等学者有《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等研究专著，更有《鲁迅的校碑及成果》《鲁迅与古砖及砖拓》《鲁迅拟编汉画像集》《鲁迅收藏的古钱币》等文章，本文恕不重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时文人们集古玩碑成风外，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1. 兄弟俩有共同的思想基础。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徙来到包括碑拓在内的各种古物流通中心的首都，而周作人则在外人看来“文物古玩收不尽”的古城绍兴。此时兄弟俩意气投合、兄弟怡怡，感情上处于蜜月时期。他俩隔三岔五互通书信，互寄《金石契》《越中金石记》等资料、图书和其他物品。如此频繁地交流信息和各种有关实物资料，两人的配合可谓无缝对接，这是兄弟俩高度一致的兴趣、爱好等思想基础所决定的。大而言之，是出于为祖国抢救、保存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考虑。如封疆大吏端方生前精于金石学，收藏甚富，死后其所藏金石拓本等流散，鲁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不惜工本，从1916年7月28日开始至1919年，先后花重金购回端方收藏的金石拓片及瓦当等拓片930枚。如1916年7月28日《鲁迅日记》载：“往留黎厂买端氏臧石拓本一包，计汉、魏、六朝碑碣十四种十七枚，六朝墓志二十一种廿七枚，六朝造象四十种四十一（种）[枚]，总七十五种八十五枚，共直二十五元五角。又《张景略墓志》一枚，五角。”8月8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德古斋来，续收端氏所臧造象拓本三十二种卅五枚，七元。”8月12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往留黎厂，续收端氏所臧石刻小品拓片二十二种二十五枚，六元。又专拓片十一枚，一元。”10月29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留黎厂买端氏臧石拓本二十七种三十三枚，又别一枚（戴氏画象），共直八元。”11月12日《鲁迅日记》载：“午前往留黎厂买《章仇禹生造象》并阴二枚，《仲思那造桥碑》一枚，杂造象五枚，共二元。又端氏臧石拓本四种四枚，一元。”11月24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往留黎厂表拓本，又买汉残碑拓本，未详其名，云出河南者一枚，又《违彻墓志》一枚，《元氏墓志》并盖二枚，端氏臧石拓片三种四枚，共泉四元，添《阳三老食堂》拓片二枚。”仅这6次购置端方藏品，鲁迅就支付55元大洋！小而言之，也许是鲁迅当时个人的

兴趣、爱好和研究所需，但最终结果是端方藏品有了最好的归宿——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研究和利用。2. 时间较为充裕。绍兴有俗语："新来晚到，不知茅坑井灶。"是指新来乍到，对许多情况都不了解，一开始会出现无所事事的状况。1912 年 5 月 10 日，鲁迅第一天到教育部上班，就在日记中记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八字感慨。据 1915 年 9 月 1 日《鲁迅日记》所载："自此日起教育部全日理公事。"也就是说，教育部有段时间上班时也可干私活。1915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有了即日起"全日理公事"的要求，但能否真正实施是要打大大的问号的。不知出于何种考虑，1916 年 7 月 1 日教育部有了新规定，是日《鲁迅日记》载："部改上半日办事。"这从客观上为鲁迅提供了机会，他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做自己高兴做的有意义的事。据这 27 个月的《鲁迅日记》统计，鲁迅"游小市"70 次，去琉璃厂 199 次。在省立五中任教的周作人一周课时十来个小时，教学任务并不重，也可利用课余时间到古玩街市去淘宝，或从事研究工作。3. 经济上宽裕。周作人在省立五中执教英语，月薪 68 元，后加至 70 元。1912 年 5 月至 7 月，因教育部初迁北京，教育部在职人员未定级别薪金，每人每月暂发 60 元生活费。1914 年 8 月 26 日，鲁迅被委任为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月俸从 240 元升至 280 元，1916 年 3 月 25 日后月俸高达 300 元。另有他校兼职讲课费、稿费和版税等收入。周建人的工资收入亦可观，又勤奋著作和翻译，常有一笔笔稿酬收入囊中。由此可见，周氏兄弟用于收集、研究和印刷碑拓等的开销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鲁迅用钱是精打细算的。精读《鲁迅日记》，可知他一直维护其合法权益，一发现所买的碑拓是"伪刻"，鲁迅要么退货，要么换购。1916 年 6 月 22 日"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驎墓志》一枚"。谁知这帖估抓住鲁迅富有同情心的善良心理，故技重演。第二天下午又来兜售，鲁迅就干脆拒绝"不买"。但是，对于看中的碑拓等货，鲁迅还是出手干脆大方的。如 1915 年 4 月 21 日"下午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七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至直隶官书局买《金石续编》一部十二本，二元五角；《越州金石记》一部八册，二十元"。是年 12 月 19 日，鲁迅"下午至琉离厂买《华阴残碑》《报德玉象七佛颂》各一枚，银二元。又《爨龙颜碑》并阴全拓二枚，于纂、时珍、李谋墓志各一枚，共十二元"。1916 年 1 月 22 日，鲁迅"午后往留黎厂买《响堂山刻经造象》拓本一分，共六十四枚，十六元。又晋立《太公吕望表》一枚，五角；东魏立《太公吕望表》并阴二枚，一元"。是年 5 月 31 日，挚友"陈师曾示《曹真残碑》并阴初出土拓本二枚，'诸葛亮'三字未凿，云仿古斋物，以十元收之。又江宁梁碑全拓一分，内缺《天监井床铭》，计十六枚，是稍旧拓本，是梁君物，欲售去，亦收之，直十六元"。1917 年 2 月 18 日，鲁迅再"往古斋买《张寿残碑》一枚，《南武阳阙题字》二枚，杂汉画象五枚，共二元；《高柳村比丘惠辅一百午十人等造象》一枚，一元；《曹望憘造象》四枚，十二元；稍旧拓《朱岱林墓志》一枚，五元"等，一次出手成交在 10 元大洋以上者达数十次之多。4. 居所和办公地点便于搜集碑拓、书籍等。绍兴历史悠久，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积淀深厚，文风盛，读书的、做官的和当师爷的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历代著名的藏书家也不少，因此经营古玩、古旧图书、碑帖、旧货、出土文物和印刷等各种堂、斋、楼、馆的店铺、摊位很多。据 27 个月《日记》统计，周作人光顾的这类店铺、摊位有景仁堂、墨润堂、奎元堂等二十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仓桥直街、大街（今解放路）、大

路(上大路)、水澄巷、马五桥(今人民路与新建南路的交叉口)、贯珠楼(鱼化桥河沿与今新建南路的交叉口)、小坊口(断河头与今新建北路的丁字路口)和里街(又称三埭街)等地。南北向的仓桥直街简称“仓桥街”,周氏兄弟在日记中简称为“仓桥下”,是绍兴古玩、旧书店最多的特色街市,有景仁堂、奎照楼、奎元堂、万卷书楼等。街北旧有仓桥,桥北就是省立五中,而该校北面就是东西向的大路。大街,是周氏兄弟常走的街路,墨润堂、会文堂、聚奎堂、永思堂、许广记刻字铺等就开设在水澄桥到清道桥的这一段大街上。北京的绍兴县馆建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由山阴、会稽两邑乡人于清道光丙戌(1826)“醵资五千金置产为馆”,为同籍应试者服务,同乡官员到京候补亦可在此借住。鲁迅1912年5月5日抵京,翌日即入住绍兴县馆,直至1919年11月21日徙居八道湾11号宅为止。教育部位于西单南大街清学部旧址,鲁迅从1912年5月10日开始在此办公,到1926年8月26日离京南下为止。而闻名中外的琉璃厂在宣武区和平门外(大栅栏西),有经营古籍、字画、碑帖、文房四宝、珍宝、古董、玩具和泥人等店铺、摊位。5.有一帮挚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周氏兄弟提供学术帮助、支持。据27个月《日记》统计,有10多位友人帮过忙。如同事杨莘耜,1915年1月26日“自陕中归,见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拓本一枚”;28日“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2月5日,“杨莘士赠《陕西碑林目录》一册”;11月27日“上午杨莘耜赠《周天成造象》拓本一枚”。1915年4月4日,杨莘耜受鲁迅嘱托,写信并寄钱五元给西安吴葆仁,托他代买帖。同乡宋芷生长期在山西任职,1916年1月6日通过宋紫佩送给鲁迅“《晋祠铭》并复刻本,又《铁弥勒象颂》各一枚”;是年8月27日,“宋芷生寄《山右金石记》一部”给鲁迅。季自求是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因与周氏兄弟有同好,赠给鲁迅《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等碑拓。1915年1月17日,鲁迅向季自求商借《墨经正文解义》等书,据以校读《墨经正文》;3月1日,季自求面赠“鼯鼠蒲桃镜”一枚,叶上有小圈,内楷书一“马”字;7月25日,季自求赠鲁迅一部《鹤山文抄》。教育部同事王叔钧于1917年2月5日一次就“持赠《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四枚,画象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小方,《贾公阙》一枚”;另一同事张春霆也赠送“定州近时出土”的《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二枚,《高归彦造象》《七帝寺主惠郁等造象》各一枚。齐寿山、张阆声、许季上、陈师曾、蒋抑卮、杨千里、祁柏冈等同事、老同学、挚友均有这类实物馈赠给鲁迅。

鲁迅佚简收信人胡绥之其人其事

胡绥之(1859—1940),名玉缙,《鲁迅日记》又作“玉搢”(疑为误植),字绥之,号绥庵,别署艳荠,室名许庼,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自幼聪颖,又勤奋好学,清光绪丁丑(1877)入县学,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后入江阴南菁书院。胡绥之在南菁书院就读期间,其才学和为人深得内阁中书衔官员黄以周赏识。同籍刑部官员许玉瑑亦看中他,以女妻之。光绪戊子(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创办学古堂,敦聘时年29岁的胡绥之为斋长,支持堂务。光绪辛卯(1891),胡绥之参加江南乡试中式。一度赴闽习幕,也当过江苏兴化县教谕。光绪癸卯(1903),胡绥之应经济特科考试,荣居第六名,官湖北知县。翌年,奉命东渡日本考察学政,著有《甲辰东游日记》。光绪丙午(1906)调任学部主事,不久升员外郎。光绪戊申

晚年胡绥之

(1908)被聘为礼学馆纂修。宣统二年(1910)初,京师大学堂成立,胡绥之被聘为文科教授,讲授《周礼》等。民国初,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建历史博物馆,与鲁迅共事多年。后离开教育部,转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教授,也曾供职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著有《许庼学林》《艳葊读书记》等,藏书亦颇丰。

早在1908年,胡绥之就建言续修《四库提要》,未果。辛亥革命后,其"顾忌斯解","用数十年之力,为之补正"。1925年前后,中日学者合作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胡绥之数十年如一日,在《四库全书》的补充、考证和研究等方面出力甚多,贡献甚大。1936年,胡绥之归隐苏州光福镇虎山桥堍,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撰著。胡绥之深感此项文化工程甚巨,即使有"五百年之寿命,亦不能尽",但他心甘情愿,只求"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即尽其全力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与王欣夫合著)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鲁迅与胡绥之在教育部共事多年,见诸《鲁迅日记》有下面摘引的(13次)往还记载,始终于1912年至1917年,全在两人任职于教育部时。

1.1912年6月14日"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

2.1913年3月26日"(下午)同夏司长、胡绥之赴瑠琉[璃]厂买土偶不成,我自买小灶一枚,铜圆三十。游书肆,买《十七史》一部二十八函,三十元;《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部十本,十四元"。

3.1914年3月2日"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遂至胡绥之处小坐而归,日已午矣"。

4.1914年5月22日"上午往察院胡同访胡绥之,未遇"。

5.1915年3月28日"下午胡绥之来并赠《龙门山造象题记》二十三枚,去,赠以《跳山建初摩厓》拓本一枚"。

6.1915年4月14日"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象》拓片一枚"。

7.1915年4月15日"夜得胡绥之信"。

8.1915年6月21日"晚访胡绥之"。

9.1915年7月20日"上午访胡绥之,未遇"。

10.1915年7月25日"(上午)访胡绥之,未遇"。

11.1915年7月26日"(午后)访胡绥之"。

12.1915年8月22日"下午胡绥之来"。

13.1917年5月23日"胡绥之嫁女,送银一元"。

其间,鲁迅很有可能漏记。这六年之外有往还,也仍有失记的可能。尽管他俩的关系不如许寿裳、陈师曾、齐寿山、钱稻孙、杨莘耜、汪书堂辈莫逆,但鲁迅对胡绥之这位饱学之士是敬重的,这可能是年龄相差较大的关系,存有代沟。从1912年6月14日《鲁迅日记》将他的姓名写作"吴君玉搢"来看,鲁迅对6月初刚到教育部工作的胡绥之是不了解的,姓名三个字写错了两个。随着交往的增多,互相了解增强,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他俩在工作方面的合作是愉快的。民国初,农林部建议将天坛改建为林艺试验场、先农坛改建

为畜牧试验场，拱卫军则有将先农坛改设军械库的打算，而京师议事会提出将天坛、先农坛均改为公园。于是，教育部派遣秘书长梅光羲、鲁迅和胡绥之于1912年6月14日前往实地考察改建公园的可行性。从是日《鲁迅日记》记载分析，教育部有改为公园的倾向，经梅、鲁、胡三氏考察后认为是可行的。1915年，明、清帝王祭天、祈谷和祀先农神的场所改为公园开放。第2次是1913年3月26日，鲁迅和胡绥之陪同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到琉璃厂采购历史博物馆所需的出土明器土偶等陈列品。公事未办成，鲁迅个人用去44元购回一批书，不虚此行。《鲁迅日记》第3次写到胡绥之是在1914年3月2日，是日日记载："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遂至胡绥之处小坐而归"。显然，鲁迅对孔教会所组织的尊孔活动举止荒陋和教育部对部员的出格要求是反感的、抵制的。当时，胡绥之身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在国子监办公，鲁迅就溜到胡氏办公室谈论他们感兴趣的事情。5月22日，鲁迅有事去察院胡同拜访胡绥之，因此有了他的第4次记载。胡绥之年长鲁迅22岁，看这位晚辈如此痴迷于金石碑拓的收集和研究，也深为感动，成人之美，将他收藏的"《龙门山造象题记》二十三枚"割爱赠送给鲁迅。龙门造象二十品备受金石学家推崇，胡氏所赠如此厚重，鲁迅当即回赠绍兴"《跳山建初摩厓》拓本一枚"。跳山，位于绍兴富盛镇乌石村。乌石跳山东坡岩崖上竖刻着"大吉"两字，下凿刻正文"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值]三万钱"。左侧还有道光三年(1823)杜春生等人刻的"获石同观题记"。建初买地刻石是我国早期买地券文，也是浙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题记，它和铅、木、玉、石、砖质等买地券不同，是买地券中最原始的形式。建初买地刻石为研究当时土地买卖制度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字体结构看，对研究当时流行的隶书也有重要价值。鲁迅将购买的"《跳山建初摩厓》拓本"回赠胡绥之是有意义的。这已是鲁迅第5次在日记里谈及胡绥之。胡绥之的这份情义，鲁迅铭记在心。1915年4月14日，他一收到周作人寄来的《永明造象》拓片，就修书一封并附赠此拓片。15日，鲁迅收到胡绥之的信，这在《鲁迅日记》中谈及胡绥之已是第6次和第7次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两人唯一一次通信往返记录，并有《鲁迅日记》记录在案。据27个月《日记》统计，跳山建初买地刻石拓片，鲁迅于1915年3月17日收到4枚，4月12日收到2枚，一共6枚；于1915年3月18日、3月21日、3月28日、6月24日分别馈赠陈师曾、许寿裳、胡绥之、朱逷先和朱孝荃各1枚，一共5枚。而南齐永明造象拓本，鲁迅于1915年3月11日收到1枚，3月17日收到2枚，4月10日收到2枚，4月12日收到2枚，1916年1月26日收到4枚，2月8日收到1枚，一共12枚；于1915年3月18日、3月21日、4月10日、4月14日、6月24日，1916年2月8日分别馈赠陈师曾、许寿裳、张阆声、胡绥之、钱中季和朱逷先(同日)、何

绍兴跳山建初买地刻石拓片

鬯威和朱孝荃(同日)各一枚,一共8枚。1915年6月21日、7月20日、7月25日、7月26日和8月22日,即鲁迅第8至12次关于胡绥之的记载均系二人互访的事,未述及详情,只记流水账而已。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胡绥之的频繁往还主要在1915年(8次),最后一次已是1917年5月23日,“胡绥之嫁女”,鲁迅“送银一元”作为贺礼。

胡绥之与蔡元培之间也发生过一件颇为有趣的事。1912年2月23日,蔡元培在北上迎袁船上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其中第17条主张废“大人、老爷之称,以先生代之”,与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以政府职员系人民公仆,不应再有“大人”“老爷”等旧称的主张一致。5月间,因典礼院并入教育部,蔡元培委派前学部员外郎胡绥之等前往接收。谁知起草公文的承政厅文书于通知函中墨守成规,内有“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等语,引起胡玉缙的极大不满。5月31日,他直接写信给蔡元培。信云:

鹤庼先生台鉴:

昨晚接大部来函,内开:“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展阅之下,无任惶悚。窃念民国下级官当服从上级官,此不易之理,维“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况玉缙为前学部人,与今教育部初无继续之关系,未知从何谕起!在玉缙略具知识,甚愿为民国服务。如相契以道德,固所乐从;若以为犹是希望先生之谕而不可得者,则民国之大,此辈车载斗量,亦何必以玉缙滥厕其间。先生富于共和思想,玉缙亦珍重民国前途,用敢直陈,惟恕其狂愚,甚幸!肃此布臆,敬颂台安!

胡绥之敬启

[一九一二年]五月卅一号

其实,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前,对胡绥之的学识、为人有所了解。任总长后不久,又读了胡玉缙的新作《孔学商榷》,对他的才华甚为感佩,就邀请他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属下发函“谕”胡绥之到部任职,在世俗社会,又逢社会鼎革之际,本应感激不尽,想不到胡绥之并不领情,复信一口回绝,还不怕冒犯质问几句:既然封建帝制推翻,进入民主共和,人皆平等,(蔡)先生为何还居高临下,“谕”我赴任,未知从何谕起!其个性,其学人的风骨,力透纸背。蔡元培接到胡绥之的来信,很重视,认为批评意见很正确,于是在百忙之中当即复信胡绥之,虚心接受胡绥之的意见,敦邀他到部任职。复信全文如下:

绥之先生大鉴:

于报端得读大著《孔学商榷》篇,无任钦佩。深愿得一朝夕奉教之机缘。适有接收典礼院一事,似与先生所精研之孔学不无关系,故以奉烦。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旧谕,旧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致承政厅遂袭用之。奉惠书后,即传示厅员,彼等有所答辩,附奉一览。字句小疵,想通人必不芥蒂。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固以请。并维

起居安善为祝

蔡元培敬启

教育部承政厅(后改为总务厅)根据蔡元培总长指示给胡绥之写了呈文,“承认公函内所用‘谕’字,指为承亡清陋习,宜屏而弗用,立论颇正”,向胡绥之表示歉意,并请他“无庸介意”,最后,敦邀胡绥之到部赴任,用词恳切,说:“本部初立,正在用人之际,若因用‘谕’‘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殊

违总长延揽之初心。”蔡元培虽身居总长高位，但宽容大度，为延揽贤才，礼贤下士，放下身段，知错改错，不失伟人、大家风度。而胡绥之亦能接受蔡元培总长和教育部的歉意，为国家教育大局考虑，慨然于六月初赴部就任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之重任，与鲁迅、夏曾佑愉快地合作，短期内创建了历史博物馆、京都图书馆（今国家博物馆）等。

陈洪绶丙戌年避难相关史事钩沉

绍兴市柯桥区越崎中学　封晓东

南明隆武二年(1646),是农历丙戌年,也即清顺治三年。是年五月底,清兵渡过钱塘江南下,绍兴陷落,在绍兴的南明鲁王政权土崩瓦解。绍兴城陷落后,陈洪绶(老莲)先是避居鹫峰寺;六月,移居云门寺;八月,入云门、化山间觅结茅地而不得;约在九月,始卜居薄坞。第二年,即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受友人劝,为卖画方便,移家绍兴城。丙戌年的整大半年,陈洪绶都是在避难、卜居中度过的。

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中的陈洪绶画像

名士陈老莲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后号老莲,又名胥岸,又号小净名、悔迟、老迟、勿迟、云门僧等。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长道地人,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

陈洪绶年少聪慧颖异,师事刘宗周,补生员,后乡试不中,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为专职画师。明亡,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死因说法不一。其画笔法简练,色彩沉着含蓄,格调高古,享誉明末画坛,与当时的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其人物画成就,张庚评曰:“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也。”陈洪绶的诗平淡天真,当时的诗坛领袖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云:“陈洪绶以画出名,予尝见其小诗,颇有致。”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陈洪绶的绘画、书法、诗文不仅是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陈传席语)。

陈洪绶去世后,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一代宗师。名作《九歌图》(含《屈子行吟图》)、《〈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版刻传世。工诗善书,有《宝纶堂集》遗世。

陈洪绶在薄坞的避乱卜居生活

老莲诗集中记载的卜居地——薄坞,即今天的濮坞村,是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秦望村下属一自然村,地处秦望山麓东北角,分为东岙、西岙,东岙所在又称“濮坞岭下”。沿解放南路经大岩山隧道至平水的通途建成后,原本位处僻陋小角落的濮坞

经由路标一下子暴露在了世人面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向村中老人问询得知，今天的濮坞村民以李、许两大姓居多，无一家姓濮。因此，老莲诗集记载的卜居地——薄坞，为何现在写成了“濮坞”，估计是后人因音近辗转误记所致。

陈洪绶卜居薄坞的时间，约从清顺治三年(1646)九月始，到顺治四年(1647)三月止，约半年之久。顺治三年(1646)除夕夜，陈洪绶一家就是在薄坞过的年。

陈洪绶卜居薄坞期间，曾作《避乱诗》一卷，共一百五十三首。其实，早在顺治三年(1646)八月，陈洪绶就几次托人或亲自到云门寺后山北的薄坞觅结茅地，《十三弟至薄坞约同觅隐地》《薄坞觅结茅地不得，先责后而望之》《觅结茅地不得有感》等记写的就是这件事。后幸得一老媪的施舍，得一结茅地，建一竹楼(自称“秦望之竹楼”)，《老妪舍一地结茅，计较诸事，不觉悲喜交至》大概就写在竹楼建成后不久。而《薄坞夜步》《除夕》《薄坞山行》《坳中》等则写于卜居期间，《思薄坞》应该是第二年迁回绍兴城后的回忆之作。至于移居薄坞的资费来源，依黄涌泉《陈洪绶年谱》载：“此顷，祁季超、祁奕远叔侄赠先生移家费，遂卜居薄坞。”《宝纶堂集》中的《卜居薄坞，去祖茔三四里许，感祁季超、奕远叔侄赠资》《奕远赠予移家之资，却赠，即书扇上》两诗也透露并印证了这一事实。小结一下：陈洪绶最后选定薄坞为卜居地的原因有二，一是离祖茔

濮坞西岙(背景是秦望山)

枯藤残影，遗留着当年老莲在薄坞村卜居的冲淡气蕴

所在地——今金岙、横滨岭一带近；二是此地在山北，离城更近，方便卖画。

陈洪绶避难的首站是型塘丰里鹫峰寺

避乱云门、卜居薄坞之前，照陈洪绶的《避乱诗》序言自记：“弗迟(出家后的别号)自五月之役，逃命至鹫峰寺，从鹫峰至云门，结茅薄坞。”陈洪绶研究者多认为鹫峰寺在杭州灵隐飞来峰上，自是飞来峰别名鹫峰的缘故，这种推定应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五月之役”指绍兴城被清兵攻占事，而杭州在前一年就沦陷，哪有逃命往敌占区逃的道理。二是鹫峰即鹫山，是佛寺的代称。简单地说，全国名为“鹫峰”的寺庙何其之多，就像“兰若寺”一

样，是一众乡野小庙的总代称。因此，不能一看到“鹫峰寺”名就臆断区位，至少得拿出充分的证据。另有人认为鹫峰寺在今天绍兴城内的塔山上，也同样不足信。既然是出城避居，仍留在城内即便是佛门净地也不安全，毕竟城内目标太大。事实上，在今天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永信村丰里自然村就有一座鹫峰寺，且是一座古代名寺，丰里距今柯岩街道项里村不远，而项里本就是陈洪绶挚友张岱的旧游之地（张岱生前就将自己的墓选定在这里），想来此地也应是陈洪绶的曾游地，陈洪绶将逃难首选地定在今湖塘鹫峰寺可信得多。

一首写于当代、未录作者名的七律《过型塘鹫峰寺》这样写道：“郁郁华樟蔽路禾，山中老树亦嵯峨。灵峰有径通名刹，曲水无声入镜河。何处佛光支遁座，谁家情趣右军鹅。千秋胜迹平平事，一韵新成怎忍歌？”（下自注：鹫峰寺在型塘丰里，俗称“寿头寺”，东晋支遁和尚曾在此住持。相传王羲之大雪访友不值，见峰顶有灵鹫盘旋，遂书“鹫峰”于庑案而去，支遁镌为寺额。）其实，明清一代学人记写型塘鹫峰寺的诗作有不少，徐渭就有《画水仙付鹫峰寺僧》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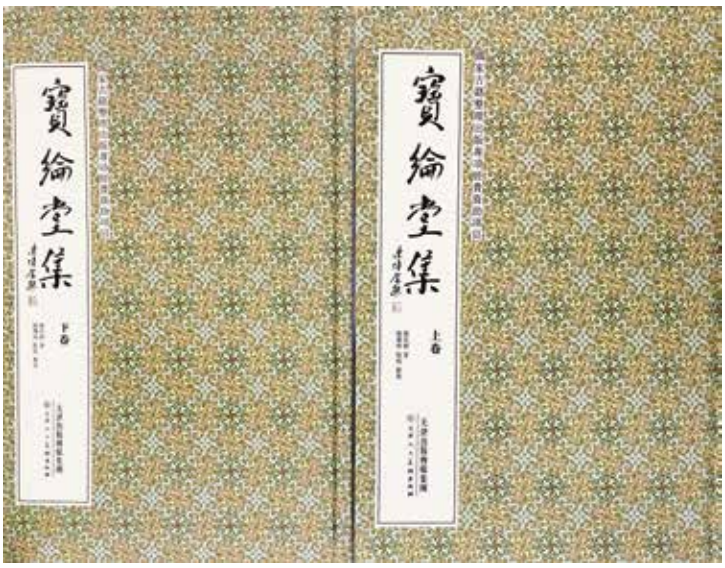
《宝纶堂集·卷九》中有一首《鹫峰寺即事》，诗云：“鹫峰寺里稻花香，战鼓冬冬闻道场。半属军粮半属豆，山僧未必得亲尝。”此诗的写作场景显然是乡野环境，因此首先排除了城内塔山鹫峰寺。其次，就“战鼓”“军粮”的描述来看，应是作者身处清兵逼近的备战环境下的亲身感受，这样也可排除杭州灵隐鹫峰寺。那么，今型塘丰里鹫峰寺是陈洪绶避居的第一站几可成定论。

薄坞：《宝纶堂集》的重要撰稿地和集稿地

云门寺和薄坞同属秦望山地域，一在山南，一在山北，通过古道相通。陈洪绶六月避乱于云门寺，同期也开始了在薄坞择地建竹楼的念想并付诸行动。先是遁入佛门，改号悔迟、悔僧，亦号云门僧。到了九月底，靠一位老媪的施舍赐予，陈洪绶终于在薄坞得到一块“结茅地”，开始了日间在云门寺行僧、晚间行走山路住到薄坞小竹楼的避乱卜居生活。《宝纶堂集·卷九》中有一首《云门寺还》，诗云：“昨日云门闻晓钟，今朝秦望坐高峰。尽多挂得芒鞋处，需听机缘守老松。”正好反映了陈洪绶在云门—薄坞、薄坞—云门之间循环来回的清贫生活。

陈洪绶避乱云门、薄坞这段时日中，清心寡欲，闲云野鹤，无可消遣，遂将四子小莲平时所录之诗稍加裁删，定名为《宝纶堂集》。“宝纶堂”为陈洪绶祖宅，位于今诸暨枫桥长道地，诗集因之而名。

依黄涌泉《陈洪绶年谱》所载，《宝纶堂集》成稿于清顺治三年（1646）夏秋间。然而，“夏秋间”却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此时陈洪绶正在云门寺为僧，九月底始卜居薄坞。



陈传席点校整理的《宝纶堂集》书影

那么，薄坞与《宝纶堂集》会有怎样一种时空交集？陈传席点校整理的《宝纶堂集》的《整理说明》介绍道："现在，我们这个《宝纶堂集》和《补遗》及附录，实际上包括了哈佛、南开的两种康熙本以及光绪本和《明词汇刊·宝纶堂佚词》本的全部内容。"加上各清代刊本都收录薄坞村的相关诗作，特别是那首顺治四年(1647)已经迁回绍兴城后写的《思薄坞》也收录其中，因此，笔者认为《宝纶堂集》的最后成稿时间至少不会是顺治三年(1646)夏秋间这么早。笔者认为：《宝纶堂集》的最后定稿时间最早也是在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以后。由此，似可做出以下定论：云门寺是陈洪绶《宝纶堂集》的开始撰稿地，薄坞是陈洪绶《宝纶堂集》的重要撰稿地和集稿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薄坞是陈洪绶《避乱诗》(一卷本)书稿的诞生地，这个无可争辩。其在《自序避乱草》一文中有记："弗迟(出家后的别号)自五月之役，逃命至鹫峰寺，从鹫峰至云门，结茅薄坞。思难中犹不失故吾，笔墨洒落，得诗一百五十三首，残落者强半。"文末以"丙戌除夕，书于秦望之竹楼"结尾。这里交代得很清楚，《避乱诗》书稿自序写于丙戌除夕夜，即清顺治三年(1646)除夕夜，而这天，陈洪绶全家都在薄坞，有《除夕》一诗为证。

薄坞这一地名，虽有嬗变，但地理位置清晰可辨，地理环境又完全合对，因此，今"濮坞"即古"薄坞"，无可争辩。"薄坞"地名能有幸延续并遗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幸事。更让人值得记取的是：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绝代诗画大家，诞生过两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诗作，不由让人心生敬畏。

《宝纶堂集》中的薄坞诗篇

对于陈洪绶的诗作，时人和后人多有好评。清孟远在《陈洪绶传》中记道："落笔清新俊逸，不屑屑。"清朱彝尊评道："颇饶逸致，惜流传者寡。"近代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说道："偶有所作，皆于真率中见风趣。"现摘录诗题与薄坞直接相关的陈洪绶所作诗，借此探窥陈洪绶的隐居生活一斑。

君爱竹香书舍，我寻松雪人家。
但得性情有寄，便于生死无加。
——《十三弟至薄坞约同觅隐地》

病非吾病众生病，深在心深觉路深。
胜地证明为住色，不如依旧酒楼吟。
——节选自《薄坞觅结茅地不得，先责后而望之》其一

移家仗亲友，守墓近松楸。
不幸中之幸，两贤何处求。
——《卜居薄坞，去祖茔三四里许，感祁季超、奕远叔侄赠资》

不惟山水好，而又有山田。
不惟山田好，又有美竹焉。
——节选自《山居》

妇女纺织余，农事相料理。
本爱山水佳，今爱风俗美。
倚竹看梅花，枕石唱流水。
——节选自《薄坞山行》

生计谁能卜，残生贪浪游。
天年甘尽此，恐不了山头。
——节选自《薄坞夜步》

摩诘居孟城，孟城山有名。
老夫居薄坞，薄坞人有情。
——《坳中》

薄坞去城廿里余，秦望之前天柱里。
东有奉圣天衣寺，西有云门若耶水。
（封按：依今方位应将东、西互换）
……
有时入寺僧作饭，有时游山客留止。
酒钱少而米钱稀，然亦未曾饥渴死。
……
薄坞薄坞何时还，秃翁清福薄如此。
——节选自《思薄坞》

以上均据陈传席点校整理的《宝纶堂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第 1 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薄坞山行》《思薄坞》分别是两首五言、七言长诗，又恰巧代表着陈洪绶初到薄坞和离开薄坞的所见所感。

老莲便道：覆釜岭古道

那么，陈洪绶往来云门、薄坞走的是哪一条山路？大概用时几许？行路艰难与否？带着这些疑问，某日，笔者携两友人步行前去探路。最后的结论是：当年陈洪绶日行夜归的捷径就是今天被人们称为“覆釜岭古道”的一条现存便道，笔者将之命名为：老莲便道。

两山似覆釜形，一尖一圆，古道穿其东侧

古道南入口在今柯桥区平水镇凤林村，北出口是越城区鉴湖街道秦望村，标识牌上写的是：秦望村濮坞岭下。濮坞村现今是秦望村属下的自然村，而岭下已是更小的一个地名。近二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行政村归并现象普遍，古代村落地名的变迁、消失现象频繁发生。问询了一名当地老者，被告知：这里又叫东岙，往西行便到西岙，两地合称濮坞。但据笔者实地观测，东岙所在的岭下仅十余户人

老莲便道：覆釜岭古道

茂林修竹

家，显然，明清之际陈洪绶所记的“薄坞”就是今天的“濮坞”，且西岙建村历史更早、人口更多、占地更广。陈洪绶卜居的“薄坞竹楼”应该建在今天的濮坞村西岙所在。

覆釜岭古道终于还是在城市化浪潮中隐退了，但三四十年前，它却是真真切切沟通坡塘、南池一带到平水、平江最便捷的通道。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伯告知，从濮坞岭下所在的东岙经古道到平水老街，大约4000米，步行约一小时，这是他小时候经常走的一条便道。

覆釜岭古道应该就是陈洪绶往来薄坞与云门寺的便捷通路，风声紧时，他南遁云门，以僧人身份作掩护，以求庇护保身；风声松时，他北出卜居薄坞，呼朋唤友，切磋诗画文赋。

云门和薄坞，出世和入世

佛教徒以人世为俗世，故称脱离人世束缚为出世，称投身凡尘俗世为入世。陈洪绶遁入云门寺，卜居薄坞村，这看似是铁了心做一个出世仙人，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笔者以为：陈洪绶云门为僧只是缓兵之计、权宜之策。在《山居》一诗中，老莲开篇自言：“小乱入城好，大乱入山便。”道出了个中缘由。《从赵婆坳至龙王堂口占》一诗中有“身虽终梵宇，名尚系人间”一句，也透露出些许心迹。（按：今濮坞东有赵婆岙自然村，两自然村同属越城区鉴湖街道秦望行政村。）

《宝纶堂集·卷四》中另有一首诗作，题目很长，陈洪绶更在其中直言表明了心迹。且先将诗题摘录如下：《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鸟处，便薙发披锱。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问我予安道兄能为僧于秀峰猿鸟路穷处，寻之不可得。丁亥见于商道安珠园，书以识怀》。请注意“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句，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遁入云门、卜居薄坞时期的陈洪绶，很显然还是很挂念俗世的，只是为了避乱而不得不暂时隐居。

陈洪绶和张岱的才情与共

因阅读张岱著作而走近陈洪绶，故笔者想着在小文最后加一篇记叙张、陈友情的附文。那么，附文从何处入手呢？两人一个是文史高手，一个是诗画绝才，虽领域各异，但才情与共，所以笔者决定从张岱记文中留下的两人交集入手，一窥兄弟情深。交集信息来自张岱著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岣嵝山房相伴学。《陶庵梦忆·卷二·岣嵝山房》开篇一句“岣嵝山房，逼山，逼溪，逼韬光路，故无径不梁，无屋不阁”，一言道尽山房的奇特。《西湖梦寻·卷二·岣嵝山房》又有记：“天启甲子，余与赵介臣、陈章侯、颜叙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读书其中。”天启甲子即天启四年(1624)，据文意，这一年张岱和陈洪绶在此同学。至于学业何如，照张岱自叙：“但恨名利之心为净，未免唐突山灵，至今尤有愧色。”估计陈洪绶也学得差不多。另外，张岱在《西湖梦寻·卷四·烟霞石屋》中写道：“王子安亹、陈章侯洪绶尝读书其中。余往访之。”可见，陈洪绶在他处（烟霞石屋）苦读时，两人也互访互励不断。

《水浒叶子》见真情。《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记载了一件陈洪绶出手帮友人脱困的仗义之事。事情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张岱好友苏州人周孔嘉僦居在绍兴城轩亭之北，一时生活拮据，想请张岱出面请陈洪绶开笔作画，画的是《水浒》人物系列，后称“水浒牌”，是一种酒牌，即“水浒叶子”。张岱记道：“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看来因为张岱和陈洪绶的关系实在好，陈洪绶不仅爽快答应，并且是花了一番心思认真画的。果然，

这一酒牌的市场反响极好，“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一出手就帮周孔嘉一家八口解决了生活之困。这画必定十分绝妙，人物栩栩如生，不然，销路怎么会这么好。从此事看出，张岱的待友诚意也很不错。张、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不系园中看红叶。《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记：崇祯七年(1634)十月，张岱携女艺人朱楚生住杭州不系园看红叶。一天，来了八位不期而至的客人，张岱是夜留客畅饮。陈洪绶是其中一个，另有曾波臣、赵纯卿、彭天锡、杨与民、陆九、罗三及女伶陈素芝。席间，宾客各展才艺，如“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陈洪绶携缣素(细绢)为赵纯卿画古佛时，赵纯卿在一旁舞剑助兴，好一场合欢盛宴。

白洋村头共看潮。《陶庵梦忆·卷三·白洋潮》记：“庚辰八月，吊朱桓岳少师至白洋，陈章侯、祁世培同席。”说的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张岱、陈洪绶、祁彪佳三位挚友同去今安昌白洋村吊唁曾经的兵部尚书、以功进少师的朱燮元，午后顺道后海看潮一事。文中记道：“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溅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好真切的写景手法，至情至性，惊心动魄，令人目不敢接。奇喻妙譬，层见叠出，铺叙极有次第，读来惊魂摄魄，恍若身临其境。

鲁王宴中假醉人。《鲁王》是《陶庵梦忆》的补遗篇目，记叙了南明鲁王监国于绍兴城，在张岱家喝酒的事。“设二席于御坐傍，命岱与陈洪绶侍饮，谐谑欢笑如平交。”那天，君臣不拘于礼节，放饮痛喝，“陈洪绶不胜饮，呕哕御座旁。寻设一小几，命洪绶书策，醉捉笔不起，止之。”后人大都怀疑那次陈洪绶是假醉，他不愿为鲁王作画。事实上，不几日，鲁王征召他为翰林，他不肯接受。由此可见两人性格略有小异，陈洪绶更硬节一点，大明监国御赐侍饮，竟然敢假醉避画，而张岱虽有抵触，如自记“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估计心里认为这个“皇上”不咋的，但进跪斟酒、设宴看戏，面上礼数一样不落。

西湖一桥虬髯客。张岱笔下的陈洪绶，最活灵活现的当属《陶庵梦忆·卷三·陈章侯》，记的是发生在崇祯十二年(1639)两人夜游西湖时的一件奇遇事。那晚，两人携船工深夜了还在断桥一带饮酒啖橘，陈洪绶已醉，卧船上嚎嚣。忽然，岸上出现一女郎携一童子致意能否载她们一程到一桥。张岱应允后，女郎下得船来。此时，陈洪绶醒来了，估计是看到了该女子“轻绔淡弱，婉嫕可人”，竟向女子发出了“女郎侠如张一妹，能同虬髯客饮否？”的挑战。不料，“女郎欣然就饮。移舟至一桥，漏二下矣，竟倾家酿而去。问其住处，笑而不答。”神秘可人的女子像风一样飘去了，“章侯欲蹑之，见其过岳王坟，不能追也。”显然，陈洪绶意犹未尽，想跟踪探迹。张岱一笔就写尽了陈洪绶放荡不羁的才子风情。

谁说老莲已去，在张宗子笔下，老莲再现。

清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在“子妇环哭”中“喃喃念佛号而卒”，绝粒而死。其死因众说纷纭，布谷先生在《老莲之死》一文中提出了“老莲惹下‘黄祖之祸’”的解读，值得一记。这一年，距离陈洪绶丙戌年避难卜居于薄坞(濮坞)只过去了近六年时间。

(本文颇多受惠于布谷先生《老莲小笺》一书，特此为记)

故址、戏曲及本事诗
——沈园文化略说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俞正来

曹明纲先生在《中国园林文化》中说："园能出名，或以非常之景，或以非常之事，或以非常之人，或以非常之情。"绍兴沈园作为越中名园，真可谓"景、事、人、情"四者具备了。

从自然景致上看，沈园布局典雅，环境清幽，有亭台楼阁、假山绿荫、鱼池小桥，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它原是古代的一处私家花园，始建于何时尚无定论。明代学者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提及绍兴许多名园，但保存至今的唯有沈园。

从人文景致上看，沈园更是人文荟萃之地。众所周知，沈园以情闻名，陆游和唐琬在这里演绎了千年的爱情绝唱。古往今来，相关诗词题咏甚多，成就了沈园独特的古典文化。正如原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戴盟所题楹联云："莫因半壁忘全壁，最爱诗园是沈园。"

为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上对沈园的考古勘测、越剧《陆游与唐琬》以及沈园本事诗，对沈园文化作一论述。

一

现今的沈园，位于越城区鲁迅中路318号，总占地面积57亩(合3.87公顷)，是国家AAAAA级景区。沈园景区由古迹区、东苑和南苑组成。其主题包括"断云悲歌""诗境爱意""春波惊鸿""残壁遗恨""孤鹤哀鸣""碧荷映日""宫墙怨柳""踏雪问梅""诗书飘香""鹊桥传情"十景。

沈园景区的这些景点，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复建和扩建的。1949年5月绍兴解放时，沈园仅存一隅，有小坡、黄石数处，古木数株，小屋数椽，占地面积不到5亩(约合0.3公顷)。1986年，沈园进行了第一次扩建，修复了孤鹤轩、半壁亭、葫芦池、水井等，其中葫芦池、水井为宋时原物。其后，1993年、1994年、2001年，陆续新添了新的景点与配套设施，才有了今天的布局和规模，再现宋代建筑风格和园林特色。

在沈园复建和扩建的过程中，对其的考古发掘工作亦同时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了解历史上的沈园以及陆、唐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重点介绍这两次考古工作及其成果。[①]

对沈园的考古发掘，是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管理处牵头，于1984年和1992年先后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历时一年半时间，在7.2亩的施工区域内开挖探沟进行考古发掘，每隔10米布探沟一条，其宽度均为1.5米，计东西向和南北向探沟共十六条，为了便于记录，逐一进行编号，发现遗迹后再实施扩方。通过勘探分清了沈园地层叠压关系，并发现了一些遗迹。第二次历时57天，在洋河弄以东、绍兴博物馆后园工地布探方5个，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左右，揭露出东围墙、池塘、河道等多处重要遗迹，基本搞清了

沈园的一些情况。”

这两次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计有如下几点。

第一，确定了沈园的具体方位。首先，考古专家们对禹迹寺和春波桥这两个标志性地点进行了确证。陆游在诗中说：“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查南宋《嘉泰会稽志》：“大中禹迹寺在府东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绍兴末，曾文清公居于越，得禹迹寺东偏空舍十许间居之，手种竹盈庭，日读书赋诗其中。”“府”，就是“绍兴府衙”，位于今府山以东。绍兴府城分为“会稽县”和“山阴县”。再查明代《万历会稽县志》：“大中禹迹寺在县东南二里。”这是县衙所在地到禹迹寺的距离。明代《万历绍兴府志》所绘“古越城图”中，禹迹寺标在府城的东南，并说“由南街过覆盆桥为禹迹寺，东至东郭门”。覆盆桥原在东郭门内木莲巷，北对糕点弄，今已拆除。所有记载均指同一地点，南宋以来位置一直没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立新塑料厂，今禹迹寺古井尚存，可以此为证。

第二，确定了春波桥的位置。据《嘉泰会稽志》：“春波桥在县东南五里千秋鸿禧观前，贺知章诗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故取此名桥。”春波桥因贺知章诗得名，但是此桥已毁坏，地点不明。清代初期，有好事者把禹迹寺南“罗汉桥”改名为“春波桥”。《越中杂识》云：“按禹迹寺前有桥，勒字曰‘春波’，盖取放翁‘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及‘绿醮寺桥春水生’之句名之，今俗名罗汉桥。”孟骙《笋庄诗钞》中《春波桥怀陆放翁诗》小序云：“余谓春波桥当有两，在观前者属贺，以贺诗‘春风不改旧时波’得名；在寺前者属陆，以陆‘伤心桥下春波绿’得名。贺桥无考，而陆特存，时代久近不同耳。”此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存，为单孔石拱桥。禹迹寺、春波桥、沈园三者的地点，都是可以互相参照、互相确证的。

第三，发现了早期“亭阁遗迹”。根据考古发掘，在勘探区中部四块柱顶石的周围，有一层厚厚的瓦砾层。从现场排列情况看，当时是由北向南倾塌，出土有板瓦、筒瓦，未见瓦当，废弃时间可能在五代至宋初，遗址完全压在宋文化层之下。此亭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早期园林的存在。由此，沈园建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唐至五代。

第四，进一步确认了葫芦池、双眼井、小土山为宋代遗存。这也是沈园仅存的遗物。勘探区东南部出土有东西两段宽度和结构完全相同的遗迹，底部铺设条形青砖，两侧用块石叠砌，其东段残长 4.5 米，西段呈曲尺形，残长 12.5 米，将两者联系起来看，是一条平面略呈斗形的遗迹。东面正对着葫芦池，沟宽 1.3 米，块石之间填土中的瓷片有北宋青瓷，也有南宋龙泉青瓷，还发现一枚“治平元宝”铜钱。专家们认为这是宋代葫芦池的排水沟，所砌池岸用石和土山之上假山使用黄石，与桐乡石门南宋东园遗址出土的假山石完全相同。

第五，发现了宋代围墙遗迹。这一遗迹所处位置正好在今天洋河弄以东，拟为古沈园东围墙。此围墙南北残长 37 米，东南方向残长 8 米，宽 0.95~1.00 米，用厚石块砌叠而成，参有少许青砖，紧靠围墙石块之上夹杂一层厚 0.2 米左右的红烧土，中间有宋代瓦当、板瓦、筒瓦之类建筑构件，整体断断续续，有些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后期被破坏的迹象。从发掘地层和包含物看，此墙留有不同时期的修补痕迹，延续时间较长，一直到明代还在使用。其走向也不在一条直线上，略有弯曲，南端向西面延伸，与今沈园《钗头凤》题词壁恰好在同一直线上。

第六，探明了沈园遗址以水池、溪沟、假山、鱼池为主。这里地势低洼，水源充沛，符合当时建造园林的条件。发掘

中发现的遗迹大多与水有关。宋代水池除了葫芦池外，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大池塘位于勘探区东北隅，原是一个不甚规则的自然型水池，面积与近代现存方池相近，大约直径25米，池底下层淤泥所含遗物主要以宋代瓷片为主，也有少量五代遗物，文化层厚0.2米。小池塘在勘探区中部偏东南，形状不规则，长、宽约10米，也是宋代遗迹。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宋代水池、溪沟、假山等，是沈园最好的证据。

从沈园故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沈园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二

沈园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接下来，笔者将围绕两个主题，即戏曲和诗词，分别进行论述。

提起沈园的戏曲，许多绍兴人首先会想到越剧经典曲目《陆游与唐琬》。它是由已故著名剧作家、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越剧院院长顾锡东先生创作的。该剧取材于绍兴沈园陆、唐情事，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一体，一波三折地表现了陆游的坎坷仕途及其与唐琬的婚姻悲剧。该剧于1989年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排演，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浪迹天涯三长载，暮春又入沈园来”的唱段脍炙人口，在越剧爱好者中传唱不绝，口碑甚佳。戏剧内容是这样的：

南宋初年，奸相秦桧弄权，嫉贤妒能。陆游殿试被黜，郁郁在家，幸得爱妻唐琬宽慰，稍感释怀。遂春游沈园，与唐琬商议双飞福建，结交忠良，谋求报国。其岳父亦将其推荐给福州府尹。正待远行，陆游的母亲唐夫人爱子心切，前来阻止，并托新贵侄子陆仲高为其谋划前程。陆游鄙视陆仲高依附秦桧，写诗讥讽，触怒了后者。而唐琬亦为陆仲高之弃妇李盼盼打抱不平。因此，陆、唐与母亲之间矛盾激化。

陆母牵罪媳妇，逼陆游逐妇。陆父则悯唐琬之无辜，策划留其于外宅中。深秋，唐琬独处小红楼，对景伤怀，深感有负于陆游而求离去。陆游则爱之愈坚，并请岳父来调解。谁知调解不成，亲家决裂。陆游来到红楼，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后陆游修锦书托卖花三娘致唐琬，相约三年之期。三年后，陆游自福建归来，此时唐琬已改嫁赵士程。

春日，陆、唐二人相逢沈园，俱不能语。陆游询问送酒小婢，证实唐琬为他“断绝情爱而一心报国”。陆游悲愤交集，题《钗头凤》一阕于沈园粉壁。唐琬亦以词和之，不久即郁郁而终。秦桧死后，恢复中原之呼声日起。陆游在赴建业任的路上，于梅林祭奠唐氏，拔剑起舞。

除了现代剧《陆游与唐琬》，早在清中后期，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故事就被桂馥改编成戏曲《题园壁》，广为传颂。总体来说，戏曲中的陆游和唐琬，与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相似，表达了对封建家长干预婚姻的控诉；也与名剧《桃花扇》相似，融家国情怀和男女爱情于一身，塑造了陆游“至死不渝身许国，一生痛苦是婚姻”的形象。

笔者之所以着重提到越剧《陆游与唐琬》，是因为戏曲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书写和再现了历史。尽管有些情节未必有史料的佐证，却是几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陆游与唐琬的形象，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简要了解一下越剧中的陆游和唐琬，对于进一步了解沈园文化，是有益的。

三

如果戏曲是以艺术化的形式再现沈园陆、唐情事，那么沈园的诗词，无疑是以更直接、更真实的方式记录了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悲剧。这些诗作如同珍珠一般，至今仍闪耀着动

人的光芒。陆游创作了包括《钗头凤》在内的十余首沈园诗。下面,笔者将结合相关历史资料,对之进行辑录和论述。

在陆游的沈园诗作中,最著名的当然非那首《钗头凤》莫属了。它是一系列沈园诗的核心,是沈园诗词文化的基石,是陆游和唐琬爱情故事的见证和记录。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唐词)

关于陆游的《钗头凤》,后人有过诸多精彩的评价,如明代毛晋说:“陆游咏《钗头凤》一事,孝义兼挚,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溢于笔墨之外……令人不能读竟。”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放翁伤其妻之作也。‘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放翁妾别放翁词也。前则迫于其母而出其妻。后又迫于后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两词皆不免于怨,而情自可哀。”

关于《钗头凤》词及沈园情事,虽有质疑其真伪者,但不管怎么说,亦算渊源有自。最早的记录来自三位宋人的笔记——陈鹄的《西塘集耆旧续闻》、周密的《齐东野语》和刘克庄的《后村诗话》。

其中,陈鹄是最早记录沈园题壁的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中说:“余弱冠[淳熙年间(1174—1189)]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即陆词《钗头凤》)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1151)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

据考证,陈鹄是陆游的同时代人,生于高宗绍兴后期,少时曾客居会稽,与陆游之胞兄陆淞有诗文交情。陈鹄弱冠时,沈园已易主,改为许氏园。其时正值陆游入蜀,故陈鹄未及拜识。陈鹄只与陆淞交游,所见沈园题壁词《钗头凤》,所闻陆游婚变之事,当来自陆游长兄。所以陈鹄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唐琬的那首《钗头凤》,陈鹄只说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已不得其全。因此可能并非如后人所熟知的,唐琬也题了一首和词于沈园。今传唐琬之和词,根据《古今词统》所说,乃是明代好事者伪续而成。

陆游和唐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其婚变之始末,也有记录。除了陈鹄所记,另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一说:“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说:“放翁少时,二亲督教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事某官,与陆氏有中外。……”

今人黄世中先生在《〈钗头凤〉公案考辨》一文中总结了陆、唐婚变的四种原因:“惰学说”“语触秦桧说”“不育说”“嫉妒说”。黄世中持“语触秦桧说”:“唐琬父亲唐意‘文学气节

为一世师表’，因金兵围困，‘竟饿死江陵山中’（《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附）；国恨家仇，唐琬的抗金爱国思想对陆游在考试中上疏‘指斥朝政’‘语触秦桧’‘首犯贵权’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二亲’才迁怒于媳妇身上，非逼其解缡不可。”

看来，不管怎么说，陆游青年时期的婚变和其母亲是有重大干系的。关于陆游的婚变，最有力的说法应该出自他本人的记述。然而恰恰在早年的婚姻这件事情上，当事人陆游的说法十分模糊，似乎在回避什么。虽然《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留下了万余首诗作，但他却没有将早年的婚事明白地交代。这绝不是由于遗忘，因为他对这件事是刻骨铭心的，诗人在人生的各阶段，直到晚年，都在回忆着，情不能已。这在下面我们将讲到。其原因，很有可能如黄世中所列举的，此事牵扯到政治、母亲以及家族利益，因而只好抹去，不可详述了。

四

《钗头凤》题壁时间，周密说是绍兴乙亥岁(1155)，陈鹄说是“辛未(1151)三月题”，当以后者的记载为准。《剑南诗稿》是严格的编年诗，从中均能够找到对应。关于唐琬之卒年，陈鹄说是“未几，怏怏而卒”，周密说是“未久，唐氏死”，均未言明。从《诗稿》沈园诗推测，唐琬应该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此时陆游35岁，任福州决曹。

上面已经说到，陆游在他的人生的各阶段都在怀念着唐琬，尤其是唐琬死后，更是留下了不少凄美的诗篇。这与他的续娶妻子王氏形成了鲜明对比。陆游与王氏在一起生活五十余年，却未有什么诗词是为她而作的，其墓志铭上亦只是写了王氏生卒年及子孙名字而已，而对于早逝的唐琬，则完全不同。

显然，惊鸿一瞥的唐琬，在陆游心目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陆游对唐琬一往情深，他在20岁时写有《菊枕诗》(不传，当是新婚燕尔之情景)，27岁时有沈园《钗头凤》题壁，47岁时有《重阳》，60岁时有《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69岁时有《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76岁时有《沈园》，78岁时有《禹寺》，82岁时有《城南》，83岁时有《禹祠》，84岁时有《春游》。

笔者根据陆游的《诗稿》，以及其他资料，将这些沈园绝句及律诗按顺序整理如下。

第一，1171年，陆游47岁，入蜀经唐琬故乡作《重阳》诗：

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商略此时须痛饮，细腰宫畔过重阳。

第二，1184年，陆游60岁，作《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二绝：

采得黄花作锦囊，曲屏深幌自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晚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简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第三，1193年，陆游69岁，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二首：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第四，1200年，陆游76岁，作《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其二）

第五，1202年，陆游78岁，作《禹寺》二首：

暮春之初光景奇，湖平山远最宜诗。尚余一恨无人会，不见蝉声满寺时。

禹寺荒残钟鼓在，我来又见物华新。绍兴年上曾题壁，观者多疑是古人。

第六，1203年，陆游79岁，作《春日绝句》其五：

桃李吹成九陌尘，客中又过一年春。馀寒漠漠城南路，只见秋千不见人。

第七，1205年，陆游81岁，作《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醮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埋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第八，1206年，陆游82岁，作《城南》：

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第九，1207年，陆游83岁，作《禹祠》：

祠宇嵯峨接宝坊，扁舟又系画桥旁。豉添满箸莼丝紫，蜜渍堆盘粉饵香。团扇卖时春渐晚，夹衣换后日初长。故人零落今何在？空吊颓垣墨数行。

第十，1208年，陆游84岁，作《春游》：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总体来说，现存的沈园诗数量并不算多，但延续时间长，时间跨度大，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陆游从中年到晚年，一直对唐琬魂牵梦萦，字里行间透露着难以言明的痛苦，可见他对唐琬的情感的真挚与执着。每一首诗，都透露着作者的丰富感情，或酸楚，或挚爱，或自伤，或愧疚……沈园诗中提到菊花、柳树、枫叶、梅花，提到城南、林亭、桥、颓墙、扁舟、禹寺，有些标志性的地点如“城南”“禹寺”“禹迹寺”，都是与沈园——这块思念之地、伤心之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植物和地点，记载着他与唐琬点点滴滴的往事，寄托着他那最初的纯真与美好。下面，我们以第四组诗（即《沈园》二首）为例，试略做分析。

《沈园》二首作于庆元六年(1200)，时作者76岁，已是暮年之人，少小离家老大回，故地重游，令人触景生情，不能自已。周密《齐东野语》说：“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诗中说，城上的夕阳为我悲哀，沈园已经不是当年的沈园，伤心桥下流水依旧清澈，曾经倒映过美丽的惊鸿的身影。他引用《洛神赋》中状宓妃之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写出了少女时期的唐琬在春波桥上轻盈挪步、影照春水的美丽姿态。第二首诗，作者记得唐琬香消玉殒已四十年，恍如隔世，当年的青青柳树都已枯老，不再飘絮。而我也行将就木，成为会稽山的一抔泥土，唯一不变的，就是对唐琬的思念。这组沈园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近代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说：“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词。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陆游的沈园诗采取触景伤怀式的回忆，时态清晰，即景

即情，毫无雕琢之感，给人以亲力亲为的实在感。诗的语言天然、真诚，以绝句的形式，倾吐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思念、悲伤与无奈，读之令人黯然伤神。这些沈园诗，寄托着诗人即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亦不曾淡忘爱人，至死不渝之情。哪怕在自己生命的结尾，在最后一首诗《春游》中，诗人依然在回忆，“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说明当年两人青梅竹马，穿行于繁花绿叶之中。“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终于，在嘉定三年(1210)，陆游也与世长辞，两人才又在另一个世界相聚。

这些沈园诗，同许多描写爱情和恋情的诗歌相比，可以说是老年人的一曲悲歌，有点像苏轼的名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笔者之所以说沈园诗同苏轼的《江城子》一样，是老年人的爱情诗，是因为它褪去了青年人的血气，褪去了那份亢奋和激动，是一种只有经过漫长的人生积淀才会流露的深沉爱恋，就像一坛绍兴老酒，在时光中愈久愈醇，愈醇愈香，又像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争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在我们的印象中，陆游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诗词大多慷慨激昂，充满报国激情，如“提刀独立顾八荒”(《金错刀行》)、“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长歌行》)、“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即便嘉定三年(1210)在故乡山阴逝世之前，他给儿子的绝笔诗依然心系国家：“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然而，从以上对沈园情事及沈园诗的赏析中，我们则看到了陆游的另一面，即儿女情长的一面。其实任何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尤其对诗人来说，其对所爱之人必定是刻骨铭心的。从沈园诗中，就可见到陆游除了铮铮铁骨，亦有“公子情深”的一面，正如越剧中的两句唱词：“至死不渝心许国，一生痛苦是婚姻。”由此，笔者认为，陆游在写下他的著名的绝笔诗《示儿》以抒发他对“王师北定中原日”之遥遥无期的遗憾的同时，内心必定还有一处遗憾无人理会，这个遗憾是和唐琬有关的，是和春日的沈园——这个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

五

“浪迹天涯三长载，暮春又入沈园来。输于杨柳双燕子，书剑飘零独自回。”这是越剧《陆游与唐琬》中的唱词。也许，正是因为沈园文化中弥漫着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剧色彩，才使它显得那么凄婉动人。

这种悲剧色彩，对于我来说，又有着一种别样的意义。多少年来，笔者从绍兴地进进出出，或是求学，或是工作，或是出差，羁旅之人，总会有一种聚少离多、身如飘萍之感。而一旦回到家乡，就有一种落叶归根之感。

多少年来，不管是离去，还是回来，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去沈园转转。对于《钗头凤》及沈园诗，我很早就熟悉的，就会背。而诗中的忧伤凄切之情，想不到有一天竟然可以套用在自己身上。“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这些句子，有时候读下去是多么自然，多么贴切。“输于杨柳双燕子，书剑飘零独自回。”又如越剧中的唱词，我想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会有所同感吧。

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独自走在沈园的小径上，感慨世事浮沉，恍如隔世。细细思索，千年的时光，原来那么轻易就过去了，一切物是人非。时光荏苒，斯人已逝，往昔的爱恨情仇，都消逝了，只有墙上的《钗头凤》还在不厌其烦地诉说着那些陈年旧事。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一切未曾改变，且看池鱼戏水、闲庭落花，一如那个“红酥手，黄縢酒”的春天，只有园外的世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的，不如说，一切都未改变。因为那是诗和文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一切都是永恒的、不朽的。在那个世界，唐琬将永远以惊鸿般的缥缈和美丽，栖身在陆游的诗文中，倚靠在沈园的柳旁梅下，或是在那堵颓墙边哀怨而又彷徨。

注释：

① 以下考古工作及成果均参考刘侃：《沈氏园遗址考》，《文史知识》2005 年第 11 期。

② 黄世中：《〈钗头凤〉公案考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南宋山阴诗人葛天民诗文辑佚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李　娟

摘　要：葛天民是南宋前期由僧还俗的诗人，为僧时任寺院书记，掌书状，又从蓬居慧梵学诗，还俗后隐居西湖，与众多文士相交，写下大量诗作。葛天民今仅存《葛无怀小集》一卷，且多为还俗后所作，通过对现存各佛家典籍及诗文集、方志的查阅，辑出佚句、佚诗、佚文若干，皆为《全宋诗》《全宋文》等失收，可补充其缁时作品，对于了解葛天民出家时期作品的风格与情感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葛天民　葛无怀小集　辑佚　偈颂

葛天民，字无怀，越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前期由僧还俗的诗人。其为僧时名义铦，字朴翁，为佛照德光禅师法嗣，工诗擅书，禅教并通，还俗后隐居西湖，筑室于苏堤柳下。葛天民无论在家、出家皆与众多僧人、文士相交，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有诗集《葛无怀小集》一卷，收于《南宋群贤小集》，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有“葛无怀诗一卷，右会稽葛天民无怀之诗也”[①]。今存之葛诗数量不多，仅百首不到，不少与葛天民相交的诗人皆留有相与唱和之作，但相关诗歌皆不见于葛集。同为佛照禅师法嗣的居简曾为葛氏诗集作跋，云：“朴翁诗偈一十五，诗带庄骚，偈蜕玄妙……缁时一，敛髻后十四，缁时非不佳，终不若敛髻后衡从恣横。”[②]居简跋语透露葛天民诗集涵盖了其为僧时和还俗后的诗作，且很有可能达十五卷之多，足证其诗亡佚之重。

葛天民为僧时从佛照禅师习禅，且任禅院中的书记一职，掌一切书状，《佛祖统纪》《丛林盛事》等记录了义铦作住持入院记、祖师忌礼赞文的事迹。葛天民又曾向蓬居慧梵学诗，颇痴于此道，与其时之僧人、文人多有唱和，今存《葛无怀小集》中的诗歌已无僧诗多被诟病之“蔬笋气”，应是还俗后脱出言语窠臼的率性之作。考《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及日僧义堂周信（1325—1388）所集《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等，发现其中收录了不少义铦的偈颂，皆未收入当代诗文全集，《全宋诗》更是将葛天民与义铦分列，《全宋诗订补》修正这一缺漏，指出二者实为一人。近年来亦有一些学者在其诗文辑佚上发表了重要成果，如朱刚、

陈珏著作《宋代禅僧诗辑考》[3]，常妍硕士论文《〈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与〈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的对比研究》[4]等，为研究其诗文及行历提供了极大帮助。然多数成果并非葛天民相关针对性研究，因此并不全面。本文对葛天民诗偈、文句及篇目等进行搜罗，力求做到汇辑之广泛、全面。

一、诗偈

（一）佚诗

游孤山吊智圆

讲堂风月吊孤峦，已作崆峒问道山。却忆四华来石室，不堪九虎守天关。湖边幽草未成梦，竹外小梅初破颜。华表日斜丹灶冷，仙人化鹤几时还。（《释门正统》第五：智圆传）

按：《释门正统》记载，绍熙年间（1190—1194），山阴义铦游孤山，以诗吊智圆。题目为笔者据内容拟定。

天衣塔（在佛日寺）

朴翁宋人嗣拙庵

毗岚吹倒藤葛桩，扶起韶阳大法幢。黄鹤峰前藏不得，几回雁影落寒江。[5]

按："在佛日寺"及"宋人，嗣拙庵"等为义堂周信题注。《禅宗杂毒海》卷二同载此诗，著录作者为介石朋禅师，题为"天衣"，在"礼祖像"类目下，诗中有三处相异，分别为"天衣""葛藤桩""黄鹤楼"。天衣即北宋云门宗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云门宗创始人文偃禅师（864—949）曾弘法于韶阳，故诗中赞天衣禅师"扶起韶阳大法幢"。佛经中以葛藤比喻烦恼，有时也作"藤葛"，并无具体差别。而黄鹤峰与黄鹤楼虽一字之差，意义却大相径庭。《咸淳临安志》载"佛日净慧禅寺在桐扣黄鹤峰下"，桐扣即桐扣山，在今杭州市临平区西南，佛日寺即在黄鹤峰下。黄鹤楼则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与诗歌主题并不相关，显然原诗当为"黄鹤峰"，黄鹤楼或为传抄之误。显然《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所记准确程度更高，在无他证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此诗是朴翁所作。

雪

谁道谈玄口不开，虚空全是雨花台。从教散作诸方去，合水和泥又一回。[6]

谢少林蒲鞋

四棱踏地老无怀，正好重新买草鞋。成现送来虽着了，诸方无处可逻斋。[7]

回法衣遗径山佛照老师

鹤足黄梅错至今，径山休更老婆心。上方不挂丝毫许，谁道思深怨亦深。[8]

（二）佚句

以下残句皆出于《江湖小集》卷二十所收南宋李龏（1194—？）《梅花衲》集句诗。

采石浪寒青冢暗。

风标高古汉唐无。

无热天中第一仙。

平生一点调元意。

冰霜过了翩然去。

按：以上五句注引"义铦"；以下注为"铦朴翁"。

暖熨寒英只斗先。

龙脊桥边住最幽。

按：此句引自葛天民诗《竺涧梅》，"住最幽"原诗作"鹤膝幽"。"鹤膝"应指梅枝，状如鹤膝。黄庭坚诗云："红梅雪里与蓑衣，莫遣寒侵鹤膝枝。"任渊注："《吴都赋》：'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借此以言梅枝之瘦也。"[9]而李龏本首集句诗亦是咏梅之作，或为传抄之误，当以"鹤膝"为准。

惆怅西湖仙去后。

人间那得花如许。

草为床坐瓦为杯。

阅尽冰霜念已干。

花底自从和靖死。

月映横枝古涧寒。

自笑茅檐一树多。

年年魂傍陇头归。

暗香终不似孤山。

数枝斜桠涧横流。

按:此句同引自《竺涧梅》,原诗作“一枝斜桠水横流”。

瘦倚疏篁不解肥。

每爱花光画作图。

耐尽冰霜颇俗尘。

一段春愁雨带来。

一丛笛里送孤妍。

关心又一年。

此外,李龏集句中尚有四句引用今存全诗:“雪中多日静”引自《雪后》;“无言只断魂”摘自《即事》一首;“无处写幽怀”出于《春怀》;“炙背负斜阳”则是诗歌《郊园避暑》之末句,原诗作“负朝阳”。

(三)偈颂

瞌睡茫茫困思来,吃碗浓茶眼便开。四海五湖王化里,更无一物是尘埃。(《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四)

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宽。不知眼界宽多少,白鸟去尽青天还。(同上卷四)

春眠不觉晓,是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同上卷五)

按:《禅宗颂古联珠通集》著录作者为义铦,是针对《圆觉经》“住一切时不起妄念”的感怀之偈,为义铦借孟浩然诗作话头讥讽之语。

师子头落,罽宾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谁家瓮里无明月。(同上卷六)

好个栽松道者,临老无端打野。不识从本爷娘,负累周家小姐。浊港浸他不杀,养大便成奸猾。鼓弄黄梅七百僧,成群逐队争衣钵。(同上卷七)

不是风幡也可疑,却言心动甚言词。天生不受形容者,举世何人见得伊。(同上卷七)

说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卖柴翁。大都模样无多子,历劫如何用得穷。(同上卷九)

堕狐身与脱狐身,叶落花开几度春。名利只随骑马客,是非不到钓鱼人。(同上卷十)

大唐国里无禅师,噇酒糟汉难解注。只是无师苦口禅,天下无如黄蘗苦。(同上卷十六)

称意金鳞一上钩,华亭江水合西流。钓船尽底掀翻了,恼乱春风卒未休。(同上卷十七)

狗子佛性无,还他大丈夫。是非虽入耳,东壁挂葫芦。(同上卷十九)

临济师黄蘗,何曾把手行。掌腮并筑肋,孝顺两边生。(同上卷二十一)

一见不劳朱粉施,玄沙扫帚画蛾眉。只知掩得灵云丑,落尽眉毛自不知。(同上卷二十三)

路逢死蛇莫打杀,无底篮子须颺下。往往事从闲话生,莫将闲话为闲话。(同上卷二十四)

舞棹呈桡逢贼脚,扣舷三下亲擒捉。只这一枚都颺却,棹歌归去风涛落。(同上卷二十八)

张瓮李瓮,各有病痛。赤眼撞着火柴头,焦砖打着连底冻。(同上卷二十九)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同上卷三十五)

锯解秤锤血,滴滴地截断。生死疑根不,是等闲儿戏。(同上卷三十八)

五逆闻雷,露出尸骸。人间天上,无处堪埋。(同上卷三十九)

没量大人，抬脚不起。眼瞎耳聋，撒溺撒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韩信临朝底。（同上卷四十）

开口不在舌头上，咬断牙关供死状。莫教吞了大还丹，命根难断空惆怅。（同上卷四十）

大丈夫汉，红线不断。直饶亲见松源，敢保错来批判。（同上卷四十）

世间相常住，黄莺啼绿树。真个可怜生，动着便飞去。（《宗鉴法林》卷三）

国有定乱剑，家无白泽图。神仙张果老，踏破药葫芦。（同上卷三）

野老祭江神，乞儿打筋斗。莫作两般看，等是扬家丑。（同上卷十一）

蓦劄相逢不再三，才开臭口见乡谈。纸灯灭去饶端的，不许苍龙卧碧潭。（同上卷四十二）

雪覆千山没路歧，孤峰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虽增气，野老相逢不展眉。（同上卷六十二）

千刀万斧已成功，湖海横行没定踪。但得把艄人在后，面前不拍打头风。（《禅宗杂毒海》卷六）

按：《禅宗杂毒海》标注作者为“朴庵铦”，不知是否为“朴翁铦”之讹误。该集中另有部分偈颂归于作者“朴庵”名下，亦有“朴庵”所作的可能。

二、佚文

（一）不可刹那无此君（宋达摩山沙门义铦述）

空荡仮立中绝对，此乃天然体上名。

具破具立具法界，此乃天然名下体。

体不二故体常融，名非滥故名常定。

空彰荡德三具破，三千三谛是相如。

假彰建德三具立，三千三谛如是相。

中彰妙德具法界，三千三谛相如是。

界蹄十如三世界，事理因果依正尽。

三周正体不出此，只在平常一念中。

终穷究毕光极谈，甚深境界不思议。

以此为境曰妙境，三千三谛非他物。

以此为观曰妙观，三千三谛皆本无。

境即观故能所忘，是故初乘不名观。

境观难思何所用，只要刹那虚妄融。

妄心融处真亦亡，一牧了事随缘汉。

善恶都不思量着，任运恶灭而成善。

无用心处愿行增，一超直入如来地。

捏不成团劈不开，看来看去只成呆。

若能亲到呆田地，三观元来是祸胎。[10]

（二）南湖师祖宝云尊者斋忌疏（镜上义铦）

右伏以法源自远，注刹海以周流；慧日方中，映宝云而下饰。群机焕发，此道光严。式临示灭之辰，敢怠如生之敬。

恭惟中兴敬观宝云尊者大法师，应身日本，命世山家。视一切人，皆若同乡。大方无外，出两高第。咸于实地，游刃有余。疏正派于螺溪，散真风于象扇。某等仰高弥甚，向若茫然。玉（凡）［几］横经，恨不与当时之听众；尼坛下拜，愧滥称今日之孙谋。庶凭明信之熏，几展慈怜之鉴。

伏愿无生智焰，永联从上之光；常住妙华，益粲后来之秀。尽空末学，同趣圆乘。谨疏。昔鄮峰未更为禅刹，大洪天台教观，清凉大法眼禅师亦禀教于中。时宝云通公盖尝预讲，其四明、慈云皆为听众，其说见于鄮峰古碣。所谓玉（凡）［几］峰者，今阿育王山是也。[11]

按：葛天民乃山阴人士，其家约在镜湖（即鉴湖）南秦望山麓，故称“镜上义铦”。

三、存目

除以上得以保留全貌的诗文偈颂外，尚有少许作品仅存

题名，散见于他人题跋或唱和诗作，惜内容全佚。针对此类明确为葛天民所作的篇目（题目为笔者概括）进行整理，如附表所示：

附表　葛天民佚诗佚文篇目说明

篇目	出处	备注
西丘和尚朴翁禅师吟稿	海寿等编《了庵清欲禅师语录》卷九	西丘和尚即天目文礼禅师，曾谒佛照禅师，此稿即二人唱和之集
和渊明归去来兮辞	戴栩《浣川集》：《跋葛朴翁所和渊明归去来兮辞》	报恩信禅师藏葛天民和诗原稿，示之戴栩，命为作跋
庐山法师忌礼赞文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	庐山慧远法师，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志磐撰斋忌疏，葛天民述礼赞文
杭州北关接待寺碑文	周密《癸辛杂识》	碑文乃葛天民撰，姜夔书
佛照禅师入径山万寿寺记	道融《丛林盛事》卷二	佛照禅师住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有义铦书记者为其文
游兰亭	姜夔《和朴翁游兰亭韵》	绍熙四年（1193），二人同游
悼牵牛	姜夔《朴翁悼牵牛甚奇余亦作》	庆元二年（1196），二人同宿武康丞宅，咏牵牛
呈吴韬仲	叶绍翁《和葛天民呈吴韬仲韵》	吴韬仲，名纲

此外，考葛天民之交游，与其相交的南宋文人不少留下了次韵之作，如翁卷《次韵葛天民》、陈造《又次朴翁韵四首》、韩淲《次韵铦师壁间句四首》《次韵抱朴君同紫芝见过》、苏泂《次韵葛天民》二首等，足见彼时葛天民与友人以诗相会之情形。对葛天民佚诗佚文进行搜罗和汇集，不仅对其诗文作品进行了补充，了解其诗歌主题和风格的演变，更可从中窥探其为僧时的经历，为详细考察葛天民的生平提供丰富的材料。

注释：

①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205 页。

② ［宋］释居简撰；纪雪娟点校：《北磵文集（校勘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39 页。

③ 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88—490 页。

④ 常妍：《〈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与〈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的对比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⑤ ［日］义堂周信：《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之上，《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八十八卷，东京：日本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1970—1973 年，第 11 页 a 栏。

⑥ ［日］义堂周信：《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之上，《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八十八卷，东京：日本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1970—1973 年，第 22 页 a 栏。

⑦ ［日］义堂周信：《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之上，《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八十八卷，东京：日本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1970—1973 年，第 79 页 c 栏。

⑧ ［日］义堂周信：《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之上，《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八十八卷，东京：日本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1970—1973 年，第 172 页 c 栏。

⑨ ［宋］黄庭坚著；［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013 页。

⑩ ［宋］义铦述：《不可刹那无此君》，《卍新纂续藏经》第五十七册，东京：日本国书刊行会，1975—1989 年，第 121 页 b 栏。

⑪ ［宋］宗晓辑：《四明尊者教行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六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年，第 932 页 b 栏。

熊汝霖之伯乐陈则采家世、生平、师承考实

——以厦门出土的陈则采之父陈世准墓志铭为中心

龙岩学院　刘　涛

摘　要：陈则采（1572—1640），福建厦门人，晚明名宦，是熊汝霖的伯乐，其家世、师承、宦绩、交游等方面历来未有研究。通过考察其父陈世准（1539—1612）墓志铭，从中发现陈则采曾奖掖熊汝霖、郭之奇，对龚云致、赵参鲁、习孔教、熊汝霖、郭之奇等历史名人研究多有裨益。

关键词：墓志铭　陈则采　熊汝霖　龚云致　明代

熊汝霖是晚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其伯乐陈则采历来鲜为人知。为此，本文将围绕陈则采之父陈世准墓志铭，搜集《明实录》《明清历科题名碑录》和地方志、文集等史料，通过还原陈世准墓志铭的书写过程，考证陈则采的家世、生平、师承、交游，揭示陈则采应有的历史地位。

皇明

明古峰陈封君暨配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

赐进士第，奉政大夫，云南按察司佥事，前湖广按察司副使，湖广道监察御史，奉敕督理长芦、山东、河南等处盐课，巡按芦、凤、淮、扬，通家眷生龚云致顿首拜撰。

吾郡同邑嘉禾里古峰陈公者，乡之古君子也。余诸生时，公遣其子启心君禀学于余，而公之馆舍密迩，时时督诲之。朝夕告从，相得欢甚，以是知公最稔。岁之壬子，公捐宾客。启心君方补楚之应城令，闻讣驰归，守丧三载，谋所以葬公者，持公之行状，跪而丐铭于余。卜地未决，迟之就草。是岁，启心归自揭阳，复造余而请焉。余以通家之谊不忍辞。

按状：公讳世准，字良文，古峰其别号。先世从宋高宗南渡有功，封进仪副尉，生子用官，广东南海令。嗣后科贡蝉联不绝，九传而于礼公，侨居于今之官兜。复四传而生果斋公，公之父也。果斋有子四人，公居仲。果斋督教诸子，独属意公，谓其能亢宗。而公亦励志勤学，为同侪所推逊，每试辄高等，以数奇不及。补弟子员，顾其淬砺之志，未尝一息少驰。迨启心君髫年，俊颖公遂一意督责，启心之十二岁游庠，为大司寇赵心堂先生贤学首拔，皆公义方所就也。少宗伯习公豫南司理吾泉闻公善教子，延启心与郡，之髫而诸生者学于公署，召公见，与语而赏识之，其见重于钜公如此。公尝与余言：“大

丈夫屈首一经，即未能自致青云，奈何局蹐辕下？”辛卯启心领乡书，诸亲用谓公可藉此开颜，复游以待恩命矣！公终不忘故业，下帷如初。岁庚子，公年且六十犹应府县试，启心公名上之郡伯窦淮南公，适余在座，笑语窦公谓：“此孝廉中无两者。”窦公甚壮之，而上之督学使者。盖公之锐于进取，老而不衰如此。公貌若不腾衣处，乡党恂恂而至，大义所在，则毅然以身肩之。先是其功兄有住宅一区，族之富而黠者，觊其子荡而谋夺之，公奋然会诸兄弟曰：“此吾祖旧物，奈何为强食所吞，必逐之！”竟讼之官，而捐己资，以复之。族人以此多公，公故食贫，而节操甚坚。方启心君令新昌归，以俸资十金为公寿，公不喜也。俄而见新昌士民有去思之刻，则怡然曰：“儿居官当如是。”盖公之生平持身与其所以督课子者，皆笃于大义，而不为世俗媕阿之态，谓之曰：古君子岂虚哉？

室陈孺人，为店前陈翠峰女，性勤俭，睦妯娌，孝舅姑。方古峰公之贫而舌耕，孺人脱簪珥市地数亩，课童仆自耕，以佐之功杼之声，昼夜不辍，攻苦茹淡者数十年。迨启心君筮仕为令，而衣服饮食犹然儒素，盖其天性然也。古峰公晚年娶妾，生三子，别为居食。孺人恬不为意，抚妾之子无异己子也。此尤人所难哉！

公生嘉靖己亥年七月初六日，卒万历壬子年三月十八日，享寿七十有四。孺人生庚子年八月廿三日，卒万历戊申年四月廿五日，享寿六十有九。

丈夫子五，长则采，即启心君，历仕浙新昌、楚应城、粤揭阳三县令，娶吴仓吴文石女；次则赓，即命珪，府庠生，娶淘沙林双峰女，俱母出。三则都，聘塔头林习潜女；四则俞，聘仙岳叶肇南女；五则绎，未聘，俱妾出。女子一，适邑庠生李肇元，母出。孙男五：长于殿，次于宸，三于阶，四于宰，五于亹。于殿，即梦龙，府庠生，娶提学佥事刘汝楠次子孙太学生光国女；于阶聘参宪林一材子春元炎长女，俱则采出。于宸，娶邑庠生杨萼标女；于宰、于亹尚幼，俱则赓出。孙女五：一适知府张锡长男邑庠生纪，一适山边王辅吾长男邑庠生恩重，一

陈世准墓志铭志石

许邑庠生郑复雅次男公弼，俱则采出；一适中左所千户赵完璧亲弟如璧男十老，一尚幼，俱则赓出。

余绳绳未艾云。盖余志公之墓，而有感于今之世也。势利薰人，子弟稍寸竖，其父兄即饰车骑为富贵容，武断乡曲，欺凌族党，靡所不至。公性寡交，闾里中有相争者，欲直于公，公但摇手谢之，布衣徒步，不异寒儒，即兴之苍头，亦辄麾去，里中人不识为陈封君也。呜呼！若公者信召以风世，而不愧于古人，是可以铭矣！

铭曰：

陈公厚积，隐而名尊。云山栖魄，蛰而身存。有子彬彬，玄黄待焚。偕藏德耦，乡之清芬。亿万斯年，其尚知闻此陈氏封君。

公以戊午年十一月念玖日，偕孺人合葬于云顶插香案山之阳，坐乙向辛，兼卯酉。

万历戊午年十一月吉日

孝男：则采、则赓、则都、则俞、则绎

同勒石

一、陈则采家世考辨

陈则采是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官兜社（今福建厦门）人，其父陈世准生于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卒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宣称其祖先在南宋时入闽，所谓二世祖陈用官曾任南海知县，阙载万历《南海县志》，未有实据。[①] 陈氏宗族九世祖陈礼“侨居”“同邑嘉禾里”“官兜”，即开基同安县嘉禾里官兜社。官兜社陈氏四世陈果斋，是陈世准之父，重视教育，在四子中认为次子陈世准将来可振兴家业。陈世准并未自满，反而更加努力学习，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在同案中颇有名望。随后，陈世准“补弟子员”，即考取同安县儒学生员，继续刻苦攻读，未曾有一丝懈怠。

陈世准的原配孺人陈氏，是同安县嘉禾里店前社陈翠峰之女，两人同姓，未因此不婚。陈氏生于嘉靖庚子(1540)，卒于万历戊申(1608)，生活勤劳俭朴，与妯娌和睦相处，孝顺公婆。陈氏刚嫁到陈世准家中时，陈世准还是一个贫寒的私塾先生，陈氏见状，摘下发簪、耳环变卖，购置土地雇用童仆农耕，贴补家用。陈世准受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晚年见原配仅生两子，遂纳妾，生有三子，另外安家生活。陈氏却视侧室庶子如己出。

陈世准有五子一女，其中长子、次子、长女均是原配陈氏所生，三、四、五三子是侧室所生。长子陈则采，即陈世准墓志铭中所云“启心君”“启心先生”，历任浙江新昌、湖广应城、广东揭阳知县，娶妻同安县嘉禾里吴仓社人吴文石之女；次子陈则赓，字命珪，泉州府儒学生员，娶妻同安县嘉禾里淘沙社人林双峰之女；一女嫁给同安儒学生员李肇元。三子陈则都，聘同安县嘉禾里塔头社人林习潜之女；四子陈则俞，聘同安县嘉禾里仙岳社人叶肇南之女；五子陈则绎，未聘。陈世准成年诸子均与同为嘉禾里居民联姻。

陈世准有男孙、女孙各五人。长孙陈于殿，字号梦龙，泉州府儒学生员，迎娶提学佥事刘汝楠次子国子监生刘光国之女；次孙陈于阶，聘参宪林一材之子的长女，均是陈则采所生。三孙陈于宸，娶同安儒学生员杨萼标之女；四孙于宰、五孙于亹尚幼，均是陈则赓所生。长孙女嫁知府张锡的长子、同安县儒学生员张纪；次孙女嫁同安县嘉禾里山边社人王辅吾长子、同安县儒学生员王恩重；三孙女许配给同安县儒学生员郑复雅次子郑公弼，均是陈则采所生。四孙女嫁福建都指挥使司永宁卫中左所千户赵完璧的胞弟赵如璧之子赵十老；五孙女未及笄，均是陈则赓所生。

陈世准在其长子陈则采步入学龄时，就非常重视陈则采的学业。陈则采年仅十二岁就考取秀才。陈则采的伯乐为“大司寇赵心堂先生”。赵参鲁，号心堂。《明隆庆五年

进士题名碑录(辛未科)》记载,其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2]。《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二月丁亥)原任福建佥事赵参鲁为福建佥事,各提调学政。”[3] “(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壬寅)升福建佥事赵参鲁为光禄寺少卿。”[4]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乙亥)升吏部左侍郎赵参鲁为南京刑部尚书。”[5] 赵参鲁在万历十一年(1583)担任福建佥事,提调学政,十一月离任,陈则采是年秋入泮,宗师为赵参鲁。赵参鲁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故称“大司寇”。乾隆《福建通志》记载:赵参鲁“万历中提学佥事,时学使多阿执政意,操士如束湿,务在汰多录少,参鲁一以宽行之,所甲乙多奇中”。[6] 赵参鲁在任期间不唯上,一改过去选拔人才的办法,广纳贤才,所取秀才后来多有成就,陈则采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陈世准崇文重教非常赏识的“少宗伯习公豫南司理吾泉”,即泉州府推官习孔教,万历《泉州府志》有传:

习孔教,庐陵人。隆庆戊辰进士,翰林院检讨,沉毅方正,为时相所挤,谪郡推官。时郡中王恭质用汲以建言忤时相,削籍家居,相与往返讲道论学。尤精人伦,鉴所赏,拔诸生史继偕、刘弘宝、潘洙、李开藻,督课业,皆为名人。时相败,召还,历官南京礼部侍郎。[7]

习孔教官至南京礼部侍郎,故称“少宗伯”,“习公豫南”即习孔教,号豫南,《明隆庆二年进士题名碑录(戊辰科)》记载,其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民籍”[8]。“时相”,指时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五年十一月丁卯)吏部考察庶官,凡察五十一人,内翰林院修撰习孔教以浮躁论,命致仕闲住,降调俱如例。”[9]《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二月丙戌)翰林院修撰习孔教,当邹元标廷杖谪戍时,孔教以桑梓往视,且敛赠路费以资其行。居正恨之,乃乘星变考察,谪为泉州推官,迨升邵武同知,遂褫职。”[10] 万历五年(1577),时任翰林院修撰的习孔教,因关心遭到谪戍的同乡邹元标,遭到张居正的排挤,被贬谪到泉州府担任推官。泉州虽然富庶,却地处王朝边缘海疆。

习孔教听闻陈世准善于培养子弟,就延请陈则采到泉州府城,同泉州府城秀才们就读于公署。习孔教与陈世准交谈,非常赏识陈世准。陈世准曾对龚云致谈及子弟教育:“大丈夫屈首一经,即未能自致青云,奈何局蹐辕下?”陈世准希望陈则采“学而优则仕”。陈则采考取举人后,亲朋好友向陈世准道喜:这下光耀门楣,以后不必教书。然而,陈世准并未因此优哉游哉,始终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如同当初一样。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陈世准年过六旬,仍参加同安县、泉州府考试。

陈世准墓志铭中所谓“郡伯窦淮南公”,即万历《泉州府志》所载万历年间泉州府知府窦子偁。窦子偁,“合淝人,由进士,以户部郎中升,二十六年任”,其继任程达“二十九年起用”。[11]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担任泉州府知府。

陈则采将陈世准参加科举考试的消息告诉时任泉州府知府窦子偁。恰巧龚云致在场,他笑着对窦子偁说:此科举人没有两人。窦子偁对陈世准年过花甲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感佩不已,特地将情况上报给福建提学道。

陈世准关心宗族。其功兄遭到为富不仁的族人欺凌,他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打官司,助功兄夺回房产,还省吃俭用捐资救济,备受族人称道。陈世准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却大义凛然,坚持节操。其时,陈则采担任新昌知县,回到家中,用俸禄十两白银为陈世准祝寿,陈世准不悦。然而,当陈世准看到新昌士子、百姓依依不舍陈则采离任,为之勒石竖去思

碑时，转而眉开眼笑，勉励陈则采："我儿做官，就应该这样！"龚云致认为陈世准是古之君子。龚云致认为其时社会利欲熏心，贪求享受，炫耀财富，武断乡曲，欺凌族人，无恶不作，陈则采却能"出淤泥而不染"。陈世准不喜交际，邻里相争，请其裁断。陈世准身穿布衣，无异于寒儒。同乡也有认不出其就是"陈封君"。

陈世准墓志铭中所谓"封君"，是指陈世准因其子陈则采父以子贵，获封父子同职。万历《泉州府志》收录的阳思谦《重修泉州府志序》落款"万历四十年岁次壬子九月朔"[12]，可知该志修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九月，其时陈世准已去世半年，并未记载陈世准获封情况，应是万历《泉州府志》阙载。

陈世准与其原配陈氏，在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十一月二十九日，合葬于厦门云顶。虽然陈世准晚年与侧室同住，但去世后仍与其原配合葬。

二、陈则采生平事迹考实

陈世准墓志铭除了记述墓主陈世准生平事迹外，多次提及陈则采，此与嫡长子备受关注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陈则采并非其祖父的长房长孙，却是其父嫡长子，就其父一家而言，具有一定的权威。

由于陈世准墓志铭撰写时，陈则采仍在世，因此通过旧志记载，可初步了解陈则采的生平事迹。就现存旧志而言，陈则采最早见载旧志始于万历《泉州府志》，同安县嘉禾里隶属泉州府。万历《泉州府志》记载：陈则采是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同安学，官知县"。[13]

康熙《大同志》始载陈则采传略：

陈则采，号对墀，嘉禾官兜人。年十二冠童子军，初令应城，以终养告归。后任揭阳，首敦学校，造就人材。熊汝霖、郭之奇皆所赏拔。有惠爱，阳人祀生祠焉。迁王府长史，不赴，卒年六十九。[14]

乾隆《泉州府志》据此为陈则采立传：

陈则采，号对墀，同安人，年十二冠童子军。万历辛卯举于乡，初令应城，以终养告归。复任揭阳，首敦学校，造就人材。熊汝霖、郭之奇皆所赏拔。有惠爱，揭人立祠祀焉。迁王府长史，不赴，卒年六十九。(同安志)[15]

"阳人""揭人"，均指揭阳人。

墓志铭称陈则采为"启心君"，"启心"是陈则采的表字，为旧志阙载。陈则采万历十一年(1583)入泮，时年十二岁，以此逆推其生于隆庆六年(1572)，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享年六十九岁。

墓志铭记载陈则采曾获习孔教耳提面命，《陈则采传》《习孔教传》对此均阙载。就龚云致而言，《习孔教传》提及奖掖的泉州四名人：史继偕，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晋江人，榜眼，任南京吏部侍郎"；刘弘宝，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晋江人，翰林院庶吉士，都给事中，布政司参政"；潘洙，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晋江人，任吏部郎中，布政司参政"；李开藻，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永春人，任提学副使，尚宝司卿"。史继偕"晋江学"，刘弘宝"晋江学"，潘洙"晋江学"[16]，均是晋江县儒学生员，与龚云致是晋江同乡，龚云致对此是知情的。

万历十年(1582)举人有"李开藻，永春学，癸未进士"[17]。李开藻虽是泉州府永春县儒学生员，却与龚云致是同科举人、同科进士，龚云致对李开藻获得习孔教奖掖也是知情的。

万历《泉州府志》主纂黄凤翔，《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年正月癸亥)编修黄凤翔、习孔教补展书官。"[18]"(万历五年八月己卯)编修高启愚、习孔教、范谦、黄凤翔俱升修

撰。”[19] 黄凤翔与习孔教同为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年(1576)正月又同任展书官，是年六月经张居正推荐，同任《明会典》纂修官，翌年八月一同升任修撰。万历《泉州府志》记载：隆庆二年(1568)进士黄凤翔，“晋江人，一甲第二人，官南京礼部尚书”[20]，同科进士“王用汲，晋江人，官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质”[21]。黄凤翔与王用汲是同科进士，又是晋江同乡。黄凤翔与习孔教关系密切，又与习孔教的泉州挚友王用汲颇有渊源，对习孔教奖掖泉州后学是知情的。

陈世准墓志铭记载陈则采曾获习孔教奖掖是可信的，万历《泉州府志》未载习孔教奖掖陈则采应是阙载所致，究其原因，应与陈则采与史继偕等四人相比，仅是举人功名、三任知县，难以称得上是“名人”，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故而不载有关。

陈世准墓志铭记载陈则采初任“浙新昌”，但陈则采故里泉州府及其晋江县旧志均未记载陈则采曾任新昌知县，均载陈则采初授应城知县。查道光、同治、民国《新昌县志》所载万历年间知县名单均无陈则采，但康熙《绍兴府志》却称：“明新昌知县”有“陈则采，同安人”[22]。可见陈则采确实曾担任新昌知县，陈世准墓志铭记载是可信的，陈则采故里旧志以及新昌旧志均阙载陈则采这一履历。陈世准墓志铭记载陈则采离任新昌之际，曾获“新昌士民有去思之刻”，深得士林、民众爱戴，有去思碑，陈则采显然是新昌名宦。乾隆《泉州府志》“陈则采传”述及熊汝霖、郭之奇均得陈则采的“赏拔”，陈则采仅任知县，根据知县与秀才关系较为密切，可见陈则采应与熊汝霖、郭之奇的入泮有关。熊汝霖(1597—1648)，《明崇祯四年进士题名碑录(辛未科)》记载，其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民籍”[23]；康熙《绍兴府志》记载：天启元年举人有“余姚”“熊汝霖”[24]。熊汝霖在万历末年入泮。熊汝霖是绍兴府余姚县人，陈则采曾任绍兴府新昌知县，熊汝霖应在陈则采任职新昌知县期间获得垂青，入泮新昌县儒学生员，陈则采离任新昌之际，作为士子参与为之竖去思碑。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撰写墓志铭之际，熊汝霖尚未中举，由此未载墓志铭。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同安知县“熊汝霖，崇祯四年任，有传”，其继任吴应恂“十一年任”。[25] 熊汝霖崇祯四年(1631)到十一年(1638)任同安知县，陈则采其时健在，熊汝霖初授同安知县即成名宦，除了与其自身努力有关外，还与其师陈则采有一定关系。

陈世准墓志铭记载：“岁之壬子，公捐宾客。启心君方补楚之应城令，闻讣驰归。”万历壬子(1612)，陈则采方补湖广应城知县。查雍正《应城县志》仅载：“万历”年间知县有“陈则采，乡举”。[26] 该志阙载陈则采到任时间，陈则采任职应城时间应以陈世准墓志铭记载为是。

陈世准墓志铭又云：“是岁，启心归自揭阳。”此“是岁”指万历戊午(1618)，其时陈则采从揭阳知县任上归里。陈则采守丧三年后担任揭阳知县，其时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到万历戊午(1618)正好担任三年知县归里。查乾隆《揭阳县志》仅载：万历年间知县有“陈则采，福建晋江举人，民为立祠”。[27] 陈则采是同安县儒学生员，参加福建乡试中举。该志记载陈则采籍贯有误，究其原因，应与陈则采入泮后受到习孔教垂青被选送泉州府公署就读有关。但是，该志记载陈则采获揭阳百姓建立生祠是可信的，可见墓志铭也有遗漏，应与陈则采为人低调有关。郭之奇(1607—1662)，《明崇祯元年进士题名碑录(戊辰科)》记载，其是“广东潮州府海揭二县民籍”[28]，在十一岁入泮，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应在陈则采任职揭阳时入泮揭阳县儒学生员，陈则采离任后，参与兴建生祠纪念陈则采。

陈世准墓志铭记载陈则采子孙联姻情况，其中有刘汝楠、林一材等名宦。嘉庆《同安县志》记载："刘汝楠，县前人，湖广提学道，祀乡贤，有传。"[29]该志又云："林一材，即丁卯乡试林一雉，改今名，从顺亨泥人，官至参政，祀乡贤，有传。"[30]户籍方面，《明嘉靖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壬辰科）》记载："刘汝楠，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军籍。"[31]《明隆庆五年进士题名碑录（辛未科）》记载："林一材，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民籍。"[32]陈则采超越明代户籍之分，分别与同安军籍、民籍联姻，与刘汝楠、林一材后裔交游。陈则采有此观念，应与其塾师龚云致出身盐籍，宗师赵参鲁、伯乐习孔教出身民籍有关，对其赏拔民籍出身的熊汝霖、郭之奇产生积极的作用。

卢若腾《傅象晋小传》记载：

丙戌秋，虏入闽中，令士民剃发；象晋曰："吾头可断，发不可剃也！"是冬，余座师熊雨殷先生奉鲁王自浙航海入闽，驻师鹭门。[33]

此"丙戌"指南明隆武丙戌(1646)，"熊雨殷"，熊汝霖的别号，"鹭门"指厦门。熊汝霖在清军入闽后，奉南明鲁王由浙入闽，屯兵厦门抗清，再次来到陈则采故里。

卢若腾是同安县"翔凤十九都贤聚人"，崇祯九年丙子(1636)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34]卢若腾是熊汝霖的门生，陈则采的同乡后学。由于卢若腾、熊汝霖、郭之奇的抗清活动，导致嘉庆《同安县志》删除《陈则采传》所载陈则采赏拔熊汝霖、郭之奇之举。

陈则采故里泉州府及其同安县旧志阙载陈则采初授新昌知县，由于陈则采在担任新昌知县期间奖掖熊汝霖，可见是有意淡化陈则采与熊汝霖之间的关系，是选择性失忆的结果。

陈则采是如何取得这一成就的？陈则采取得这一成就除了与其父陈世准的家教有关外，还与其老师有关，尤其是私塾先生龚云致，而龚云致是墓志铭的作者。

三、陈则采恩师龚云致

龚云致时为生员，陈世准与之相谈甚欢，安排其子陈则采师从龚云致，时常到龚云致私塾督促陈则采学业。陈世准去世，陈则采方补湖广应城知县，返乡守丧三年后，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请龚云致撰写墓志铭。直到"是岁"，即墓志铭落款时间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陈则采离任揭阳归里，再次请龚云致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最早写成。

龚云致是"府学，时应子，癸未进士"[35]，此"府学"指泉州府儒学，即以府学生员在万历十年(1582)中举，此前已同陈世准交往。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龚、陈两家已相交三十六载。龚云致之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龚时应，晋江学"[36]，以晋江县儒学生员中举。

龚云致，乾隆《福建通志》有传，乾隆《泉州府志》记载颇为详细：

龚云致，字润寰，晋江人，万历壬午、癸未联第进士，授中书，擢御史，视鹾长芦。时潞府请以彰、卫二盐归藩府，云致力阻之。故事各官朝潞府拜门外，云致移文长史，以拜门乃天子之仪，不敢陷殿下于失礼。王为出朝，赐宴及币，一如藩封例。复按淮阳，使道抵家。为言者所论，左迁兵部，出为湖广副使，京察转汝州守，迁云南佥事，以沐镇兵归兵备，致政归家。邑南洑田塘，周围三十里，为田八千亩有奇，岁久塘浅岸圮。云致自汝州归，时请于邑令顾士琦，履亩开浚，颇有成绩。未几，趣任职滇，历一纪堤岸复崩，陂塘成野，云致既归，捐资尽筑，以石费几三百金，斗粟铢钱不及乡民。又虑暴雨水涨，一陡门难以骤泄，就横涵直圳，增设赐二间。修葺土祠，

春秋告祭，士民欢欣歌舞，请庄际昌为文勒碑纪绩焉。(《通志》《参霞栖藏稿》)[37]

《明万历十一年进士题名碑录(癸未科)》记载："龚云致，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盐籍。"[38] 龚云致出身煮海为盐之家，社会地位较低，由此刻苦攻读。

龚云致在万历十年壬午(1582)考中举人，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联捷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历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奉敕督理长芦、山东、河南等处盐课，巡按长芦、凤阳、两淮、扬州盐场，湖广按察司副使、汝州知州、云南按察司佥事等职。其勇斗潞王、沐府，致仕归里。状元庄际昌为之立碑。

万历十六年(1588)，龚云致出任湖广道监察御史：

(万历十六年三月戊申)吏部都察院题考选行取博士、中书行人、推知等官。……龚云致……凡二十九人，各志行端谨，器识老成，足任风宪之司，分注南北各道御史试职。[39]

万历十七年(1589)，时任长芦巡盐御史的龚云致颇有作为：

(万历十七年九月丙申)长芦巡盐御史龚云致言：长芦、山东二运司分解宣府饷银共四万八千两，欲比山东布运二司额解辽东民运事例一体类，解太仓转发。从之。[40]

万历十九年(1591)，龚云致遭到弹劾，被降职处理：

(万历十九年三月乙巳)江西驿传副使范涞题参：淮扬御史龚云致，枉道回家，骚扰驿递……事下部院会议，得旨：御史自不简饬，何以察奸？龚云致不堪宪职，着降杂职，南京衙门用。[41]

数日后，龚云致转任应天府照磨所简校：

(万历十九年三月壬子)降御史龚云致，添注应天府照磨所简校。[42]

万历二十六年(1598)，龚云致由兵部郎中升任湖广副使，再度宦游湖广：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丁亥)升兵部郎中龚云致、贵阳知府刘之龙，俱为湖广副使。[43]

万历三十三年(1605)，龚云致降任汝州知州：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癸卯朔)降原任兵部郎中龚云致，为河南汝州知州。[44]

龚云致撰写陈世准墓志铭时已家居。龚云致连遭谪贬，却恪尽职守，与不法藩王、权贵作斗争，促使陈则采未因怀才不遇而自暴自弃，终成名宦。龚云致悉心培育陈则采，使陈则采对熊汝霖、郭之奇也关怀备至、谆谆教诲。龚云致先后得罪藩王、沐府，对陈则采的仕途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陈则采是熊汝霖的伯乐，虽然陈则采与熊汝霖的渊源阙载陈则采之父陈世准墓志铭，仅见载旧志，却是可信的，应回到历史现场深入考察。

第二，陈则采最早发现熊汝霖、郭之奇的才华，其新昌、揭阳宦绩对熊汝霖、郭之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新时期历史名人墓志铭研究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置身更广阔的时空深入研究，重建史实。

注释：

① ［明］刘廷元，王学曾纂修：万历《南海县志》卷四《职官表》，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刻本。

②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916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473—2474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674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六,《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5117页。

⑥ ［清］郝玉麟修：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第47页a。

⑦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官守志下·古今宦绩·国朝·习孔教》，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5册，第33页b。

⑧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902页。

⑨ 《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九,《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496页。

⑩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471页。

⑪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九《官守志上·古今郡守志·国朝·泉州府知府》，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4册，第14页b。

⑫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末，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页a。

⑬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册，第21页a。

⑭ ［清］朱奇珍修：康熙《大同志》卷六《人物志一》，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抄本，第19页a。

⑮ ［清］怀荫布修：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三《仕绩·明仕绩三·陈则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第5页a。

⑯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册，第20页a。

⑰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册，第19—34页。

⑱ 《明神宗实录》卷四十六,《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54页。

⑲ 《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438页。

⑳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进士》，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册，第29页b。

㉑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等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进士》，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6册，第30页b。

㉒ ［清］张三异修；［清］王嗣皋纂：康熙《绍兴府志》卷三十《职官志四·县职·明·新昌》,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15册，第28页a。

㉓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1272页。

㉔ ［清］张三异修；［清］王嗣皋纂：康熙《绍兴府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三·举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18册，第61页a—61页b。

㉕ ［清］怀荫布修：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七《文职官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第78页a。

㉖ ［清］李可宗修：雍正《应城县志》卷三《职官》，清雍正四年（1727）刻本，第4页b。

㉗ ［清］刘业勤修：乾隆《揭阳县志》卷四《职官志·职官》，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第4页b。

㉘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 2 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年，第 1256 页。

㉙ ［清］吴堂修：嘉庆《同安县志》卷十七《选举上》，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 19 页 b—20 页 a。

㉚ ［清］吴堂修：嘉庆《同安县志》卷十七《选举上》，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 23 页 a。

㉛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 1 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年，第 684 页。

㉜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 2 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年，第 915 页。

㉝ ［清］卢若腾著：《岛噫诗·附录：留庵文选·传》，孔昭明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第二百四十五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年，第 76 页。

㉞ ［清］吴堂修：嘉庆《同安县志》卷十七《选举上》，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 46 页 b、31 页 b。

㉟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 6 册，第 19 页 a。

㊱ ［明］阳思谦修；［明］黄凤翔纂：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志上之中·国朝科目志·乡举》，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刻本，第 6 册，第 12 页 b。

㊲ ［清］怀荫布修：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九《明循绩·龚云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第 43 页 a—43 页 b。

㊳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 2 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年，第 989 页。

㊴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3703 页。

㊵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五，《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4025 页。

㊶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4315 页。

㊷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4320 页。

㊸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四，《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6017 页。

㊹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二，《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7709 页。

2

史海钩沉

SHIHAI GOUCHEN

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村鲁氏家史口述史拾遗与考辨

绍兴鲁迅纪念馆　杨晔城　斯红军

相对鲁迅家世，绍兴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村鲁氏家史的史料有限。一方面，鲁氏宗祠、鲁氏家祠、鲁氏族谱这些第一手的实证实物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安桥头鲁氏老台门中只有朝北台门因与鲁迅关系密切得以保留，其他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已过世，有关部门曾对安桥头鲁氏家史开展过普查，但相关史料尚待补充完善。近期笔者通过实地走访鲁氏后人，对新发现的一些鲁氏家史进行整理和辨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鲁迅外婆家鲁氏家史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一、宝记台门和鲁四老爷

清明后的一天，笔者在安桥头村文化员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朝北台门东南角的鲁阿良家。现年75岁的鲁阿良正名鲁振权，当过13年的安桥头村村长，一辈子留守在祖居宝记台门的遗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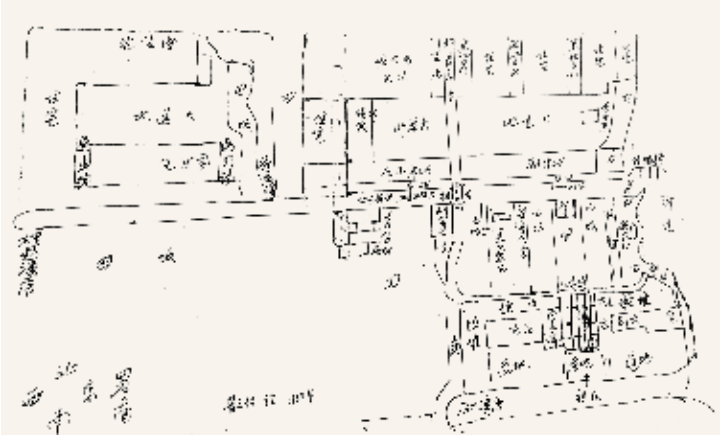
这是利用老台门东西两侧厢房改造的一片平房，看上去有些破败，中间一条笔直宽阔的中轴线通道，鲁阿良夫妇住在靠近台门口东西的几间小屋里，门口铺着青石板，过道屋顶还有楼板相接。旧时分家讲究“哥东弟西”。东首原是分给堂兄鲁振东的房子，20世纪40年代鲁振东随父移居上虞长塘后，就卖给了鲁阿良。其他房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时，陆续分给了本村村民。

“这是台门，进来总堂，本来都通，直接到河头，方便取水和船运。”“鲁四老爷家在这里先是开作坊做老酒，发家致富后，祖辈又在孙端镇上和绍兴城里开起老字号鲁永盛酒店、鲁永盛酱园、杭州瑞泰祥绸庄等实业，成为安桥头的大户人家。”鲁阿良说。据介绍，当年宝记台门一年的黄酒产量在2000缸左右，按每缸罐装40坛计，相当于8万坛，这样的产量放在今天不亚于一家上规模的黄酒企业。通道上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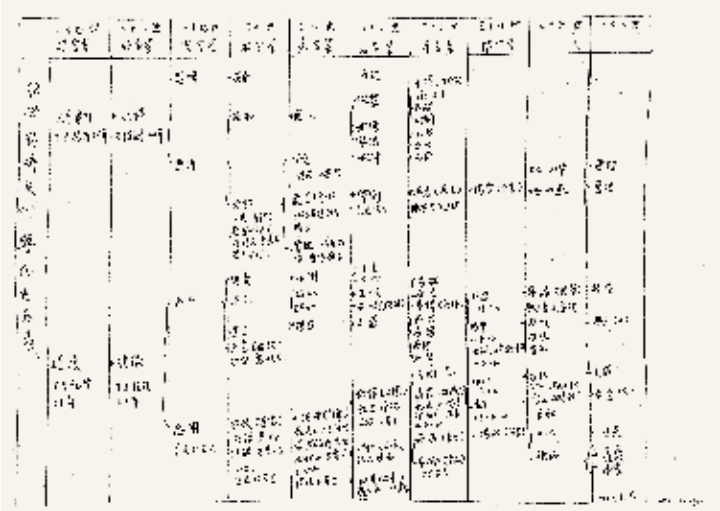
鲁迅祖居

废弃的石条凳似乎诉说着这个家族跌宕起伏的创业史。

鲁振东比鲁阿良大三岁，在他的童年印记中，宝记台门原先还有雕花门楼，四进后面带花园，光大门就有八扇。这让人联想起鲁迅祖居即周家老台门。周家老台门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周家鼎盛时购置的产业，主体建筑也是四进，但只有六扇大门，四进后面没有花园。宝记台门比鲁迅祖居规模还大。“当时安桥头乌记、羊记、洪记、宝记和朝北五座台门中，宝记台门最大。”鲁振东在随后的访谈中告诉笔者，还给笔者看了其父亲鲁元松1989年手绘的一份《安桥头老宅分布图》：乌记、洪记、羊记三座老台门在最上面一字排开，中间是朝北台门，下面祖居位置是原宝记台门，前面还有一块大的道地。现场目测，宝记台门仅侧厢的建筑规模就远远超过了朝北台门，朝北台门不仅矮小而且只有两进，没有门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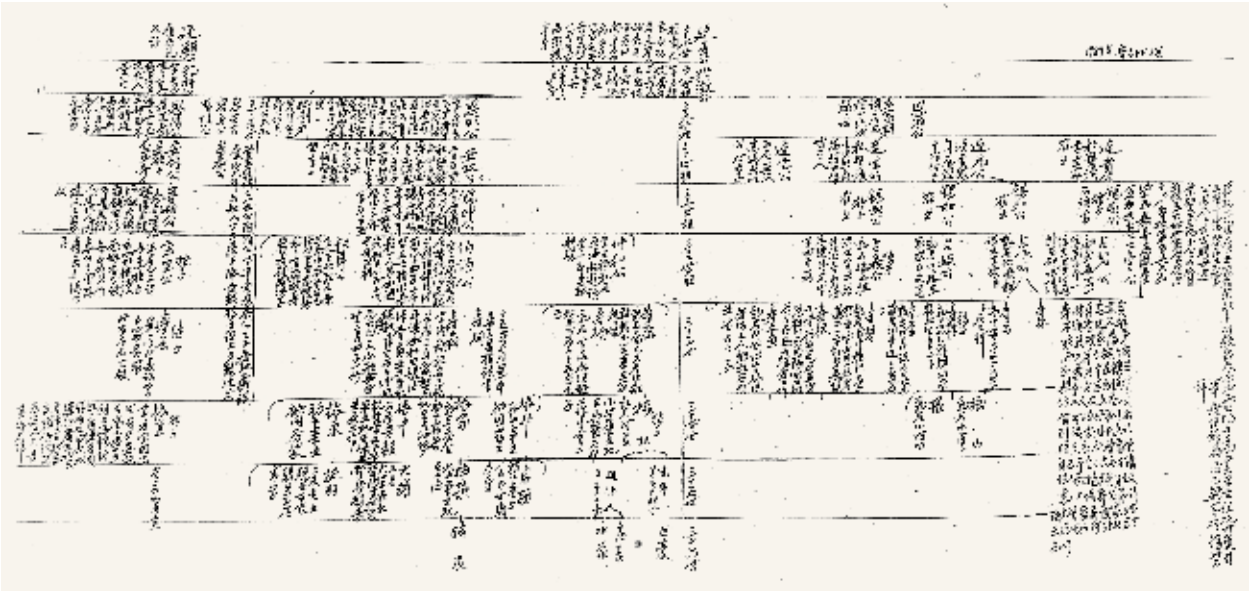
鲁元松手绘的《安桥头老宅分布图》



鲁振东修补完善的“03版鲁氏世系表”

鲁阿良拿出两份《绍兴安桥头鲁氏世系表》(以下简称“《世系表》”)手稿，记录二十七世到三十六世最近十代安桥头鲁氏的延续情况。前者1989年由其大爹鲁元松回忆整理。鲁元松继续祖父董事之职，管理安桥头鲁氏宗祠20余年，还担任过绍兴县参议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一位有文化有声望的乡绅。笔者拜读过鲁元松生前写给定居嵊州的二子鲁振中的一封家书，告诉后代要写点族史家史以作为家风承传，表示“曾亦查看过家谱甚详”，“要纪录数十年生平事迹贵在真实”。后者2003年由鲁振东根据父亲鲁元松手稿修补完善。鲁振东是长塘桃园村的文化顾问，崇尚国学，为人正派，诗文俱佳。两份《世系表》经过鲁元松、鲁振东父子两代人的修订，化繁为简，相文照应，流传有序。为便于陈述，以下分称“89版鲁氏世系表”和“03版鲁氏世系表”。

在“03版鲁氏世系表”三十世“安字辈”中，笔者找到鲁安玖，他是二十九世鲁思源的四子。“89版鲁氏世系表”这样介绍他的生平：“安玖公，字连宝，私塾数年。公系思源公第四子，过继思明公为子，在家种田酿酒，生育一子三女，不留祭田，后由锡坤公补祭二十亩，享年。”鲁锡坤是鲁安玖的儿子，字厚甫，儿子替父亲补交祭田天经地义。当地习俗，把



鲁元松回忆整理的“89 版鲁氏世系表”

上了一定年纪读过书或做过官且家境殷实的人加上姓氏和排行后称为“某某老爷”，鲁安玖“鲁四老爷”的称呼由此而来。在鲁振东看来，高祖鲁四老爷点水不曌，祖上是安桥头首富，称得起“老爷”的就是安玖公。“绍兴乡风‘一堡外甥三堡舅’，就是说一个村的外甥三个村都要叫舅舅。像我大家都叫‘四外公’，村民都叫安玖公为‘四老爷’。”鲁振东说。论资排辈，鲁振东是第五代孙子，在兄弟里又排行老四，是正宗的“小鲁四老爷”。

“89 版鲁氏世系表”没有注明鲁安玖的生卒，但“03 版鲁氏世系表”注明鲁安玖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也即公元 1847 年。这一说法，与鲁振东二哥鲁振中 2003 年根据家传资料及孙端又新小学有关资料整理收录在自传体《生命之歌》一书中的《绍兴安桥头村鲁氏世系表》无异。有意思的是，与鲁氏二十九世鲁思明建造宝记台门同年。由此推断，鲁安玖过继给鲁思明时，应该是宝记台门落成没多久。而朝北台门由鲁思清建造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比宝记台门早几年。

“我儿时去看电影《祝福》，回来讲给爷爷听，爷爷说这部电影在放我家。祥林嫂是我们家一个叫赵婉珍的女佣。”鲁阿良告诉笔者。鲁阿良的说法得到鲁振东的认同。逢年过节，“祝福”“请菩萨”“迎神赛会”这些传统民俗活动是宝记台门必做的。与小户人家不同，盛放“五牲”的礼器用的是全铜，粗大的蜡烛台需要几个成人才能抬得动。“鲁迅记得主楼旁有 3 个偏房专门用来堆放龙角铳、仪旗、专用衣服这些祭祀用品。当时我们台门有 19 个长工，6 个嬷嬷，洗衣做饭领孩子各管各的，祥林嫂是我们家的，确有其人，叫赵婉珍，年轻守寡就来我家，后来嫁到山里去了。”鲁振东说。朝北台门展厅里有一块“抢亲”的展板，有“鲁迅在《祝福》中祥林嫂被婆家所抢的场景就是以他在安桥头所亲见的翠姑被抢的素材为根据而创作的”文字说明。赵婉珍是否翠姑，她经历了怎样的悲惨人生，她是否与鲁迅会过面，她的后人何在，这些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鲁迅童年随母亲到过宝记台门，见过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排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小说《祝福》中有了生动的描述。

告别鲁阿良家，从台门口到河埠头，“穿过”整座台门，笔者花了整整10分钟。

二、朝北台门和宝记台门

在上虞东关长塘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笔者上门拜访了鲁振东老人。鲁振东从事企业管理多年，几年前才退休返乡颐养天年，利用自己积淀的文史知识为地方新农村建设发挥余热。靠山一幢自号“山人居”的中式小别墅是老人的家，门前立着一块“梅园”碑，花园里果树、菜地、水井、鱼池、石桌、农舍一应俱全，大门上一副鲁振东自书的对联：“几间陋室几番风霜几番雪雨，半亩家园半藏农具半藏斯文。”此情此景，让人联想起百年前的宝记台门和鲁四老爷。

鲁振东的父亲鲁元松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居长塘，四个儿子依次是老大鲁振家、老二鲁振中、老三鲁振邦、老四鲁振东。鲁振东直到13岁才去上虞，之前在安桥头生活，亲历家事变迁，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对百年家世如数家珍。

鲁迅外婆家“朝北台门”

“鲁迅先生和我们家有表亲关系，论辈分要叫安玖公四外公。”鲁振东说。这与《世系表》的谱系相符。鲁迅小说《祝福》中说鲁四老爷“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显然是作者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形象。小说写于1924年2月，描写作者流离失所后暂寓在亲戚鲁四老爷家的故事。其实鲁迅1919年12月返乡处理完周家新台门售后事宜后就再没回去过。在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加以艺术虚构，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言：“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值得注意的是，《祝福》中描写的无论是祝福的场景，还是鲁四老爷、祥林嫂等人物，是确有其人其事，使得作品本身具备了纪实类散文的一些特点。可见，这是一篇小说散文类的鲁迅作品。

“03版鲁氏世系表”三十世“安字辈”这样描述安玖公的堂兄弟安馀公：安馀又名晴轩，鲁迅的外祖父，后移居皇甫庄旗杆台门。鲁晴轩是鲁迅母亲鲁瑞的父亲。也许鲁迅母亲地位特殊，与一般族谱“修男不修女”不同，“03版鲁氏世系表”安馀公的后人名录里增加了鲁瑞，并附相关文字说明——鲁瑞，嫁周伯宜，鲁迅母亲。因此，《绍兴安桥头鲁氏世系表》确切地说是宝记台门和朝北台门两个房族的简明关系表。事实上，宝记和朝北两个台门在鲁氏第二十六世时还是同一个祖宗，第二十七世时才有廷展、廷翱兄弟分开，到鲁迅外公时两家还是传统“五服之内”的宗亲。

“鲁迅先生同我家接触较为频繁，因我爷爷比鲁迅小六岁，表兄弟关系。跟现在一样，富在深山有远亲。鲁迅外婆家那时已经破落，而我家正在最旺的时候，鲁瑞到娘家来一般都来我家，因我的曾祖父是她的堂兄，所以鲁迅先生叫我曾祖父厚甫舅舅，我们同鲁迅先生渊源很深，就是说我爷爷同他关系很好的。不瞒你说，鲁迅先生落寞的时候我爷爷原瑞接济过的。”鲁振东告诉笔者。

朝北台门一系自三十一世鲁嘉芸（即鲁迅的小舅父鲁寄湘）以下累代单丁，三十二世鲁佩衡无后，过继堂兄鲁佩紫长子鲁玉璋为子，只留下鲁振宜这一血脉。之所以不按朝北

台门的“彬礼堂”取名而傍宝记台门的“敬仪堂”排行，意在托庇宝记台门财丁两旺。宝记台门正好相反，酿老酒、开酒馆、办绸庄，家大业大，枝繁叶茂。鲁厚甫生于同治六年(1867)，光绪秀才，享年70岁，曾捐道台斥巨资造大坟。在上文鲁元松写给鲁振中的家书中，表示“祖父厚甫公是秀才，曾参与秋瑾革命，是振兴家族之一员”，鲁迅青少年时代显然见过这位富有正义感又财大气粗的厚甫舅舅。当时秋瑾革命属于“大逆不道”，要株连九族，鲁厚甫的一些革命活动多为地下工作，不为外人所道，但作为本族人的鲁迅应有所耳闻并受其影响。另外，鲁振东的爷爷鲁原瑞光绪十三年(1887)生，40岁去世，要说“接济”，极有可能发生在1910年前后鲁迅从日本回国返乡谋生这段时间。鲁迅既要承担一家老小的开销，又要按月供养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周作人，难免捉襟见肘。如鲁迅先生1910年7月11日在致挚友许寿裳的信中，对于自己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表示“所入甚微，不足自养”，请许寿裳帮助另觅他处谋职。鲁振东回忆，父亲鲁元松生前多次见过鲁迅这位表阿叔，“上门没别的事，就来借钱，那时我爷爷原瑞公还在，不在就不来了。”

鲁四老爷和鲁迅先生两家这种血浓于水的家族情缘，一直在后人中延续。像鲁振宜的名字还是鲁元松取的，而之所以乳名叫牙宝，是因出生时有门牙一枚而得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鲁阿良父亲失业后，向时任浙江省省长的表叔周建人求助，周建人对这位来自安桥头“大屋里头”的宗亲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并妥善解决。这也顺应了鲁氏“视堂亲为同胞，待表戚如手足”的族训。

据安桥头鲁氏宗谱记载，安桥鲁氏的源头可追溯至公元前255年的战国时代，鲁被楚所灭，姬姓国君流放莒地。为纪念故国，姬姓子孙及部分异姓公侯、大夫被赐国号为姓，世代相传，鲁氏族人则尊奉周公姬旦为得姓始祖。鲁姓有“复兴”的意义，这是一大发现。另据了解，安桥头鲁氏共撰有宗谱27册，由鲁元松保存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定居上虞后移交其他族人保管，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被毁。不排除鲁迅在安桥头看到或至少听到过相关内容，而心有戚戚，在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时作为首次使用笔名的依据之一。

三、“十代歌”和鲁思清

关于《鲁迅家世》《绍兴村落文化全书》等著作中涉及的有关安桥头鲁氏家世的一些观点，诸如《绍兴村落文化全书(孙端卷)》之《鲁迅外公家世简述》(以下简称“《简述》”)一文里“据老农反映，……祠堂虽早已毁圮，但十代歌‘定绍世恩嘉佩德达旺祖’流传至今，鲁迅的外太公鲁世卿属第三世(世字辈)”等，鲁振东提出了质疑。

鲁振东认为，建祠堂，修宗谱，此类事宜，若非名门望族，均无能力可为之。安桥村的鲁氏宗祠乃第十四世祖宣龄公州官任上告老还乡后于明正德元年(1506)出资牵头建造，他还组织族内多人内查外调，续遗补缺，历时九年完成安桥鲁氏宗谱的编纂。内按各代子房、名讳、学历、功名、职业、娶续、嫁醮、赘婿、招子、生育、品德、贫富、寿享、丧葬及大事记等，详细记录，排列有序。宗谱开篇“百代歌诀”，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开始启用，第二十七代到三十六代的歌诀为“廷、兆、思、安、嘉、佩、德、达、光、祖”，凡鲁氏子孙取名，中间一字即为辈分。也就是说，较原“十代歌”有五个字“音同字不同”，即“定绍世恩旺”依次对应为“廷兆思安光”。

“安桥鲁氏二十九世祖公中，有思慎、思清、思源、思明、思吾、思身、思广等，唯独没有鲁世卿这个人，应该是鲁思清

同音之误。”鲁振东说。

由于无法利用鲁氏宗祠、鲁氏宗谱等一手资料还原史实，得知安桥头村原党支部书记鲁月明是鲁振东“佩字辈”的族公，家里还保存着曾祖父思广公的墓碑，是思字辈还是世字辈，是鲁思清还是鲁世卿，只有见到此碑才能真相大白，于是笔者再次赴安桥头寻访。方知此碑不在鲁月明家中而在野外墓地。

在安桥头村丁建海的带领下，沿着往镇塘殿的一条泥泞的小道，在朝北台门西北方向的一块田畈上，见到安桥头老坟集体迁移后合葬在此处的公墓。裸露的草皮下面尚能看出一座座石棺，只有几座石棺封土前竖着墓碑。在最里面的一个封土前，终于找到这块近两米长、半米多宽的石碑，经过百年风雨侵蚀，碑文已经漫漶不清。这是可以理解的，就连现存其后一辈的鲁迅外祖父鲁晴轩的墓碑碑文也已十分模糊。只是不知出于何故，同样的碑文竖写，鲁晴轩的墓碑是块直碑，而鲁思广的这块墓碑是块横碑。“一般墓碑是直碑，横碑证明墓主是有功名的，上面有特别的格式，但家庭落魄以后就不放横碑，不是随便可用的。”鲁振东解释道。笔者为此请教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他表示晴轩公是咸丰元年(1851)举人，墓碑是宣统元年(1909)立的，直碑可能和立碑年代有关，具体还需作进一步考证。

经过技术处理，碑文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竖排，“民国”、“鲁氏”、“考思

鲁迅外祖父、母合葬墓

鲁思广和徐孺人夫妇合葬碑

广公”、“妣徐孺人”、“男安□□孙□□□”（□字不清）等几个字依稀显露出来，“安”字应是指墓主“安字辈”后人，“孙”字应为墓主的直孙。由此推定，这是一块民国年代的夫妻合葬碑，墓主为鲁思广和徐孺人夫妇，由“安字辈”鲁氏后代子孙所立。

这就证明鲁月明所言非虚，确系思广公的墓碑无疑。也就是说，鲁迅外太公是鲁思清而非鲁世卿。鲁振东的判断是对的。同样表明鲁迅先生是安桥鲁氏“佩字辈”的表亲无疑。鲁思清是安桥头第二十九世祖。

笔者首次参与鲁迅文化的田野考古，利用家族墓碑这一

特殊形式的相对不易引人注目免遭人为破坏的实物，验证鲁迅家史结论是否真实可靠。基于鲁迅文化史料时间久远，一手资料可能欠缺，同时也提醒学界，相关的二手资料同样具有价值。因此，对这类物证要引起重视，日常须妥善保护。如对思广公这块墓碑，或作碑拓存档，或新旧替换收藏保管，这是后话。

鲁振东还解释了鲁四老爷和鲁迅先生二系后代在安玖公后不照家谱论资排辈的原因。原来鲁思清在京做官，未经族长同意娶了小妾返乡过年祭祖，被拒宗祠门外，最后族里公议，按族规，擅自纳妾、目无尊长，裁定“安”字以后其后代不准到家谱去排辈分，当时堂兄思明公表示同情不肯参会，受到牵累。“鲁思清赌气要面子，就在鲁氏宗祠西首建造五架小屋一间，辟为朝北台门一系的家祠，就是俗称‘小祠堂’的鲁氏家祠，在‘文革’中与宗祠同时被毁。”

“03 版鲁氏世系表”从第二十七世到三十六世的歌诀为“廷兆思安嘉占寿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风易俗，鲁氏后人也就并不严格按辈分取名了。

四、鲁氏家史与安桥村史

在鲁迅以青少年生活为依据创作的小说《社戏》中，安桥头被称为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对 19 世纪 90 年代前后安桥头的地理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述，这是鲁迅为后人留下的“简练版”的安桥头村史。鲁氏先人何以选择在这极偏僻的海边定居，他们来自何方，因何而来，是否世代渔耕为业，等等，这些疑问，同样也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

在上虞长塘，笔者见到了鲁振东老人收藏的其父鲁元松 20 世纪 80 年代历时五年写成的《绍兴安桥头村鲁氏家史》（以下简称“《鲁氏家史》”）手稿和手绘的《安桥头地域位置图》。《鲁氏家史》全文约 3 万字，仿王羲之《十七帖》行书，字体清俊洒脱，未加断句，有些还是繁体字和方言文。为便于阅读保存，笔者逐字打印并加断句。

总览《鲁氏家史》，既有讲述始祖迁徙、会稽止步、驿站奇遇、路救难童、家族发迹、定居安桥、发族建村、一村两姓、建祠修谱、鲁丁同亲、地籍演变、安桥兴衰等一件件家史往事，也有记录保家卫国、婚丧嫁娶、耕读传家、艰苦创业、忠孝节义、断嗣承继等一代代传奇故事，从北宋末年到民国初年，读之泱泱大观，如同品三国越千年。

有关安桥鲁氏起源，开篇如下（笔者加断句）：

鲁氏第一世祖兰谷公，原籍山东省，学历进士，能舞剑，略识拳术，在州衙为书吏及县丞等职，至四十余岁，始升任为山东沂水一带为县令。北宋末期，金兵进犯，城池失陷，带百姓数百人，退过长江。曾逗留在海盐县候职，后转至杭州，而久未起用，为生活所迫，拟走避宁波，因门客丁嵩（仁泰）原系宁波人，闻海口亦多游戈，故至皋埠镇乃止。翌年春季，为解忧闷，而偕嵩公游皋埠南山，即会稽山脉腰鼓山，风景秀丽，乐而忘返，投宿农家。该村四十余农户，皆小康人家，但全是文盲，亦愁小孩们无法读书为忧。经村人相邀，全家迁居山中，赁屋设帐启蒙，从此舌耕十年左右。兰谷公为县令，亦有十余年之久，而秉心廉洁，避难一路而来，只有千斤书箱，两袖清风，在山虽如过隐士自由生活，但家人众多，当时全靠刺绣、织布、卖书画度日，后承村人鼎力帮助，开荒种地，始成耕读传家。公生有三子一女，一女出嫁海盐张氏。公落户十余年后，在山病逝。夫人是州官之女，亦善诗词，经离乱后疾病缠身，故同年亦逝世弃养。夫妻同庚，享年均六十四岁，葬腰鼓山。公长子（名忘）是文弱书生，博学未仕，继父

业教书到老，列代子孙称其谓山里大太公，因事亲至孝，后世亦称孝太公。直系子孙，列代农业为主，大多数小康人家，也有数户中民之家，一户大贾，亦曾出仕三人，皆七八品之官，只有一人归族，家谱上有士人出仕栏内记载，先后两代有两人游宦未回，一房挂线多子孙，一房挂线空白，大概远游无从查究，有百数户，住三四村，三十余世未建祠堂。二太公（名亦忘），至小皋埠，亦教书为业，子孙传农商，苦乐不匀，出大贾二人，均迁走。列代出仕文武五人，游宦四方，亦只多一人还族，两房下落不明，两房迁山阴，在清朝始建祠堂，产业也不多。三太公名澂端，有特别的乳名，惜已忘。兰公在世时，已由仁泰公共同挑盐，贩运经营，以维持家庭，因起路一日难到山家，故在安桥营设站头，三间草屋，作为转运之所，兰公去世后，就安家于安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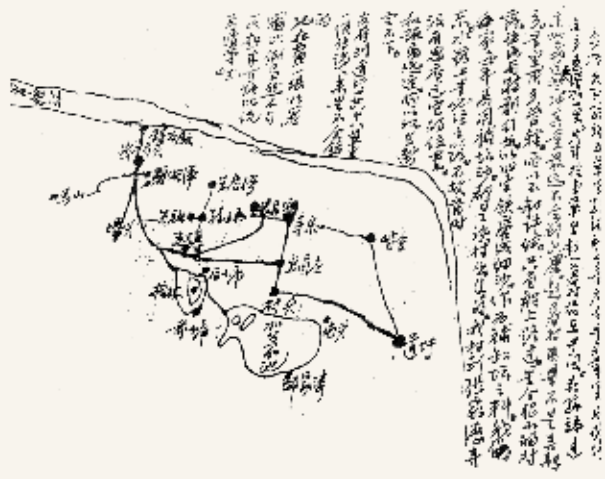
鲁元松撰写的《绍兴安桥头村鲁氏家史》手稿首页

上述信息告诉我们：安桥鲁氏始祖鲁兰谷北宋末年因兵燹由山东辗转来到绍兴，先到皋埠。次年迁居皋埠南面的腰鼓山。兰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次子以教书为业，长子随父定居腰鼓山，次子至小皋埠，三子鲁澂端和门客丁嵩结伙贩盐为生，因到腰鼓山一天无法来回，便在安桥头临时搭了几间草屋，“作为转运之所”。鲁兰谷去世后，鲁、丁两公就定居在安桥头。

由此推断，安桥头开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距今约 900 年。尤其是最初“贩运盐货起家”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须知古代食盐由政府统一管理，严禁私盐贩卖，但巨大的利润空间还是让不少人铤而走险。绍兴就有俗语“一分本事一分钿，十分本事卖私盐”，是绍兴盐业发展史的一个见证。如距安桥头不远的镇塘殿位于曹娥江畔，对岸是南汇盐场，《周作人日记》就有去镇塘殿“看盐舍烧盐”的记载。

关于安桥头村当时的地理环境，《鲁氏家史》记载：“南宋以前豆疆村落北（‘以前’，本文作者注）为堍头村。村后是泥塘。上有放水闸，闸好造屋，而称闸绞楼，出水过碧波潭横江，过吴融南江，约于南宋四五十年时淘汰此闸改称为闸交头。此塘东由青山来，过孙端南一横到马山，向马鞍山、头蓬一带去接萧山塘，现在之安桥村即那时此塘之北一大片海沙地，近塘落北，有东西横向小丘小塘。其时堍头村北，许家埭、乐巷，及东首碧波潭村、赵暮村、吴融村已属高地，已有渔牧民少数人口之村落。”可见当时的安桥头还是一片茫茫海涂，并不适合居住，这块海沙地最初是两人挑盐途中“随遇而安”的歇脚之地，鲁澂端和丁嵩是“岛”上第一代住民，安桥头一村两姓由此而来。值得一提的是，附近高地散布着不少小村落，给安桥头的地域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保障。笔者认为，无论是相互通婚，还是货物流通、人口流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信这也是鲁、丁两公当初选择定居安桥头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鲁元松手绘的《安桥头地域位置图》上，安桥头和镇塘殿两村相邻，紧靠曹娥江，周近分布着马山、碧波潭、吴融、堍头、赵暮、王老湾、皇甫庄、寺东等 10 余个村镇，安桥头确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在随图附文里，还有地域位置、相互距离、村庄特色等解读。如赵暮村



鲁元松手绘的《安桥头地域位置图》

主要为安桥头提供做酒缸酒坛的补坛沙，印证了鲁氏做酒经商的一段历史。

附注全文如下：

安桥头到孙端五华里，孙端到皇甫庄亦是五华里，水路湾曲多要增加一里，共计十一华里。赵暮村约在中间，在孙端过东些或过西些，冲其量最远不会到六里。赵暮村不是吴融乡，是皇甫乡管辖，所以不知详细。只有船上路过，是个很小的村落，住民有特别行业，仍旧生铁磨成细沙，作为补缸坛之料，我家每年要用补坛沙，都是该村出售的。我村到张家沥、寺东，水路上是必经之路。不故当时没有思考过它的位置和距离远近，所以现在断定不下。安桥到道圩（即上虞道墟，本文作者）十八华里，一惯传说下来是不会错的。现在画一张草略图当然比例不匀，看起来可能比说要清楚些。

门客丁嵩是《鲁氏家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没有他，兰谷公就不会迁徙绍兴，《鲁氏家史》就要改写。《鲁氏家史》中有关丁嵩的生平介绍颇为详尽。他是兰谷公的父亲逸太爷机缘巧合收留的一名难童，比鲁澂端小两岁，两人自幼同师读书，胜如同胞，非常和睦。“寄养后既不作义子，亦不为奴仆，只以伯侄称呼，并因事成在泰山脚下，故赐名为丁仁泰。”也就是说，鲁家人一开始就平等相待，连赐名也不改其姓，最终成为兰谷公创业和治家的“黄金搭档”。兰公习文，嵩公习武，家史记有鲁、丁两姓三代同家，丁嵩四次救主惊心动魄、忠孝节义的事迹。有“修身励志、律己守德、忠勤事业、孝亲睦邻，礼族人血缘有序，待丁姓情同手足”三十字鲁氏族训为证。丁嵩是安桥丁氏的始祖，如《鲁氏家史》载“八世孙在明前期为四品武官，建造丁大房台门”，至今安桥头村仍有不少丁姓族人。

靠贩运私盐毕竟非长久之计，鲁、丁两公还是安桥头这块“北大荒”的拓荒者。《鲁氏家史》载：“丁嵩、澂端二公到安桥落户，挑卖海盐度日。并向县承包开荒一大片，计1100余亩。”

南宋奖励耕织，鼓励围垦海涂，造好湖税减免，对于安桥头“这样的年轻高地，政府已允许百姓承扳划圈，领官契开荒，三年后纳粮，永远业权为己产”。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贩运私盐一夜暴富来得容易，附近村庄虽然也有人开荒，却不到一半的土地可以种植，鲁、丁两公投资兴修水利，同时贡献治沙良策，带头与大自然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八年苦工，全畈皆能耕种”。相关内容在《鲁氏家史》中有详介。

关于安桥头村名的来历，《鲁氏家史》载：“说起安桥本宅从草屋发展瓦屋乌记台门。即原草屋基。门前约距六丈即是板桥头。当时修塘筑丘所掘大横沟，直到里赵西溇底，由竹板桥改造为单眼木桥，取名为安桥。表示从此得以安居乐业。”可见，“安居乐业”是安桥头村村名本义所在。

另据《鲁氏家史》，在官方土地册籍中，安桥村曾被编为会稽七都四图，地名岳墅镇。曾有一岳姓官商来安桥开设埠头，运盐米至浙东上八府，“安桥即是货运会集之所”。后造“岳氏之别墅。正门额上大书岳墅两字。是端公长子手笔”。又如，“安桥多拳师，遐迩有名，故盗窃绝迹方圆之境内”“拳场设在朝北台门东首。鲁丁两姓爱武成风”，等等，可见安桥习武之风古已有之，很多内容鲜为人知，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教育作用，是鲁氏家史，也是安桥村史。

谨以本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浅谈绍兴书画

绍兴博物馆　史　霖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杭州湾南岸，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文化和生态旅游城市、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水乡、桥乡、酒乡、书画之乡。

绍兴陆域面积为8273.3平方千米。全境位于浙西山地丘陵、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的交接地带，地形骨架呈“山”字形。全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而下，地貌可概括为“四山三盆二江一平原”。10万年前，人类在此狩猎；9000年前，人类在此定居；7000年前，人类在此创造了河姆渡文化；2500年前，於越先民在此定都；800年前，“绍兴”之名沿用至今。历史上，绍兴辖山阴、会稽、上虞、萧山、余姚、诸暨、嵊县、新昌八县。

绍兴山川秀美，水木清华；绍兴书画独领风骚，名家辈出。

早在远古时期，於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就已萌芽。9000年以前的石雕人首，发掘于小黄山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石雕人首。该人首雕刻技术成熟，形象传神，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牙雕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双鸟朝阳”与周边纹饰的搭配主次分明、烘云托月，十分和谐。4000年前，绍兴马鞍遗址的鱼鳍形足陶鼎线条灵动，达到了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春秋战国时期，於越部族以绍兴为活动中心，创造了灿烂的越文化。无论是语言文字、音乐舞蹈、信仰习俗，还是青铜剑的铸造以及印纹陶、原始瓷的创烧，都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与鲜明的地方特色。春秋时期越王句践剑上的鸟虫书铭文灵动自然，青铜鸠杖上人物及图形符号的生动展示等，表明绍兴先民在书写与绘画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秦朝，始皇东巡大越至此，祭大禹，登秦望山，望南海，命李斯刻石于会稽之巅，即会稽刻石碑。碑文采用小篆，笔画萦纡，线条圆转，修短合度，雍容大方。会稽刻石碑碑文与书法并存，对秦统一后的中国文字具有示范作用。

东汉时期，经济较为活跃，留下了“建初元年买地刻石”。其字体半篆半隶，古朴典雅，是秦篆向汉隶过渡的典型标本，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东晋时期，会稽富甲一方、山水秀丽、和谐安定，豪门望族争相驻足，一时俊贤云集，人才辈出，呈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盛况。“书圣”王羲之作《兰亭集序》，世称“天下第一行书”；王献之的书法艺术成就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

唐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绍兴成为江南重镇，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境内“古越晏安，户口殷实”，书画之风盛世延绵。代表人物有虞世南、陈闳、

孙位等。唐初书法家虞世南工书法，继承了“二王”（羲之、献之）的书法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正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唐代陈闳，“国朝阎令公之后，一人而已”“唯写真人神、人物、士女等，妙品上上”。相传陈闳的名作有《八公图》。晚唐画家孙位，擅长人物、松石、墨竹和宗教壁画，画龙、水尤为著名，他被称之为“逸格第一人”。现存无款《竹林七贤图》残卷。南宋诗人陆游，书艺上的成就也很高。陆游的书法和诗歌一样，沉雄郁勃，有一种饱受压抑而欲一吐心中不快的强烈感情，就像他的诗句“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样。代表作有《怀成都十韵诗》等。

元明清时期，绍兴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重视教育，书画大家代不乏人。代表人物有王冕、王守仁、倪元璐、徐渭、王思任、刘宗周、陈洪绶、赵之谦、李慈铭、任颐、任熊等。元代王冕工墨梅，首创以胭脂作没骨体，其作品对明清画坛影响深远。传世作品有《墨梅图》《南枝春早图》等。明代徐渭，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世对其绘画评价最高。代表画作《墨葡萄图》、书法《白燕诗》等。明代倪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为明末书风的代表。代表作有《草书五律诗》轴。明代陈洪绶，天资聪颖，4 岁即能作画，10 岁时拜蓝瑛为师。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代表作有《蕉荫丝竹图》《雅集图卷》等。清代赵之谦，书画篆刻独步一时，擅写意花卉，用墨饱满，色彩秾丽，为“海上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二金蝶堂印谱》《墨梅》等。清代任颐，工笔、写意、没骨、水墨均运用自如，风格清新明快。兼写山水，淋漓挥洒，气象万千。书法亦参画意，奇警异常。其画名重大江南北，是“海上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倒骑驴图》《八仙祝寿》等。

近现代，山阴道上群星璀璨。不甘人后的绍兴人活跃在时代的前列，并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是蔡元培、罗振玉、徐生翁、经亨颐、陈半丁等。徐生翁真、草、篆、隶皆擅，所作笔墨凝练，结体奇崛，稚拙古朴，一派天真，如万岁枯藤，气韵直逼魏晋，时人称为“孩儿体”。代表作有《蕉菊图》《行书轴》等。陈半丁擅写意花卉、山水、人物，以花卉见长，状物描情，生动自然，不失矩矱，具秀润苍古之意趣。出版有《陈半丁画册》《陈半丁写意花卉》。

“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古老的越地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绍兴这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江南名城，正以“重塑城市文化体系”为指引，迈向大湾区大都市的发展道路。绍兴的书画还将继续演绎绍兴乃至中国、世界书画艺术的新篇章。

新发现的秋瑾《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手稿

上海图书馆　夏汇丰

摘　要：近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发现秋瑾撰并手书《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原稿一件。与通行本校对后，发现该词共有六处文字上的出入。现将原稿及校对结果整理发表，并对秋瑾文集的版本流布做一简要梳理。

关键词：秋瑾　手稿　校对　版本　流布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旦吾，后改名瑾，改字竞雄，号鉴湖女侠。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妇女解放运动推动者。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秋瑾受传统文化熏陶，喜爱读书，能写诗词。前期的诗作保存较为完整，后期因为频繁参与革命活动，不少诗作或亡佚，或未被发现。自秋瑾就义后，就有人不断搜集资料，整理出版其文集。

一、二十一世纪前出版的秋瑾集版本

1. 芷馥本。“1905 年 12 月，秋瑾为反对日本政府公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而归国。行前，陶成章向她索要作品，作为纪念。秋瑾就交给陶成章一本手写的诗词稿。”[①]1907 年 7 月秋瑾牺牲后，陶成章、何震与王芷馥即以秋瑾给予的诗词稿为底本，在 1907 年 9 月出版了《秋瑾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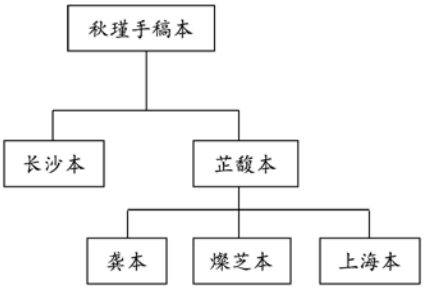
2. 龚本。1910 年，龚宝诠以芷馥本为底本，增刊了一些新发现的秋瑾遗文，并做了一定的校勘工作，在日本以《秋女士遗稿》一名出版。

3. 长沙本。“1912 年民国以后，王时泽回到长沙。七月，秋瑾之妹秋瑆受徐自华之托来长沙，欲迎回秋瑾灵柩，还葬西湖。王家不从，并且要把秋瑾之柩葬于岳麓山，请乡闾名人郑泽撰写了一篇《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的文章，并且抢先在八月举行了追悼秋瑾大会，由王时泽主持。王时泽出示了秋瑾诗词稿本，由王家出资刊行，由袁樾栋任校对，名为《秋女烈士遗稿》。这个本子和龚本内容完全相同，是当时直到后来较好的本子。”[②]

4. 灿芝本。1929 年，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以芷馥本为底本，

加刊秋瑾档案中辑佚出的遗文、遗诗和一部分公开征求到的材料，经由中华书局以《秋瑾女侠遗集》一名出版。

5. 上海本。1960 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芷馥本为底本，出版了《秋瑾集》。1962 年，参照灿芝本、龚本、长沙本，对全书进行全面校勘后再版。在后续 1979 年、1991 年两版中依次增加新发现的秋瑾诗文。



版本关系示意图

直至今日，秋瑾集一直在被重新整理后再版。但囿于秋瑾本人的手稿件较为少见，并且经历了长达一百年的岁月，其部分诗文原貌已经模糊，各家整理的版本也互有抵牾之处，唯有一观秋瑾本人手书稿，方能还原其诗文原貌。

二、新发现的秋瑾手稿原件

笔者在工作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件秋瑾诗词稿原件。该手稿原本为信件形式，夹在章宗祥的相关文献内，取出后经馆内修复部工作人员装裱成册。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该信的收件人即词题中的陈彦安，也就是章宗祥的妻子。所以，这份手稿出现在章宗祥的相关文献中是合理的。

该手稿经过装裱后为经折装，蓝面素签，签条上书“秋瑾望海潮词手迹”八字，翻阅内容，有信纸一页，信封一件。信纸上书写内容如下：

惜离多思，伤时有泪，内绌外侮交讧。世局堪惊，前车可惧，同胞何事懵懵。感此独心忡。美中流先我，破浪乘风。半月并肩，一时分手叹匆匆。

从今劳燕西东。算此行归国，立起疲癃。智欲明芽，权犹未复，希君力挽颓风。化痼学应隆。仗粲花莲舌，启聩振聋。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

右调寄望海潮即请

彦安姊同志哂正指疵

妹鉴湖女侠秋瑾末是稿

词前钤有四方印章，分别是：“秋氏闺瑾”朱文方印，“鉴湖女侠”白文方印，“璿卿”白文长方印，“璿卿”朱文长方印。

落款处钤有三方印章，分别是：“鉴湖女侠”朱文方印，“秋”字朱文圆印，“秋氏闺瑾”朱文方印。

信封正面书有寄送地址“平河町五町目五番地”，收信人“中国人陈彦安女士样”，寄件人处书“大至急实践学校秋瑾”。信封背面正中间书有“木曜日”三字。信封上下黏合处，骑缝钤有“秋”字朱文圆印各一。

三、内容校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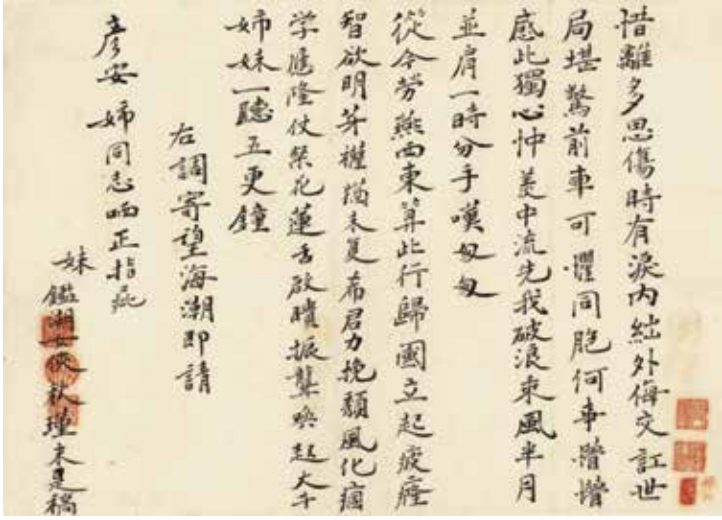
笔者调阅了多种 2000 年后出版的秋瑾集，发现大多以上海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现取三种有底本说明，且具有代表性的秋瑾集[③]与该手稿比对，发现略有出入，现将异同总结如附表。

六处异同中，“明”为“萌”、“姊”为“姊”的异体字。其余四处，每组或字义或读音或字形相近，试猜想应当是在流传过程中，因读音相似或字形相近产生的讹误。其中首句“惜离多思”的“离”字，现通行本全都写作“别”字，有整理者注意到芷馥本、灿芝本作“离”，但仍依据长沙本改为“别”。下阕中“启聩振聋”一句，手稿本写作“聩”，以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为底本的《秋瑾集·徐自华集》写作“聩”，而同样以

附表　手稿本与秋瑾集异同对照

书名	异同一	异同二	异同三	异同四	异同五	异同六
手稿本	惜离多思	半月并肩	智欲明芽	希君力挽颓风	启聩振聋	唤起大千姊妹
《秋瑾诗文集》	惜别多思	半月比肩	智欲萌芽	期君立挽颓风	启聩振聋	唤起大千姊妹
《秋瑾诗文选注》	惜别多思	半月比肩	智欲萌芽	期君立挽颓风	启聩振聋	唤起大千姊妹
《秋瑾集·徐自华集》	惜别多思	半月比肩	智欲萌芽	期君立挽颓风	启聩振聋	唤起大千姊妹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为底本的《秋瑾诗文选注》却写作“聩”。查以芷馥本为底本的灿芝本[④],该处写作“瞶”。后人在整理时,多认为芷馥本、龚本错误较多,在未看到秋瑾手稿原件的情况下,校对结果往往不会采用芷馥本。“校勘方面,芷馥本最差,其余三本都较好。”[⑤] 但从附表校对结果来看,芷馥本中的这首《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反而更接近秋瑾原作面貌。


惜離多思傷時有淚內紐外偎文訌世
局堪驚前車可懼同胞何事瞢瞢
感此獨心忡羌中流先我破浪東風半月
並肩一時分手嘆匆匆
從今勞燕西東算此行歸國立起疲癃
智欲明芽權瑣未夏希君力挽頹風化痴
学應隆仗柴花蓮舌啟聵振聾喚起大千
姊妹一聽五更鐘
左調寄望海潮即請
彦安姊同志哂正指教
妹 瑾 秋瑾未是稿

秋瑾《望海潮·送陈彦安、孙多琨二姊回国》手稿

注释：

① 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校：《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3 页。

② 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校：《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③ 此处具有代表性的秋瑾集是指：《秋瑾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年出版，以长沙本为底本；《秋瑾诗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以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为底本；《秋瑾集·徐自华集》，中华书局 2015 年出版，以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为底本。三种出版物的底本其实只有长沙本和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两种，其中人民文学本与中华书局本都是以 1962 年再版上海本为底本，但文字上有出入。

④ 王灿芝编：《秋瑾女侠遗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年。

⑤ 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校：《秋瑾诗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

绍兴博物馆馆藏《明拓怀仁集圣教序》的故事

绍兴博物馆　张幸幸

绍兴博物馆珍藏有两册《明拓怀仁集圣教序》,因系周恩来遗物,被列为红色文物进行管理。与革命时期诞生的文物不同,这两册拓本的原碑可以追溯至唐代,由于碑拓技艺的流传得以在明代重拓,20 世纪曾被周总理翻阅,如今“定居”在绍兴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前世今生,跨越千年,钩沉往事,回味隽永。下面,笔者将循着历史的线索,讲述馆藏《明拓怀仁集圣教序》的故事。

怀仁缘何集字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玄奘法师远赴西域求取真经而写的。太子李治随后作《述圣记》一篇。《圣教序》和《述圣记》在怀仁集字前就已经刻成三方石碑,分别为褚遂良所书的《雁塔圣教序》、王行满书丹的《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及书者不详的《同州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在前面三碑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载录了太宗和高宗两位皇帝给玄奘的致谢答复,并加上 656 年 2 月 27 日任命为玄奘翻译润色的五个官员的姓名和官位。[①] 须知道教是唐代推崇的国教,《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对原碑内容的增改,意在提升佛教的官方背景,加上唐代两位皇帝的背书,对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无疑起到巨大的作用。

至于集王羲之真迹来重刻《圣教序》,主要源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写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②] 将王羲之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民间流传甚广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也从侧面佐证了唐太宗对于王羲之真迹的渴求。因此,以王羲之真迹为引,投唐太宗所好,更容易获取官方的支持,达到借书法弘扬佛法的目的。而王羲之本人则是道教信徒,佛门弟子借道教信徒之力来弘扬佛教,也是佛教本土化的一种选择,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徒传播佛教的热忱。

可行性方面,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宫廷收藏有大批王羲之书法真迹,经初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辨识真伪后,整理成《右军书目》。这就为怀仁集字提供了字库。此外,怀仁还有自身的集字优势。据清代蒋衡在《拙存堂题跋·圣教序》中记载:“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圣教序》一气挥洒,字里行间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驱为千古字学之祖。”[③] 从书法史的角度对《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给予了极高评价。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于

王羲之作品保存甚少，后世集王羲之书法的碑都取自《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字形，这也成为怀仁对中国书法史的意外贡献。

明拓价值几何

传拓技艺发明于汉代，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4] 现存最早的拓本实物为唐太宗书《温泉铭》，上有一行唐永徽四年(653)题记，“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因此可断定为初唐拓本。《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行书铭文。此铭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怀仁集字刻碑工作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5] 可惜，《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未见唐拓本。清代碑帖鉴藏家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记载，雍正六年(1728)，友人裘鲁青告知，曾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朱砂本。然口说无凭，故唐拓本是否真的存在，尚且存疑。目前所传最古的是北宋拓本，明清鉴藏家也以宋拓为贵。笔者通过检索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发现，目前已公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均为宋拓本。

拓本的质量与原碑的保存状况密不可分。唐宋相去未远，经过辽金元三代，在岁月的侵蚀下，碑身已有裂纹。至于经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大地震，西安碑林损失惨重，《圣教序》碑自然也难以幸免。因此，明嘉靖以后的拓本质量同之前相比，可谓受不可抗力的断崖式下降。

收藏价值方面，《圣教序》的早期拓本在明清两代一直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青睐。明代著名的文人如文徵明、王世贞、董其昌、王铎等都有过题跋。[6] 题跋是连接藏家与拓本的纽带，可以向后人昭示拓本的流传经历，具有文献研究价值。但明拓本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及宋拓。比如罗丰在其论文《〈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与题跋》的结尾处特别提及：“1949 年以后，碑帖类大幅度贬值，甚至在 1978 年日本书法家梅舒适，还能借日本书道友好访问团访问古城西安之际，在钟楼下的文物商店购得一本宋拓《集王圣教序碑》。”[7] 既然宋拓尚存，明拓只是采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馆藏明拓概述

绍兴博物馆珍藏有《明拓怀仁集圣教序》两册，均系明拓本，版框高 34 厘米，宽 19.3 厘米，经折装，上下加装木板。虽然珍贵程度远不及宋拓，但是均有题跋，具有一定的文献研究价值。下面笔者依分类号分述之。

其中，分类号 12:261 的一册题签墨迹清晰，外框有少许污渍；每半叶五行，行十字。内有题跋一篇，内容翔实，上钤

分类号 12:261

朱文“周嵩尧印”“峋芝”“芝叟”等名章，表明收藏者系周嵩尧，有明确的收藏时间，系“一九五三年二月癸巳上元节”。文中记述了收藏此拓本的经过，为上元节游览古玩市场所得。藏者评价此本“拓工较精裱工较美”“为明拓中之最旧者矣”，可谓非常满意。同时，又不免遗憾：“惟裂处以墨掩之，或于他处求得完字补缀其间，而三奥虽全，第二奥实另借第三奥，足未免弄巧成拙。”从中可见藏者对于古籍版本的鉴赏力和考据精神。

分类号 12:262 的一册题签墨迹较淡，每半叶四行，行十一字，有多叶明显虫蛀。内有题跋两篇，一篇作于“壬辰新正月”，即 1952 年，钤“芝叟”印。内容为：“原石旧拓今已罕观，惜装裱不精，字多颠倒且有割截，殊滋遗憾，然吉光片羽尚且足宝，况白璧微瑕乎？”说明藏者明知装裱不精，但因拓本自身的稀缺性，仍然认为具有收藏价值。

另外一篇作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癸巳新正”，钤“周嵩尧印”。其中自述《怀仁集圣教序》的明拓本藏者已得三本，一本系乌金拓，两本为泼墨拓，皆明拓之佳者，可惜此本裱工不精，让藏者不禁发出“拓愈古则裱褙愈劣”的感慨。由此可见，藏者出于对《怀仁集圣教序》的钟爱，接连购入三件明拓本，而且经常翻阅，常读常新，并兴致盎然地写下题跋。

周嵩尧其人

周嵩尧，谱名贻良，后更名嵩尧，字峋芝，号薰士，晚年改号芝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是周恩来二伯祖父周骏昂的第三子，大排行老六，所以周恩来一直称他为六伯父。1897 年，周嵩尧 25 岁时考中光绪丁酉科第 35 名举人。

清末，周嵩尧曾担任邮传部侍郎，掌路政司。民国后，又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专署秘书长，还曾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1915 年，周嵩尧因不同意袁世凯称帝，遭袁冷落，卸职返回淮安。1929 年，携全家移居扬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扬州陷落，由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其出山，周嵩尧只好举家避居乡间，以躲开日伪的纠缠。

1951 年 6 月，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周嵩尧在半生赋闲生涯中收藏了大量古玩器、古玉器、古字画、古钱币等，并且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手写了一份《周氏家训》，其中记录了大量文玩，并阐释了自己的收藏理念。比如收藏书画古董要收真品，而且买时价格要便宜，收藏不能贪多，收藏是花钱又费神累人的事情，古董卖的时候又不容易。

分类号 12:262

家藏来之不易，子孙宜世世宝藏，不轻示于人。因为当有人看见了，就会想得到它，由此可能会招来祸害。在境遇所迫的情况下，要出售古玩，就要卖给识货的人，要待价而卖。[8]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嵩尧的收藏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嵩尧把自己收藏几十年、已传世200余年的清初王云的一本山水画册通过中央文史研究馆捐献给国家。

至于周嵩尧的鉴赏能力，根据秦九凤的披露，他一生精心收藏自认为“传世珍宝”的东西，竟有半数为赝品。如他花了很大代价才弄到手的一块青铜质的秦诏版，一幅宋代燕文贵的山水画等，经故宫博物院两位副研究馆员鉴定，都是后人仿制的。[9]可见周嵩尧的收藏，也存在鱼目混珠的情况。不过，馆藏的两件明拓本并非稀世珍宝，在20世纪50年代碑帖市场贬值的背景下，作伪的可能性不大。

流传几经波折

1952年3月5日，周恩来五十四岁生日时，周嵩尧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只大花瓶赠送给周恩来。但是据当年在西花厅工作的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虽然表面收下了这件礼品，却并不允许收藏。[10]

1953年2月，周嵩尧在古玩市场购得《明拓怀仁集圣教序》三种，同年转赠给周恩来。据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赵炜夫妇回忆，周恩来由于政务繁忙，在翻阅以后便秘密收藏起来，直到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邓颖超因赵炜喜爱书法，便转赠于她。

1998年2月13日，绍兴周恩来纪念馆正式开馆。前来参加活动的赵茂峰、赵炜夫妇将其中两册《明拓怀仁集圣教序》捐赠给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另外一册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据绍兴周恩来纪念馆首任馆长朱云珍回忆，这两册《明拓怀仁集圣教序》曾在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展出过一次，后来就收藏于绍兴市文管处库房，经过一系列的体制调整，最终落户绍兴博物馆。

注释：

① ［意］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②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8页。

③ ［清］蒋衡：《拙存堂题跋》，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690页。

④ 冀晓锐：《古老神奇的复制术——传拓》，《文物世界》2015年第1期。

⑤ 白鹤：《〈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对后世行书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6年。

⑥ 罗丰：《〈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与题跋》，《中国文化》2019年第1期。

⑦ 罗丰：《〈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与题跋》，《中国文化》2019年第1期。

⑧ 陈国民：《〈周氏家训〉所披露的周家情况》，《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4期。

⑨ 秦九凤：《杰出楷模：和乡亲一起读周恩来》，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2页。

⑩ 秦九凤：《杰出楷模：和乡亲一起读周恩来》，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再论许寿裳对鲁迅及其思想的传播

绍兴博物馆　蒋玲玲

摘　要：许寿裳与鲁迅的友谊长达35年。1936年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为了缅怀老友，以及传播鲁迅思想，着手撰写纪念文章。1946年，许寿裳接受陈仪的邀请赴台，其接受赴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撰写《鲁迅传》。许寿裳关于鲁迅的大部分著述完成于台湾时期。许寿裳以文纪念鲁迅精神，以鲁迅思想鼓舞台湾人民。这一行为在重建台湾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在台湾宣传鲁迅和“五四精神”，以祛除台湾同胞奴化思想，使其精神得到洗涤和升华。这一行为在破除殖民文化、重建中华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当时的台湾社会环境不适合高调正面宣传鲁迅。许寿裳的突然遇害，也使得其夙愿最终落空。

关键词：许寿裳　鲁迅　鲁迅思想　战斗精神

许寿裳与鲁迅可谓生死之交，从1902年东京留学相识，至1936年鲁迅去世，他们的友谊长达35年，同手共进，并肩作战。鲁迅逝世后，许寿裳撰文、著书怀念好友，尤其是到了台湾之后，许寿裳关于鲁迅的大部分著述皆完成于这个时期。许寿裳以文纪念鲁迅精神，以鲁迅思想鼓舞民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作为“战斗形象”被塑造，鲁迅研究成为学界热点。许寿裳与鲁迅有着35年的真挚情谊，他们并肩战斗，互相关怀。且许寿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鲁迅思想的研究者、传播者，因此学术界对许寿裳的关注，主要是其与鲁迅的关系。学者们纷纷发表论文和撰写著作，探讨许寿裳与鲁迅长达35年的革命情谊，以及许寿裳在鲁迅逝世后，整理、研究、传播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对许寿裳与鲁迅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证，正本清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然而学界对许寿裳在台湾时期对鲁迅及其思想的传播的研究仍有不足。通过运用许寿裳日记、文集，以及报刊、回忆录等资料，探析许寿裳对鲁迅及其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在台湾弘扬鲁迅精神的历程。

第一节　与鲁迅的交往

1902年秋，许寿裳以浙江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时鲁迅已于年初，由江南督练公所以南洋官费生资格派赴日本。他们的情谊起源于“剪辫子”。许寿裳到东京的第一天，就“把烦恼丝减掉了”[2]。后来鲁迅把辫子剪掉还拍了张短发照，并在背后题了后来被称为《自题小像》的诗，赠送给许寿裳。所以，许寿裳与鲁迅相识相知起于东京，从那以后他们互相视为挚友，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任。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提道：“他的著译编印的书，出版后大抵都有惠赠给我，并且大抵有题字，弥足珍贵。”[3]他们肝胆相照，共同进退，一起任职于北京大学、教育部、女高师、广东中山大学等，这份友谊，堪比钢铁般坚韧。1934年，许寿裳转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居于北平，而鲁迅居于上海，一南一北相隔甚远，但两人书信来往不断。1935年，长女许世瑢和汤兆恒在上海结婚，许寿裳亲自前往主持，鲁迅、许广平偕周海婴来祝贺。可见二人感情深厚。1936年7月27日，许寿裳从嘉兴返回北平，路经上海去探望鲁迅，以为鲁迅身体虽瘦，精神已健，已转危为安，只需好好调养。殊不知，这是两位好友间的最后一面。鲁迅也许是不愿让老友担心，也可能是好久未见朋友兴致高昂，从而强打精神，没有表现出病态。但鲁迅确实已经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病逝于上海，许寿裳得到老友的噩耗后，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悲伤不能自已。

第二节　怀念鲁迅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化悲痛为力量，挥泪成文，着手撰写纪念鲁迅的文章。1936年10月27日，于鲁迅逝世后第八日，写成《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参与民族解放事业的历程，以纪念鲁迅来鼓舞民众抵御外辱。11月8日，又写就《怀亡友鲁迅》，概述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12月17日，以《鲁迅的生活》一文，分期详述鲁迅战斗的一生。两天后，又写《怀旧》，第一次发表了鲁迅《集外集》遗漏的一些旧诗，如《自题小像》《哀诗三首》《亥年残秋偶作》等。1938年1月，许寿裳利用假期特至万国公墓，以花圈献于鲁迅墓前，并作《哭鲁迅墓诗》以为哀悼：“长夜凭谁叩晓钟。”

这些纪念文章尽管逐步深入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但还未做到系统记述鲁迅不平凡的一生。因此鲁迅逝世后几个月，文化界进步人士发起出版纪念集。《鲁迅纪念集》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纂，于1937年10月19日在上海出版，涵括了蔡元培、郁达夫、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纪念文章。《鲁迅纪念集》除了收录许寿裳撰写的《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怀旧》外，还有《鲁迅年谱》。许寿裳为了写成《鲁迅年谱》，专门前往西三条鲁迅故居访问周母鲁太夫人，询问鲁迅幼年轶事，之后又再次拜访，借阅鲁迅日记，以作资料。关于《鲁迅年谱》，许寿裳一再表示不满意，不仅失之简略，而且当时调查面不广，主要根据几个人提供的情况，难免有片面或不准确之处，特别是关于斗争复杂的上海一段。所以他希望将来能重写《鲁迅年谱》[4]。此外，对于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鲁迅遗著，许寿裳也颇为关心。1937年6月经过上海时，许寿裳偕许广平，拜谒了蔡元培，商讨出版鲁迅全集的相关事宜。但是不久抗战全面爆发，许寿裳随校西迁，与留在上海的许广平失去了联系，故而并没有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

早在1936年，许寿裳就有意写一部鲁迅传，当时他正在

研究传记文学，准备写鲁迅、蔡元培和章太炎的传记。鲁迅的意见是，章太炎和蔡元培值得写，至于他自己就不必写了。1940 年，许寿裳在成都任职于华西大学文学院庚款国学讲座。10 月 19 日，正值鲁迅逝世四周年，许寿裳在日记中追忆故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5]苦于大后方环境以及资料所限，许寿裳虽有心但是无力。

1941 年转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后，工作不似之前繁忙，许寿裳稍有时间撰写短文回忆鲁迅。这些文章都写于鲁迅逝世周年日前后。1942 年 10 月 17 日，写成《关于"弟兄"》，概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之情。1944 年 10 月 18 日，写文一篇《回忆鲁迅》，高度赞扬其"改造社会思想的伟大、事物价值判断的正确、读书趣味的浓厚"[6]。1945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九周年，许寿裳撰写《鲁迅与民族性研究》，叙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盛赞鲁迅："不愧为中国的脊梁！"许寿裳除自己撰文外，还为别人撰写研究鲁迅的著作提供资料和帮助。1942 年 4 月 14 日，为王冶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作序，在文中记叙了几件鲁迅的轶事，并认为"这伟大天才的荣华，在民元前已经含苞待放了"[7]。1942 年 4 月 19 日，教育全书编纂处来信，希望许寿裳撰写《周树人》词条。许寿裳立即回信应允。7 月 8 日，写就词条约万字。1943 年 10 月 5 日，许寿裳收到柳非杞的来信，询问鲁迅旧诗事宜。1944 年 5 月 7 日，受柳非杞所托，为鲁迅诗钞撰序及题跋。许寿裳在序和跋中赞扬柳非杞"用力至勤""用力甚勤"，汇编鲁迅旧体诗共计 52 首。

第三节　在台宣传鲁迅

1946 年，许寿裳接受同乡好友陈仪的邀请赴台。其接受赴台之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撰写《鲁迅传》。为鲁迅作传一直是许寿裳的心愿。1946 年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4 月 18 日，许广平给许寿裳来信说："鲁迅逝世今适十周年，请写回忆文。"[8]许寿裳每年皆写文章回忆鲁迅，而 1946 年正逢十周年，在国人心目中是值得隆重纪念的；日本已于上一年战败投降，国内社会逐渐恢复稳定；许广平来信特别邀稿。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许寿裳决定撰写《鲁迅传》。5 月 18 日，"起草《鲁迅印象记》，成三则"[9]。在赴台前夕，许寿裳一共完成《亡友鲁迅印象记》其中三则，剩余大部分文章完成于台湾时期。

一、完成《亡友鲁迅印象记》

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故而对鲁迅的生活情况十分熟悉。而许广平又是许寿裳的学生，关系匪浅，许寿裳撰写《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稿子，皆寄与许广平审阅。1946 年 9 月 23 日，"信景宋附《印象记》八、九两节至廿六页止"[10]。1947 年 5 月 26 日，"信景宋附《印象记》稿自十五～二十五章全"[11]。日记中相关记载不胜枚举。凡撰写完成一章，则立即寄往上海许广平处，请其审阅校对。许寿裳对于撰写《亡友鲁迅印象记》十分认真负责。许广平回忆：

> 《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稿子如果是托人抄写的，寄出之前，他一定重校一遍，待到见于刊物上，遇到错字，总希望次期设法替他登勘误表，但因篇幅、时间种种关系，未能满足他的愿望，只得委婉向他说明。而当这本书印单行本的时候，我们特地给他校对了一次，到出书之后，从他眼里，还是看见有错字，他又来信要求赶附勘误表。[12]

而《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的出版，也有赖于许广平的奔走联系。1947 年 7 月 31 日，"得景宋信，知《印象记》售

稿已竣”。《亡友鲁迅印象记》最后由峨嵋出版社于1947年10月在上海出版。书中详细记述了其与鲁迅35年的交往之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许广平在《读后记》中夸赞许寿裳的举措:“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13]

二、撰写纪念文章

1946年10月14日,许寿裳写就《鲁迅和青年》一文。五日后,正值鲁迅逝世十周年祭日,此文发表于《和平日报》。这是他抵达台湾后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在文章开头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五四运动骁将,中国新文艺的开山者。”[14]还在文章中直言鲁迅对于台湾青年的关怀和对台湾革命的关注。两天之后,又在《和平日报》上发表了《鲁迅的德行》,高度赞扬鲁迅的品德:“鲁迅作品中,未尝明言道德,而处处见其德行的流露。”[15]鲁迅的各种美德举不胜举,堪为国民的典范。

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台湾文化》第1卷第2期(1946年11月发行)专门设立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许寿裳在上面发表了《鲁迅的精神》一文(完稿于1946年9月30日),将鲁迅的精神总结为战斗精神,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其“为不真,不善,不美而毕生努力奋战”[16],抗争到底,至死不渝。《台湾文化》的编辑在“特辑”的后记中指出:“我们相信,这一本‘纪念鲁迅特辑’,对于台湾文化贡献一定不少。”[17]此言得之。在“特辑”上撰文的包括许寿裳等一批大陆来台文化人士,将大陆“五四”新文化精神传播至台湾,为光复后的台湾文学界带来一股清流,同时也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

许寿裳与“台湾文化协进会”的诸人交好,尤其是杨云萍,此后撰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多发表于《台湾文化》,以文寄哀思。《鲁迅的人格和思想》完稿于1946年10月29日。在文中,许寿裳称赞鲁迅为“文化斗士”。他以笔为剑,冲锋突击,以一己之力,揭露黑暗,破开一条光明自由之路。鲁迅的人格魅力更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1947年,杨云萍结集十篇许寿裳撰写的关于鲁迅的杂文,由“台湾文化协进会”于6月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全书包括六篇发表于大陆时期的文章、四篇发表于台湾报刊的文章[18]。这些文章盛赞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希冀以战斗精神、创造精神、为劳苦大众革命的精神鼓舞台湾人民,不断同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作斗争。《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出版后,许寿裳照例将此书寄与许广平审阅。之后又写就3张勘误表。这体现了许氏孜孜不倦、认真严苛的治学态度。

除《亡友鲁迅印象记》和《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两书外,还有一些零散文章并没有收录成书。1.《鲁迅与民族性研究》。1945年10月18日,写一文《鲁迅与民族性研究》,次日完稿。后发表于1945年11月3日出版的《民主》第6期。此文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于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2.《鲁迅的游戏文章》《鲁迅的避难生活》。许寿裳在1947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日写成两稿(一)《鲁迅的游戏文章》、(二)《鲁迅的避难生活》。”[19]按照日记记载,两篇文章应该成文于同一时期。《鲁迅的避难生活》完稿于1947年7月28日,后发表于1947年10月的《时与文》第2卷第6期;《鲁迅的游戏文章》完稿于1947年9月30日,后发表于1947年11月的《台湾文化》第2卷第8期。姑妄推断,也许是发表于杂志的《鲁迅的避难生活》修改版,与《鲁迅的游戏文章》初稿完成于同日。这两篇文章后来皆收录于《我所认识的鲁迅》。3.《鲁迅和我的交谊》。根据许寿裳在1947年6月的著者附志中记载,此文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第二十三章。后发表于1947年8月的《台湾文

化》第2卷第5期。4.《跋鲁迅讲演手稿——娜拉走后怎样》。1947年3月26日跋台静农藏《鲁迅讲演稿手迹——娜拉走后怎样》,此文并没有发表于任何杂志和收录于发行的单行本,因是台静农的私人收藏。

综上,许寿裳在赴台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关于鲁迅的著述远胜于以往。《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几乎全部内容、《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近一半内容,以及许多零散文章都是在台湾完成的。撰写文章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鲁迅,更是为了在台宣传鲁迅,以鲁迅精神进行斗争。

三、以鲁迅精神进行战斗

许寿裳虽然在日本留学多年,但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台湾人民深受日本影响,"非努力自拔,彻底自救不可"[20],除国语教育外,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新的五四运动"[21],把浸染已久的日本影响根除干净。故而许寿裳高举鲁迅战斗旗帜,发扬"韧的精神",在台湾积极宣传鲁迅及其思想,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以期台湾人民"加紧改正人生观,涵养仁爱的精神,实践仁爱的道德"[22],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国民。

许寿裳作为教育家,本无心于政治斗争,然而他身为老同盟会会员,对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有所不满。1941年,因不满陈立夫的擅权,愤而辞去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对上级和当权者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趋炎附势,苟且自保"[23]。

鲁迅生前经常抨击国民党,晚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甚至公开表明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管是生前还是逝世后,鲁迅的作品和思想都受到国民党的敌视。而许寿裳赴台后宣传鲁迅的做法,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相抵触,更添一分敌意。与国民党固有的矛盾,再加上宣传鲁迅,使得许寿裳遭到许多诘难。

1946年10月,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许多杂志、报纸制作了鲁迅纪念特辑,不久就出现了猛烈抨击许寿裳的文章[24]。文章中虽然尊称许寿裳为"先生",然通篇言辞激烈,"滑稽""敷衍""投机"等词,不仅否认鲁迅的功绩,更是对许寿裳的攻击。然而许寿裳面对这些抨击不以为然。朋友贺霖劝其删去鲁迅纪念文章中不太适宜的部分:

> 我反而被这样一位老先生的英勇的写作精神和对于亡友的伟大的正义感所感动了,向他说:"先生的文章,对于鲁迅先生的人格和精神的阐扬是好极了,现在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得这样亲切和真实;不过先生现任公职,文中有些地方不免要触到某些人的疮疤,恐于先生的事业不利,是否可以迟一迟发表呢?"先生的答复是:"人已经死了,我写的是关于死人的事情,也许不会有什么关系吧?"[25]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台湾的社会环境不适合高调正面宣传鲁迅。然而对于许寿裳来说,写文章必须做到秉笔直书、平直朴实,既不能太过,又不能不达原意。而且许寿裳来台是怀着纪念鲁迅、宣传鲁迅这一目的的,为毕生挚友作传是其最大心愿,必然不会听从朋友的劝阻。许寿裳在《鲁迅的精神》中极赞鲁迅:"为不真,不善,不美而毕生努力奋战。"抗争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同时也是许寿裳的精神!尽管遭遇种种压迫和艰难,至死不渝。"这些文字我都一概置之不理,我要学鲁迅的战法!"[26]

许寿裳面对别人的谩骂,率真、坦然,不失文人的风骨;面对亲人朋友的劝告,我行我素,坚持本心。继续孜孜不倦地撰写鲁迅纪念著作和文章。以笔为剑,不断战斗。然而,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允许鲁迅思想的传播,许寿裳的言行给他自己招致了许多麻烦。其著写《鲁迅传》的夙愿也未能

完成。

1948 年 2 月 18 日深夜，许寿裳在睡眠中被害，一代进步教育家就此命殒台湾。

第四节　余论

许寿裳与鲁迅拥有长达 35 年的情谊，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即着手撰写纪念鲁迅的文章。为鲁迅作传一直是许寿裳的心愿，而台湾光复初期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了许寿裳撰文的机会。许寿裳在台湾的短暂两年内，关于鲁迅的著述远胜于大陆时期，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还完成了两本书稿。这些著作成为后来者研究鲁迅的宝贵资料。文以载道，撰写文章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鲁迅，更是为了在台宣传鲁迅。

许寿裳的台湾时代虽然短暂，但是著作颇丰，其文其行，不仅对当时台湾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新时代反对“台独”思想，具有借鉴作用。许寿裳通过宣传鲁迅和“五四精神”，加强台湾人民的心理建设，重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许寿裳孜孜不倦地弘扬中华文化、宣传鲁迅爱国思想，在重建台湾文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德林：《挚友之间——鲁迅与许寿裳》，《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4 期。周葱秀：《谈许寿裳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0 年第 8 期。徐东波：《许寿裳的鲁迅著述篇目考》，《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4 期。顾蒙山：《〈鲁迅日记〉有关许寿裳及其亲属注释订误》，《鲁迅研究月刊》1993 年第 5 期。许寿裳：《〈许寿裳日记〉选刊（1940—1948）——与鲁迅有关部分》，《鲁迅研究月刊》1993 年第 11 期。许世玮：《鲁迅致先父许寿裳信函简释》，《鲁迅研究月刊》1993 年第 12 期。蔡登山：《长夜凭谁叩晓钟——许寿裳为鲁迅而死》，《全国新书咨询月刊》2006 年第 10 期。宋志坚：《许寿裳与〈鲁迅全集〉》，《炎黄纵横》2008 年第 5 期。王飞：《许寿裳与鲁迅的友情》，《湖北档案》2011 年第 3 期。

[2] 许寿裳：《剪辫》，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 年，第 2 页。

[3] 许寿裳：《鲁迅和我的交谊》，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 年，第 109 页。

[4] 罗慧生：《鲁迅与许寿裳——从一个侧面看鲁迅》，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09 页。

[5]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586—587 页。

[6] 许寿裳：《回忆鲁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年，第 18—21 页。

[7] 许寿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 年，第 13 页。

[8]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769 页。

[9]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773 页。

[10]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788 页。

[11]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807 页。

[12] 景宋：《关于许寿裳先生》，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24 页。

[13] 许广平：《读后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 年，第 139 页。

[14] 许寿裳：《鲁迅和青年》，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北：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年，第 19 页。

[15] 许寿裳：《鲁迅的德行》，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北：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年，第 16—18 页。

[16] 许寿裳：《鲁迅的德行》，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北：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年，第 16—18 页。

[17]《台湾文化·后记》,《台湾文化》1946年第1卷第2期。
[18]《鲁迅的人格和思想》(1946年10月29日)、《鲁迅的精神》(1946年9月30日)、《鲁迅的德行》(1946年10月)、《鲁迅和青年》(1946年10月14日)。
[19] 黄英哲，秦贤次，陈漱渝，萧振鸣编校整理:《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18页。
[20]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黄英哲编校整理:《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台北：台大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21]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黄英哲编校整理:《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台北：台大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22] 许寿裳:《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心》,黄英哲编校整理:《许寿裳台湾时代文集》,台北：台大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23] 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24] 游客:《中华民族之魂!》,《正气月刊》1946年第1卷第2期，第3—4页。
[25] 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154页。
[26] 贺霖:《许寿裳先生在台湾》，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154页。

博物馆在景区化建设中的探索与研究

——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例

绍兴鲁迅纪念馆　周玉儿

摘　要：博物馆景区化，旨在以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为主体，运用多元手段把文化资源转变成旅游产品，将博物馆建设成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览、参观、学习、休闲，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和公民素质提升。本文以绍兴鲁迅纪念馆在景区化建设中的经验为例，从文物保护升级、展陈内容丰富、旅游硬件提升、智慧旅游创新、社教活动活跃五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为其他纪念馆、博物馆在景区化建设中提供借鉴。

关键词：纪念馆　景区　文物　旅游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人们到博物馆游览，寻探文化神秘之源，拓宽视野广角，把博物馆当作景区旅游的愿望与日俱增。通过保护拓展、硬件提升、展陈丰富、智慧创新等方法，将博物馆建设成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览、参观、学习、休闲，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和公民素质提升。从目前的文献搜索情况来看，国内真正意义上对博物馆景区化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者们开始探讨博物馆应与景区融合，这样能获得更好的效益。张广瑞最早提出博物馆应与旅游业携手，以求得更好的发展，之后博物馆旅游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1]2007年8月24日，世界博物馆协会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提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明确了博物馆教育欣赏功能，突出博物馆观赏价值，将博物馆与景区旅游更加紧密结合。200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口号是"博物馆与旅游"，预示博物馆景区化，势必促进博物馆发展。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例》指出："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这说明博物馆是人们旅游时游览的景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科学利

用传统村落、文物遗迹及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艺术馆、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文化场所开展文化、文物旅游，推动剧场、演艺、游乐、动漫等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开展文化体验旅游。”可见开展全域旅游，博物馆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博物馆要根据景区旅游的要求，做好景区旅游项目设计，营造景区旅游文化环境、空间环境，助推博物馆景区化发展。

绍兴鲁迅纪念馆始建于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批人文类博物馆。鲁迅故居、鲁迅祖居、三味书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藏有文物资料6150件，其中，国家一级革命文物50件。2002年《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实施，绍兴鲁迅纪念馆扩容为鲁迅故里景区。2008年6月起整体免费开放。绍兴鲁迅纪念馆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十余项国家级荣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每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观众满意度稳居浙江省AAAAA级景区前列，是绍兴古城文化的旗帜和标杆，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本文以绍兴鲁迅纪念馆在景区化建设中的经验为例，从文物保护升级、展陈内容丰富、旅游硬件提升、智慧旅游创新、社教活动活跃五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为其他纪念馆、博物馆在景区化建设中提供借鉴。

一、博物馆景区化，文物保护升级

绍兴是世界文豪鲁迅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历史悠久，古迹众多，鲁迅儿时生活和读书的故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都原汁原味地保存完好，鲁迅祖居、鲁迅笔下的风情都保留着当年的气息和滋味。还有寿家台门、长庆寺等多处绍兴市级文保单位，以及大量与鲁迅文化和绍兴传统文化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周边还保存着一批相当规模并传承了丰富历史信息的传统民居台门建筑。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绍兴鲁迅纪念馆周边的路面已拓宽到25米，乱搭乱建现象严重，部分老屋年久失修，严重影响了街区历史风貌的协调，街区已无法与鲁迅笔下的风土人情和江南水乡绍兴古城相联系。2002年，中共绍兴市委、市政府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原有的基础上，慎重决策实施《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整个工程严格按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划定文物古迹、古建筑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在具体实施中，坚持整体保护、原汁原味、修旧如旧、原版再现，体现历史文脉的延续原则，共使用了旧石板2500平方米，旧砖瓦片300万张，旧石构件2500个、石方连4000米，旧木构件100立方米，通过保护、改善、保留、整饬、拆除、重建、移建、新建八种保护与整治模式，使整个环境风貌达到整齐、美观、和谐。经过两年的保护建设和修缮，2004年5月，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式扩容升级为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核心总面积增至28.9公顷。鲁迅故里不仅保留鲁迅当年生活的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还恢复了周家新台门、寿家台门、土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鲁迅有关的古宅古迹。鲁迅故里历史街区是市区保存最完好、最具文化内涵和水乡古城经典风貌的历史街区，实现了从“鲁迅纪念馆”到“鲁迅故里景区”的转变，被誉为中国名人故居保护的范例，是博物馆景区化的经典之作。从故居到故里，从景点到景区，弹奏出文物放大利用效应、旅游反哺文物保护的和谐音符。

二、博物馆景区化，展陈形式丰富

博物馆是组织保护和陈列藏品的永久性机构，肩负着实施教育和传播文化的社会功能。如今，现代生活对人的个性需求的关注，引导着博物馆的建设更向景区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游客需求的提升，博物馆的功能和内涵也在不断发展，注重原汁原味、生活化、人性化展示设计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从“纪念馆”到“景区”的鲁迅故里景区，采用清末民初时期的旧石板、旧石墩、旧石窗，复原了鲁迅当年生活时的古朴厚重的步行街道，移建了老房子新空间的鲁迅纪念馆，修复了鲁迅故居的组成部分——周家新台门、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的故宅——寿家台门、绍兴典型的花园式民居台门——位于鲁迅故居东侧的朱家台门三大台门建筑。在周家新台门开辟了“鲁迅家世展览”“周氏兄弟展馆”，陈列了鲁迅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的生平介绍以及他们对鲁迅的影响。在寿家台门增加“越中古代教育史陈列馆”，以实物和照片形式展示了灿烂的古代绍兴教育史。恢复了鲁迅祖居西厢房生活原状陈列布置，展示鲁迅祖上作为大户人家的生活原貌。修复了鲁迅故居东侧的朱家台门，修缮后作为“鲁迅笔下风情园”，向游客展示旧时绍兴祝福、水乡看戏、迎神赛会、越俗漫画、绍俗婚嫁等民俗风情，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举办陈列展览，开展宣传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任务。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中，绍兴鲁迅纪念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及时把握时代脉搏，除采用智能化、多媒体等现代陈列手段陈列“鲁迅生平事迹”外，还利用临展厅，结合纪念鲁迅先生诞辰、“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点，积极推出举办多场大型原创展览。分别推出“黑白世界的真善美——馆藏赵延年鲁迅作品木刻展”“鲁迅·徐志摩——呐喊和歌唱的人生”“五四潮·中国梦——鲁迅与同时期绍兴乡贤”“鲁迅的面容——馆藏中国美术新木刻作品展”等专题原创展览，使馆景区的陈列展览成为宣传民族魂思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阵地。

三、博物馆景区化，旅游硬件提升

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里景区）2012 年成功晋升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这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景区化发展的历史性洗礼，对于纪念馆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博物馆创 A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对照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细则要求，逐项对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和环境保护八大部分进行检查，并逐一给予提升解决方案。博物馆自身是创 A 工作实践的龙头，也是核心的利益主体。可以说，博物馆创 A 能够规范提升博物馆的综合质量，有效提高博物馆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 AAAA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中，绍兴鲁迅纪念馆积极推进功能性设施景观化改造、标识系统优化、墙面路面整修等工程，增设手绘全景图、3D 雕塑沙盘等直观化、具象化的引导标识。健全旅游配套设施，增设主入口防撞柱、安全木栈道、雨天游步道，增加休息座椅、直饮水机，设置互动引导电子屏等设施，从身边的细节小事入手，提高游客游览体验舒适感。拆除绍兴鲁迅纪念馆原先封闭的围墙，改建为“池水印章”新景观，让纪念馆“显山露水”，行走在鲁迅故里文化街区，绍兴鲁迅纪念馆一目了然。在创建中，馆景区有效缓解假日停车难问题，分别协调位于鲁迅故里景区周边的近千个车位，作为旅游高峰期的临时停车场，以满足游客

的出行需求。此外，纪念馆联合公交部门开通运行绍兴主要景点的旅游专线、“阳明号”古城旅游公交环线，景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进一步畅通，既方便了游客，又提升了馆景区的辐射能力。厕所革命是绍兴鲁迅纪念馆AAAAA级旅游景区创建的最大亮点。馆景区设置全景区旅游厕所引导地图，方便游客迅速找到就近的旅游厕所。同时完善旅游厕所配套功能，如第三卫生间、母婴室等，并增设置物架、卫生纸、衣帽钩等贴心小设施。落实专人保洁与监督机制，确保厕所“找得到、上得了、总有纸、无异味”。

博物馆创A，是规范博物馆服务管理的外在驱动，能够提高游客的满意度，提升博物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借创AAAAA级旅游景区的东风，绍兴鲁迅纪念馆着力打造金牌讲解员队伍。依托青工技能工作室，开展专业培训、星级管理、赛事选拔等活动，完善游客反馈机制，优化多语种讲解服务，开发推广智能讲解系统。为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完善讲解员管理体制、考核机制和运作模式，馆景区在完善已有制度的基础上，汇总出台《鲁迅故里讲解员管理制度》，对讲解员工作提出更专业、更细致的要求，实行规范化、专业化管理，力求为游客提供最为优质的服务。另外，景区每年年终进行一次公开考核，择优评定讲解员星级。考试内容每年各有不同，分为笔试和现场讲解考核，不仅考查讲解员的业务水平，还展现了讲解员的文字功底与知识内涵。同时，馆景区强化细节服务，整合志愿服务项目。景区常年开展志愿讲解、文明引导、便民咨询、卫生保洁等服务，拓展志愿服务的涵盖面。推出轮椅租借、临时身份证打印、遗失证件招领、蓝牙讲解服务、大件行李寄存等十项便民举措，同时还增设红十字救助站。救助站内设有咨询台、诊断室、器材室、休息室、培训室、母婴室和办公室，相应配置轮椅、担架、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手提医用急救箱等急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满足紧急救护与简单医疗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为游客提供快捷、方便、全面的应急救护和服务，保障旅游安全与健康，构建和谐博物馆景区化示范点。

四、博物馆景区化，智慧旅游创新

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过程中，博物馆要积极创新、不断调整思路，探索智慧时代发展新路径。要进一步探索博物馆与景区结合智慧旅游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博物馆与旅游景区智慧旅游建设接轨。绍兴鲁迅纪念馆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过程中，全景区免费无线Wi-Fi覆盖，LED实时反映景区承载量，便于游客合理安排参观游览线路。游客可通过游客中心文博机更好地了解绍兴吃住行游购娱，关注鲁迅故里公众微信号可免费听线上讲解、了解各主要景点，网上购票的游客可通过自助售票机直接扫码取票。鲁迅故里参观游览无须换票，凭本人有效证件直接刷证入园，馆景区整合线上支付，实现全窗口覆盖、一站式收银。同时，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中，馆景区优化承载量控制系统，充分利用智慧管控平台，发挥监控回放、智能预警、数据分析等功能，实时提供在园人数等信息，实现了对景区内文保建筑、参观场所、餐饮商铺、危险区域等安全隐患点的监控设备全覆盖，以及对景区内的用电、用火、用气、停车场、消防设施、垃圾桶、古树名木等的系统化管控。强化“对人”和“对物”的管理。

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中，馆景区还启动分时预约系统，智慧调控。景区严格按照“限流、预约、错峰”的要求，通过采取预约游览、分段进入、疏导分流等措施，全面落实实名制分

时预约制度。智慧管控平台对日接待量、瞬时承载量进行实时监测，精准调控游客数量。同时，馆景区还利用官方微博平台，发布预警信息、旅游安全注意事项、防踩踏防拥堵等安全提示，及时调控分流，第一时间提醒游客合理调整游线，选择客流量较少的景点先行参观。纪念馆合理分配旅游资源，分散游客入园时间，避免游客聚集，高效保障景区的游览秩序与游客的游览体验。此外，纪念馆加强与美团、驴妈妈等重点 OTA 的合作，借助 OTA 的影响力，提升游客知晓率，加强“阿 Q 旅行网”的建设与推介，实现“一键式”制定游程，改版提升景区官网，优化线上自媒体服务，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全方位、一站式旅游综合服务。

五、博物馆景区化，社教活动活跃

在突出“人本”精神的“新博物馆学”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认识到促使博物馆发展的真正和持久的动力来自游客的支持，游客对博物馆的需求，是一种综合了博物馆物理和人文环境的“博物馆体验”。为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特别是与青少年游客的距离，让他们在游览过程中对鲁迅和他的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绍兴鲁迅纪念馆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中，撤除了经营商场，在展厅一楼区域开辟鲁迅作品阅读区，增加鲁迅家训“恒训”书法习字课、“水乡社戏”乌篷船拼装课、鲁迅故里研学闯关课、鲁迅特色“藏书票”拓印课等趣味互动小课程。

为了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鲁迅的儿时生活，纪念馆推行“活化展示”，以戏曲演员在鲁迅笔下风情园社戏舞台表演绍兴地方戏曲，在鲁迅祖居大堂前展示年终祝福仪式，在三味书屋表演鲁迅刻“早”字的情景剧等形式，让游客穿越古今、身临其境，重现鲁迅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场景。以深化绍兴鲁迅纪念馆晚间开放为导向，馆区推出“博物馆之夜”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提升晚间开放灯光系统，将更多绍兴历史人文元素融入灯光设计。结合鲁迅故里步行街历史，融“夜集”与“Yeah 集”双重含义于一体，景区特别推出“东昌夜集”活动，以丰富游客的夜生活，打造独具特色的市中心夜游目的地。“东昌夜集”主要以鲁迅故里街区为主要活动地点，设美景、美食、美物、美文、美酒五大主题进行业态分布，通过“五美”综合展现绍兴文化和地方特色，打造融演艺、体验、消费等于一体的夜集新模式。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浓厚，东昌夜集让街灯“亮”了起来，街区“旺”了起来，夜游经济“活”了起来，让古城的“烟火气”越来越浓，使鲁迅故居晚间开放成为一场光与影的艺术盛宴，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博物馆景区化建设中，纪念馆改版升级“三味书屋—鲁迅故里”特色研学游活动。“三味书屋—鲁迅故里”研学游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最具特色的宣教活动。作为全国研学游双基地，绍兴鲁迅纪念馆在“跟着课本游绍兴”“中小学生走近鲁迅主题活动”的基础上，不断推出升级版研学社会教育课，走出一条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的发展之路。2019 年版研学游由“鲁迅作品展示课、历史文化体验课、三味早读情景课”三课组成，课程更加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该课程荣获浙江省青少年教育课程“十佳教育设计案例奖”、浙江省“十佳青少年教育项目”等荣誉。同时，绍兴鲁迅纪念馆围绕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省级机关党建基地，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开放服务、规范管理”为出发点，深入挖掘梳理红色人文内涵，面向中国共产党党员推出“红色党课——鲁迅与共产党人”，回顾鲁迅与李大钊、许广平、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宋庆龄等革命志士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敬献诚挚纪念、传承优秀品

格。现已成为浙江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党日活动一大基地。

走进新时代，博物馆的发展遇到了新机遇，跃上了新台阶。博物馆、纪念馆要抓住历史机遇，主动融入景区化发展大潮，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手段、奋进的精神、扎实的工作，把博物馆、纪念馆打造成生命力旺盛的景区，使之成为中国梦的实践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参考文献：

[1] 陈桂洪等：《国内博物馆旅游研究进展与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2 期。

五百年来一青藤

——“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特展策展记

绍兴博物馆　沈一萍

徐渭是中国艺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在文学、书画、戏曲等方面独树一帜。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被袁宏道誉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开启了晚明“尚态”书风；谙音律，好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文学理论上，反对因袭、拟古、摹古，提倡创新、抒发真情，早于公安派提出的性灵说主张。

但以往介绍徐渭，无论是专题展还是明清画家的综合展，主要表现其书画成就。在徐渭诞辰500周年之际，绍兴博物馆以什么面貌展示徐渭，告诉观众怎样的故事，如何在中共绍兴市委、市政府文化兴市战略和文旅融合的新形势下讲好徐渭故事，恐怕只是简单重复过去的书画展是不够的。因此，确定展览主题既是纪念徐渭诞辰500周年的大事情，也是办好特展的关键。

一、展览缘起

2017年，绍兴博物馆在完成“圣贤之道——阳明的故事”特展后，就在思考为2021年徐渭诞辰500周年的特展做准备，以配合市委市政府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

徐渭在全世界，在学术界、书画界和民间都很有影响，但情况各不相同。在调研过程中，对徐渭的评价和观点也各不相同。它表现在古今不同，学科界别不同，官方民间不同，国际国内不同。比如，徐渭自我评价、同代人评价、晚明和清代全然不同的评价，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官方史料如《四库全书》《明史》的评价和绍兴民间的流传不一致，哪一种更合乎实际？书画界认为徐渭的书画是其才艺最好的表现，但戏剧界认为徐渭的戏剧及研究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点也不亚于绘画，哪一个更准确？

当下的国内美术界对徐渭的作品不吝夸赞，而20世纪上半叶学界几乎不置一词。国外学者如高居翰的《山外山：晚明绘画史》、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一次也没有提到徐渭。高居翰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中只一处比较了徐渭和张风画的竹子后认为，人物精神状态体现在作品中的传统看法，在表现主义看来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85页）。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只是谈徐渭的肖像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国内学者如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国美术年表》也没有提到徐渭。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仅把徐渭列入嘉靖以后27人的画家名单中（中华

书局 2010 年,第 51 页)。

又比如,研究徐渭诗歌散文的学者认为,其诗歌散文价值被严重低估,尤其是其包含的阳明心学的文艺思想、美学观念被其书画渲染而遭忽略;书画界的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影响广泛(张淼:《徐渭研究百年述评》,《徐渭散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如此等等说明,要全面、正确地办好纪念徐渭诞辰 500 周年的展览没有大量的研究是不行的。虽然举办书画展也足以全面反映这位艺术天才,但不符合纪念徐渭诞辰 500 周年之义,这也使我们确定展览的主题颇为踌躇。故博物馆对外一直以“徐渭大展”为题,这既是选题的困境,也是慎重和免除外界的干扰。

二、展览策划

经过学术界、文博界和博物馆相关学者长时间的研讨,定下以“畸人”为主题,用“青藤”作符号,把徐渭的一生作为展览主线,以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学术支撑,以各大博物馆的徐渭藏品为展览内容,从畸行、畸文、畸艺、畸人四方面全面展现徐渭。

“畸人”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者,奇也,畸人即不流于世俗而合于天道的异人。《庄子·内篇·大宗师》认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可谓是对天才的一种极高评价。明万历十八年(1590),徐渭在七十岁生日时作诗自称“畸人”,自编年谱《畸谱》。徐渭用“畸人”的典故撰写自传《畸谱》,既是自信,也是其自我的盖棺论定。此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畸人怪才——徐渭传》的专著,“畸人”的主题是符合主流看法的。

“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展览是首次全方位、通史性地介绍徐渭的一生。主题确定后,即以说故事的形式向公众展现徐渭其人、其事、其文、其艺,通过“畸人之行”“畸人之文”“畸人之艺”等视角向公众展现这位艺术天才坎坷跌宕、起落丰富的人生和对中国书画艺术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展品除了徐渭的书画作品外,还有反映徐渭的戏剧、诗歌等方面成就的文物展品,尤其是与徐渭同时代和受徐渭影响的军事家、书画家、戏剧家的作品。同时,展览打破了按照作品编

年界限的传统表现手法，改按单元陈列，以作品内涵展现“畸人”的特点。

三、展览构建

“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定下“畸人”主题后，仍沿用讲故事的展陈方式，一方面是博物馆对绍兴名人故事系列的延续和惯例，另一方面也能让观众更亲切平易地了解徐渭的一生。展览结构如下安排：

1. **畸行**。通过徐渭生平的三大重要事件——科举、入幕、杀妻，介绍徐渭由书生到师爷再下狱的坎坷经历、精神变化及逻辑关联。

2. **畸文**。通过散文、诗歌、戏剧三方面的成就，展示徐渭为什么会自认为自己的诗文尤佳，揭示其诗文水平与时代风格的差异性和突破性，以至于赢得袁宏道的激赏。

3. **畸艺**。通过书法、绘画的展示，展现徐渭的“畸艺”其实是超迈世俗的艺术行为，有阳明心学的思想基础，有其自身的审美认知和坎坷经历的心理投射，所谓的“畸艺”（大写意）只是领先时代不为人知而已。

4. **畸人**。通过同时代文人、后学的追慕、评价和研究，反映徐渭倡导的书画理念的蓬勃生机和影响力，徐渭对于中国书画艺术做出的卓越贡献。

“畸人”的主题，“青藤”这一符号对展览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辨识度。“畸人”其行、其文、其艺、其人，构成了完整的人格发展链条。展览对徐渭痴迷科举、杀妻、自得于嘉靖皇帝赏识白鹿表等事件，不回避，不隐讳；对其文章在当时语境下非秦汉、亦非唐宋的文风，坚持自我意识予以充分肯定，所谓的“畸文”只是反对八股时文、反对因循守旧而已。从徐渭艺术的开创性来看，展览得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 30 家兄弟馆的鼎力支持，将目前国内馆藏的徐渭重量级作品结集至绍兴，集中展示，方便观众从同时代书画发展的脉络上，感受徐渭书画的卓尔不群、开宗立派。

展览大纲初稿拟定后，博物馆与有关专家进行了审读和沟通，在史实、文辞、展品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几轮沟通。如徐渭晚年居家，山阴知县刘景孟慕名造访事件，该县令的名字过去没有记载，是近年的研究结果。又如多种史料和研究称徐渭参与擒杀倭寇汪直，其实应为王直。类似的研究成果都在展览中得到呈现。

策展完成后，馆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该展览主题鲜明、提炼精准、概括简明、叙述得体、文辞雅训、体量适宜、精品众多，是 2021 年少有的人物类书画大展。

四、展览亮点

本展览亮点众多，梳理后共有七大亮点。

1. **首次个展**。“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是国内首个全面展示徐渭一生和其艺术风貌的特展。

2. **策展理念**。展览主题回应传统、尊重文献，以“畸人”为题，既是对徐渭一生才艺的高度肯定，也是其生平的简明

概括，在国内同类型展览中属于首创。为纪念绍兴文化名人，绍兴市人民政府在青藤书屋旁新建徐渭艺术馆，艺术与文物保护地相得益彰，践行文旅融合理念。通过以老带新、老新结合的合作共建，绍兴博物馆与徐渭艺术馆共同办展，在短时间内使徐渭艺术馆达到向公众开放的水准，是文博工作的一项创举。

3. **文物群展**。此次特展联合了国内30家文博单位，是全国举办的徐渭临展中，规模最大、藏品最优、参展单位最多的展览。其中有多家国家级和一级博物馆加盟，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等。

4. **珍品稀见**。徐渭书画作品空前汇聚。在参展的100件(组)展品中，一级文物17件，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19件，为迄今规模最大、作品最优的临展。故宫博物院的《墨葡萄》《行书千字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初进白鹿表》、上海博物馆的《草书春雨帖诗卷》、广东省博物馆的《淮阴侯祠卷》、山西博物院的《草书咏月诗轴》、青岛市博物馆的《群望诗轴》、天一阁博物院的《白燕诗轴》等作品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弥足珍贵。

5. **展研藏并重**。配合展览，由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为主导，绍兴博物馆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品集》同步首发面世。本书即“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

特展配套图录，收录展出的64件来自国内国有博物馆的徐渭书画藏品。书中专题文章由刘正成先生、陈传席先生撰文；作品考释由沈伟先生撰写。作品集还收录徐渭《自为墓志铭》《畸谱》、陶望龄《徐文长传》、袁宏道《徐文长传》、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张廷玉等主修的《明史·徐渭传》和纪昀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徐文长集》，方便读者从徐渭自身、同代和正史的角度了解对他的不同评价。《徐渭生平年表》和《徐渭作品表》则为读者提供进一步检索的信息。总之，本书既浓缩了特展的精华，又具研究、鉴赏和收藏的价值。

6. **展陈形式**。坚持展览形式服务展览内容的原则。在环境硬件上，绍兴市委、市政府新建徐渭艺术馆，整治提升

了青藤书屋周边环境，为观众提供优良的观展氛围。在建筑设计上，通过南北长展廊串联起各子项展厅。不同尺度的斜坡屋顶，蕴含了徐渭的艺术和人生的“畸正”变化，在丰富视觉空间的同时，为艺术展陈带来更多可能性。

在空间营造上，从展陈设计初就考虑徐渭有许多罕见的中堂大轴作品，为其量身打造独特的展陈空间。

在文物保护上，徐渭作品大轴、长卷较多，展陈设计时，量身定制 4 米、5 米的高柜，20 米的平柜，使巨幅立轴和手卷一览无余地呈现展示。这样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方便观赏。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高柜来展示书画作品，再现巨幅立轴的不易、惊艳和震撼。

在展陈形式上，将“畸行”“畸文”“畸艺”“畸人”四个单元各设一个展厅，从榴花书屋内的人文褐到青藤庭院的青圭，从青藤树下的青梅色到青藤花开的紫府色的色彩过渡，既有主次又有区分，纵向的色彩对比与横向的互补相联系，使每一个展厅和不同的展览主题相互融合、渐入佳境。

在内容主导上，展览内容分徐渭书画、徐渭及其师友著作文献、徐渭后学书画作品等几个部分，展线据此安排四个展厅，在同样主题下用不同空间串联起徐渭的生平、文化背景和朋友圈，加深观众的理解。该展览不仅仅是徐渭的书画展，更是徐渭的文化展。

7. 宣传推介。展览期间，绍兴博物馆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教育推广活动，为不同需求的观众提供全方位的观展体验。儿童版研学手册为馆校教育、亲子教学、假日旅游提供研学基础。微信自助语音导览、徐渭书画表情包原创设计、徐渭数据库查询、徐渭故事视频动漫等，为不同层次的观众深入了解作品、丰富参观体验提供了方便。这些配套的服务，让徐渭艺术以现代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

徐渭生平境遇之坎坷和艺术成就之奇绝，为“有明一人”（袁宏道语）。深受阳明学说影响的徐渭反对理学和古人束缚，张扬个性，提倡真我和本色，在文学、诗歌、书法、绘画诸多方面特立独行。展览的“畸人主题”正是 500 年后对他“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明人梅国桢评价）的全面展现，是对他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标榜“畸人”的肯定。本次特展结束后，绍兴博物馆将启动“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全国巡展，也是讲好绍兴故事，宣传绍兴文化，扩大城市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坚定文化自信的一次成功尝试。

疫情之下博物馆线上传播探析
——以《线上绍博》为例

绍兴博物馆　胡秀苇

随着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愈来愈多样。博物馆终年与年代久远的文物为伴，传统的陈列展览受到地域空间的限制，已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多样的观展需求。尤其是疫情期间，实地观展受限之时，寻找博物馆“展示”和“传播”的新方式显得极为重要。

《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的指导意见》指出：“继续利用数字资源，通过网上展览、在线教育、网络公开课等方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展示及内容，提供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为了减少文物“高高在上的距离感”，满足疫情期间人们的观展需求，扩大文物展览的普及度与影响面，绍兴博物馆推出了《线上绍博》系列纪录片，旨在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学绍兴历史、看绍博展览，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线上绍博》内容简介

《线上绍博》是绍兴博物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以介绍绍兴历史文化、普及文物知识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该系列纪录片着眼于绍兴历史背景、相关史实、绍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等，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通过讲解员现场讲解、画外音、图片、实物拍摄等手段的配合，最终以纪录片的形式在社交网络媒体呈现。目前已推出六期：第一期《越地巾帼》，紧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主题，介绍绍兴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五位杰出女性；第二期《居有定所》，从馆藏文物出发，介绍古越大地历史长河中的特色越地建筑；第三期《文明初现》，通过介绍古越人民的图腾，解读古越先民的信仰与习俗；第四期《文明初现 2》，介绍越人特有的语言与文字；第五期《秀松长青的红色革命家》，从俞秀松的家书引

出他心系家国、投身革命的伟大事迹；第六期《“监狱大学”的红色教官》，讲述了红色革命家张秋人在狱中坚持不懈传播革命火种的故事。

二、《线上绍博》传播形式与传播效果

在信息时代，博物馆需要打破自身“高冷”限制，重视交流互动，不自我设限，在遵循社交网络法则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传播形式，使博物馆走向公众，成为博物馆的一张网络名片。微博、微信是目前深受年轻受众喜爱的新媒体信息传播渠道。博物馆要扩大影响面，就必须摆脱博物馆陈旧的刻板印象，牢牢抓住微信、微博传播渠道，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因此，绍兴博物馆坚持深化微信、微博和网站等自媒体建设，将新媒体利用引入博物馆科普教育网络。《线上绍博》主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网站等新媒体进行推送和宣传，为宣传博物馆展陈服务，为观众增加观展新形式，以此扩大博物馆科普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主要形式包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专题文章进行推送，以图片、文字辅助《线上绍博》视频，增加可看性，同时将此专题文章设为头条突出显示，增加点击量；在微博上播放视频，加入超话，且 @ 较有影响力的文博同行官微等，以增加流量与阅读量。目前《线上绍博》已获得两万多的点击浏览量，多次转发，其中不乏优秀的同行官微。

博物馆过去是“自上而下”的传统“宣传”，但在全媒体时代应被理解为是“自下而上”的“传播”，也就是观众通过网络等渠道获得感兴趣的文物历史信息后自发走入博物馆进一步观展。《线上绍博》内容丰富、制作精良，有较好的观看体验，通过崭新的展示手法让观众了解博物馆和藏品背后的故事，从而激发他们离开网络、走进博物馆的浓厚兴趣。同时，与绍兴博物馆展陈形成线上线下的合力，共同推动绍兴历史文化的普及与传播。

三、可推广借鉴的经验

《线上绍博》自推出以来，受到了业界的肯定与观众的好评，不少经验可在博物馆的线上展陈中借鉴与分享。第一，内容为王。对于博物馆来说，展陈内容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并不利于博物馆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博物馆需在线上展陈内容方面多下功夫，反复推敲、查阅资料、进行求证，确保文字内容的准确真实，尊重史实，同时延展展陈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体现文博行业的专业性与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第二，选择生动的展陈形式。有吸引力的博物馆新媒体传播作品不应该仅仅是讲解员单一地在镜头前进行简单的介绍，抑或是纯粹的文字图片堆砌，千篇一律的呈现形式略显枯燥无味，能够将讲解、视频、图片、音乐有机结合，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的作品为最佳。第三，确保

较高的制作水准。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日，观众面临众多选择，只有画面精致、逻辑清晰、内容生动的作品才能获得观众的青睐。这就要求制作新媒体视频时需精雕细琢：① 文字内容力求准确、语言生动。② 出镜讲解员业务能力较强，语音语气佳，亲和力强。③ 注重拍摄技巧、画面效果，尤其拍摄文物画面时，更要做到精致、重点突出，让人眼前一亮，同时拍摄前先画出分镜头脚本，提升拍摄效率与画面美感。④ 运用多种后期剪辑技巧，使影片更具逻辑性与连贯性。⑤ 注重后期包装，制作精美的标志性片头，吸人眼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文旅行业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博物馆传统展陈模式敲响了警钟。注重博物馆展陈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推陈出新，探索喜闻乐见的线上展陈新方式，方可化危机为机遇，迎来博物馆发展的新春天。

浅谈绍兴台门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马峰燕

台门是绍兴官宅、民居类建筑的基本形式。现存的台门文物多数是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遗存。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市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的台门共有14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0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点69处。近来，笔者对三年来绍兴台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做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一、工作开展的情况

台门文物是绍兴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绍兴文物部门多措并举，从保护修缮、检查评估、活化利用等方面对台门文物进行保护利用，确保台门文物的安全和价值发挥。

（一）加强保护，做好台门文物的守护人。一是逐步提升台门文物的保护级别。越城区将姚家埭帅府台门遗址、缪家桥状元台门、西街18号台门（刘宗周旧居）、冯亦摩故居、张中晓故居等台门公布为区文保点。诸暨市将宣中华故居公布为市文保点。二是完善台门文物的“四有”工作。嵊州市完成越剧之家等文保单位“四有档案”的编制工作，并补配了文物保护标志碑以及文物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标志牌。越城区和新昌县先后编制完成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图册。三是做好拆迁地块台门文物的保护工作。嵊州市对澄潭江防洪工程涉及的市级文物保护点苍岩基成台门实施了整体平移，对五昌台门照墙实施了吊装迁移保护。四是落实台门文物的修缮、消防和安防工程。越城、上虞、诸暨、嵊州等地陆续开展了鲍氏旧宅建筑群、钱氏大宅院、崇仁古建筑群、马剑古建筑群、回山古建筑群等保护修缮工程及有关消防、安防工程。五是逐级签订文物安全责任书。三年来，市政府与各区、县（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签订文物安全责任书，各区、县（市）政府与各乡镇、街道也签订了文物安全责任书，明确台门文物安全责任人，并落实了安全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越城区、柯桥区、嵊州市将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向文保点延伸，已完成各自辖区内全部文保点台门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挂牌。

（二）加强检查，做好台门文物的监护人。每年，全市文物行政、执法部门都会对全市各级文物开展文物安全检查、文物消防安全检查督导、文物双随机检查等检查巡查工作，其中台门文物是检查巡查的重点。市本级已经创立并实行文物安全检查评估制度，每年对各地包括台门文物在内的各类文物进行安全检查评估，及时将检查评估结果上报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并同时通报各地政府，督促各地加强文物安全工作。此外，柯桥区编制出台《绍兴市柯桥区文物保护工程

日常巡查管理办法(试行)》,为实施乡村文物资源振兴和加强文物修缮工程的日常监管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研究,做好台门文物利用的激活人。绍兴市人民政府正式出台《绍兴市名人故居激活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要求各地在三年时间内,对全市107处名人故居(绝大多数是台门文物)落实保护利用措施。绍兴市本级文物部门开展全市147处革命文物资源保护利用调研工作,出版了《稽山红遍——绍兴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图集》,对革命文物中具备开放利用条件的台门文物进行调查研究。诸暨市开展全市各级文保单位(点)(含台门文物)数据归集工作,为台门文物利用打好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绍兴台门数量众多,分布分散,管理困难,加之当前城乡建设活动不断深入,台门资源面临枯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权复杂,保护工作不易推进。绍兴台门的产权问题往往影响着其保护修缮工作。从文物保护方面来说,目前台门在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之前,须得到产权人的同意。国有、集体产权的台门比较容易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点),而私有产权(或多户共住)的台门(通常其所有权人面临生活困难,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包括大额补偿和产权置换等问题,非文物部门能够独自满足或协调),往往难以公布为文保单位,进而实现有效保护。

二是拆迁频繁,消失速度加快。近年来,绍兴城乡建设活动频繁,特别是2016年以来,绍兴有许多村庄被拆迁,一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村庄,如则水牌、阮社、三江村等已拆平。拆迁之初,有关部门在规划、地块建设方案研究过程中,往往不注重优秀传统文化实物载体的保护利用,针对台门等特色文化资源也没有硬性的保护约束机制(列入文保单位的台门除外)。位于拆迁地块的老台门往往很难原址保留,即便是原址保留了,也因无人使用和维护而很快坍塌。台门作为绍兴富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形态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消失。预计未来十年,人们只能看到列入文物和历史建筑的台门。

三是空关较多,安全情况堪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台门里的居民搬离成为常态。台门空关或者棚户化成为老台门最后的面貌。如鉴湖街道筠溪村、斗门街道斗门村以及绍兴城内的上大路、下大路沿线等历史地段,都存在台门空关和棚户化的现象,不利于台门的保护利用。

四是经费不足,维修经常滞后。目前全市每年用于台门文物修缮的经费大约为1000万元,且主要侧重于保护级别较高的文保单位。保护级别较低的台门文物往往好多年没有修缮,保存状况不太理想。至于没有列入文物的老台门,几乎是处于失修状态。

五是条件限制,利用方式单一。绍兴老台门的房屋空间通常不大,作为民居建筑是适合的,如作为陈列展馆则显得空间狭窄。目前除了名人故居台门建筑是作为陈列展馆开放利用,以及绍兴古城陈家台门(下大路)、泰来裳当店、大越小院等少数台门作为营业场所之外,多数台门还是作为民居居住使用。因此,台门活化利用的方式还需要研究拓展。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是加强地方立法,保护台门资源。参照杭州市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有关规定,将台门保护利用举措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建议全市范围内建筑年龄50年以上的台门建筑

一律不得拆除，从法律法规的层面限制拆迁对台门保护利用的影响。

二是加大资金保障，促进产权置换。开辟多种途径筹措资金，保障台门的修缮利用，并研究出台“绍兴台门修缮利用导则”，对其修缮利用加以引导。同时，探究台门的私有产权人通过产权置换改善生活的有效途径，鼓励通过台门认购的方式，更换台门的所有权人，使台门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在台门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探索台门所有权人对台门开放利用经营进行入股，并分红经营所得，以激励所有权人对台门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三是加深调查研究，拓展利用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摸清绍兴台门文物资源，分析资源特点，充分研究展示台门里的故事、民俗和文化，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保护利用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同时，广泛吸收借鉴先进地区的民居建筑保护利用经验，将之运用于绍兴台门保护利用工作的实践。

浅述“绍锁”

人保财险绍兴柯桥支公司　胡关健

摘　要：古铜锁(金属簧片构造锁)起源于汉，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用锁。数千年来，锁具的外观虽然有所变化，但内部构造依然如“古”，直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西方栓锁(弹子锁)的广泛使用，古铜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古铜锁蕴含的文化元素，仍然值得今人回味。

关键词：缘起　分类　广锁　锁匙孔　锁匙　簧片数

明代张自烈《正字通》云：“钥以闭户，匙以启钥。”闭户，即关也。再，东汉蔡邕《月令章句》曰：“键，关牡也。”吾名关健，注定与锁有缘，自幼接触锁具，常独自研玩。近年广搜铜锁，玩而兼藏，且愈陷愈深，常常乐在其中，浑然忘我，大有“不务正业”之感。兹将研究心得，秉笔直书，以飨读者，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锁，是古今中外广泛使用的安保用具。其间，要数中国的古铜锁使用历史悠久，而且与传统文化渊源深厚。

古铜锁分簧片构造锁与文字组合锁两大类。簧片构造锁又分为广锁、花旗锁、刑具锁和首饰锁。而广锁，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年间(1875—1908)多产于绍兴，俗称“绍锁”，多为铜质，正面呈“凹”字形，端面由三角形与长方形组合而成。

笔者与所藏古铜锁

各种形制的绍锁

明代绍锁

明末清初绍锁

明代以前的广锁，端面呈长圆筒形；明末清初时期的广锁，端面上部呈三角形，下部呈斜方形；而清代的广锁，端面上部与前期相同，下部呈正方形。此乃识别古铜锁年代的一般规律。

“广锁者，横式锁具也。”常用于锁门、锁柜、锁箱等。据《十三经注疏·〈周礼〉疏》引马融云“东西为广，南北为轮”，《辞源》解释为“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广锁由此而得名。

有资料云：广锁（绍锁）“清光绪年间多产于绍兴”。关于此事，笔者寻寻觅觅数载，仍难找到直接、确切而翔实的史料记载。反复查阅资料，继以精斟细酌，究其依据，归纳有四。

一是据《水经注》载：“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已是列国之一的越国国都，是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治基础浓厚。

二是据《越绝书·外传记》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可以推定古时候已在绍兴平水一带开采铜矿。古越大地拥有丰富的铜、金、锡、铁等矿产资源，为冶金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平水铜矿、何山金矿、漓渚铁矿等的相继发现、创立、开采，也充分佐证了绍兴矿产资源的丰富。

三是在越王句践时期，越国的青铜器制造业已至鼎盛，尤其是青铜剑和戈的制作，曾达到全国技术的尖峰。“上灶”“中灶”“下灶”“日铸岭”等地名就是历史留下的印记。那时的冶炼，是在铜的原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人称这种合金为“青铜”。青铜技术的进步支撑了铜锁制造的技术基础。

四是据《绍兴县志·商业》载：“清代，打铁铺、白铁作坊、铜锡店以前店后场的形式制售铁钉、铜锁、泥刀、斧头等小五金商品……民国三十八年(1949)，城区有铜锡店 40 家，名号有陆永兴、章泉记、祥生顺、正隆、惠记等。”亦可间接说明当时绍锁的生产规模。后来的民间传统铜匠，则是铜器的加工师傅，他们用“小铜炉、风箱和焊枪”等设备，加工铜的生活用品（包括铜锁）。还有一部分铜匠，往往挑上铜匠担，担上装着半尺长、寸余宽、半圆形铜片十余条，挑担走路时铜片摇摆发出“叮呔叮呔”的撞击声，以招徕顾客。铜匠们串村入户，以修锁和配匙为主，上门服务。

一言以蔽之，当时广锁制造的政治、物质、技术和服务基

镌刻图案的绍锁

础是完善的，具备规模生产条件，广锁成为绍锁（因多产于绍兴）是有可能的。

笔者收集广锁十余载，样品万有余，细研究之，广锁的外形虽然大同小异，可是其锁匙孔形状、锁匙（头）形状、簧片数的多少等却大相径庭，可谓广锁之精髓。

锁匙孔，其复杂程度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相关，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再者，制锁作坊皆按官府规定行事，不能擅为。位于锁体端面锁匙孔的形状，大部分为文字形式，如“一上下土工士山六王正大口圆旦古而吉尚喜寿”等。孔状为“一”字者，是庶民百姓所使用的锁具；为“士”字者，是读书人、士大夫所使用的锁具；为“吉”字者，是达官贵人使用的锁具；“喜”字用于婚嫁；“寿”字意寓祈求健康、长寿。而帝王、将相、太子、王公、皇妃、公主等，则另有标志。

锁匙，有的制作精美，不但富有艺术色彩，形态万千，更是财富与权威的象征。锁的开启因锁匙的不同而奥妙无穷。如“回形匙开四簧机关锁”，假若已知晓锁孔的位置，手执锁匙，未经半个来钟头的琢磨，一般人亦是束手无策的。再如单匙开“苏秦背剑二开锁”、双匙开“暗孔门四开锁”，未经旁人告知方法，一般人连锁匙孔都很难找到。此外，当时的锁匙也可用来区别已婚和未婚女人。所谓“出门带锁匙者”，指已婚女子；而“出门未带锁匙者”，则指未婚女子。当然，锁匙上也少不了一个绣花精美的锁匙套。

清代绍锁（一）

清代绍锁（二）

暗孔门四开锁

簧片（分离弹簧片）数，是笔者最感兴趣之处。簧片数的多少，决定了锁具开启的难易程度。簧片数越多，越不易开启，其防盗功能也越强。得益于自己机械专业的工科知识，任何古铜锁，吾皆能信手开启，即使无匙亦可借助其他手段开锁。至今，已收集到一簧至八簧锁若干。广锁者，二、三、四簧片的锁居多；一、七、八簧片的锁凤毛麟角；八簧以上者，尚未获。

古铜锁是承载民俗文化的瑰宝，反映当时的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然而鲜有文献著述。历代以来，锁具的制作，皆由地位卑微的锁匠为之，虽然不乏巧工与奇品，但几乎都名不见经传。存世精品实物中，可见“黄五胜”“正五胜”“玖胜”“李怡兴”“全兴”等制锁匠名号，其中也只有“全兴”能在《湖北通志》中找到，字号“周全兴”，为湖北天门岳口熟铜巧锁之工匠。

4

文物鉴赏

WENWU JIANSHANG

绍兴博物馆再添镇馆重器——越王州句剑

绍兴博物馆　何志方

2021 年，绍兴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即战国时期的越王州句青铜剑。至此，绍兴博物馆共收藏三代越王的 6 把越王铭文剑，越王剑系列也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越王州句剑

越王州句剑，全长 52.3 厘米，身宽 4.6 厘米，柄长 8.7 厘米，首径 4.3 厘米。剑身挺拔，纵轴起脊，剑从平缓斜倾于两侧，剑刃分明，双刃从剑格处始延至剑锋中腰略作弧收，然后向前汇聚成锋尖，剑身横截面呈菱形状，锋刃犀利，线条坚挺流畅。剑格作倒“凹”字形，正面饰变体兽面纹，纹饰之间嵌铸鸟虫书铭文，右侧为“戉(越)州句”，左侧为“王州句”；背面只有铭文“自乍(作)用佥(剑)、自乍(作)用佥(剑)”，铭文清晰秀美，底部均衬有细密的斜线编织地纹。剑格凹口植圆柱形直柄，剑柄上有两道凸箍，箍面饰简约的兽面纹和斜线编织地纹。剑首似圆盘状，剑首底面中间为喇叭状核心圈，外周铸十余道高低不等的同心圆圈，圈间饰芒状地纹。剑本体为青铜质地，呈灰黑色，除剑格上镶嵌的琉璃或绿松石和剑柄上的缠缑缺失外，其他保存基本完好。

州句，也称翁、朱句，越王不寿之子，越王句践曾孙(一说为孙)。公元前 448 年至公元前 412 年在越王位。越王州句处在越国势力最强盛时期，他继承了曾祖父句践的霸业和开拓精神，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王。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剑格正面

剑格背面

剑首

《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墨子》等史料记载，他在位的37年间，先后灭滕（滕国，今山东滕州一带）、灭郯（郯国，今山东郯城北）、战楚（楚国，今湖北、湖南一带）、削莒（莒国，今山东莒县），武功显赫。目前发现的历代越王剑中，以越王州句的铭文剑最多，证明这位君王英勇好武，越国国势强盛的一面。

越王剑代表了越国的历史、文化和科技，又凝聚着越民族精神，绍兴博物馆把历代越王剑系列作为镇馆之宝理所当然。历年来，绍兴博物馆一直在努力收集越王剑线索，尽力将流落在民间的越王剑征集到博物馆，进行妥善保护并展示给广大观众。绍兴博物馆的第一把越王剑是2008年征集的“越王不光剑”，2013年征集“越王者旨於睗剑”，2015年征集“越王嗣旨不光剑”，2017年征集“越王者旨不光剑”，2018年征集不同款式的“越王者旨於睗剑”，此“越王州句剑”为历代越王剑系列填补了一代空白，值得庆幸。但也有令人遗憾的事。前不久，我们与一把“越王之子句践剑”失之交臂。历代越王剑中句践剑极少发现，目前国内只有湖北省博物馆有一把，另外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有一把。句践是最重要的一代越王，他的用剑自然也是重量级的文物。我们曾花了三年多时间追索相关信息，当联系到这把“越王之子句践剑”的持有人时，心情十分激动，有关专家鉴定后认为句践剑非常罕见、难得，建议我们征集，希望把它留在越国故地，我们努力向有关部门反映、呼吁，最终因征集费未能落实而流失。作为绍兴文博人，要为讲好绍兴故事积累珍贵的历史见证物，让那些历尽沧桑的文物得到应有的保护，继续做好王者之剑这篇文章。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馆藏越窑青瓷墓志罐赏析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　陈少锋

摘　要：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所藏青瓷墓志罐是越窑青瓷中难得一见的珍品，器形完好，志文清晰。本文拟从墓志罐的制作工艺，结合志文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传递的生活价值观，谈谈笔者对该器价值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越窑　墓志罐　税制　价值观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越窑青瓷墓志罐烧制于唐咸通五年(864)，罐体方形，底座为浅盘形，五曲花口，圈足。通体施青釉，高27厘米，口径12厘米。志文二十一行，三百一十九字，有界栏，四面阴刻之文，自右至左，刻写相当工整，书法刚劲有力，墓主生卒年代明确，内容丰富。(图1—4)兹录全文如下：

大唐渭州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祖讳洗，公讳道，府君讳少文。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府君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栖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降生于公，神

图1

图2

图3

图4

爽气和，调逸风雅。恂恂乡党，怡怡弟兄。唯好林园，靡采名利，能以周终，蓄不继富，府君之德焉。时咸通四年遘疾，十一月十八日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一。至五年十二月七日葬于千金乡高平里铜山南源，秦山北面之礼也。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轨范。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有长子讳约儒，二子伯郊，三子名叔齐，四子名叔启。陵谷不据，变易岂尝，见请斯文，铭志于石，曰：

将知禀时，间生奇玮。嗟乎明哲，俄从逝水。人有生灭，物有盛衰。芳香不泯，踪迹渐遗。林园养性，高尚不视。死乖人世，终掩泉扃。于岗之中，岩岫回迳。

一、观器研物——看唐代制瓷工艺

唐中期以后，越窑迎来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大量新器型出现，造型丰富多样，胎釉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并出现了称之为“秘色瓷”的越窑产品。这一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主要器型有碗、盘、碟、盏、杯、壶、罐、盆、钵、盒、水盂、灯盏、碾轮、盂、海棠杯、熏、茶匙、枕、穿带扁壶、净瓶、灯、盘口壶(罂)等。从产品的种类看，当时烧制的瓷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因此是大批量生产的。

瓷墓志罐的主要使用年代是在九世纪初到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①]，这一时期也是越窑的兴盛期。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形墓志罐烧制年代为唐开成三年(838)，本馆所藏墓志罐烧制于 864 年，属于出土墓志罐最多的时期。大多数瓷墓志罐是专门制作的随葬明器，因为不属于大批量生产，瓷墓志罐的造型多变，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两件。

本馆所藏墓志罐，罐体上口呈四方形，底座为浅盘形，罐体与底座连接部分为圆形，因此罐体的制作应当是在拉坯成型的基础上，经敲打制作而呈方体，罐体与底座应当是分段制作各自成型后通过胎体黏结，最后施釉烧制而成的。

该罐器型少见，制作规整，胎质细腻坚致，施釉均匀，釉呈青色，釉层丰腴，具有玉质感。根据越窑遗址的考古研究，这个时期一项重要的瓷器烧制技术是使用匣钵装烧。匣钵装烧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装烧量，同时使器物不再受明火烧烤，受温更加均匀，免受落砂之伤，釉面更加莹润。

烧制过程中，釉料在高温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当还原不充分时釉色泛黄，还原充分则泛绿。本馆所藏之罐，通体青绿，可以说明烧制过程中还原是较为充分的，颇为难得。

二、从渭州到明州——看唐代的税制改革

墓志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大唐渭州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祖讳洗 / 公讳道 / 府君讳少文 / 望贵著族 / 世代名家 / 因居税苗编籍 / 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短短四十六字，却道尽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生活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

墓志主人李少文卒于咸通四年，即公元 863 年，此时距“安史之乱”的平定恰好是 100 年。此公享年 81 岁，原籍渭州陇西，属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用现代白话文讲，就是根据税法规定，编入居住地户籍，现在是明州慈溪县人。

因税入籍，这涉及中唐时期一项重要的税收制度改革，即两税法的颁布。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正式下诏推行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

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而均征之……”“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渭州陇西人士李府君入籍明州慈溪。

唐初的税制称为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但是由于土地兼并，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十分困难。“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尖锐。为了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负担，唐朝统治者对税制进行了改革。经过代宗时期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唐德宗终于在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两税法。

两税法中有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纳税主体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居地登入户籍纳税。“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这些均体现了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两税法中已经有了公平纳税的理念。

现代财政的预算制度，其本质就是量出为入。“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两税法可以说是开我国国家预算制度的先河。“租、庸、杂徭悉省”，仅征“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则是开我国简化税种，简化缴费程序，以税改费的先河。此外，两税法还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

两税法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施，中间历经演变，但一年两税(夏、秋两季征税)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才被废止，约实行了800年之久，它成为中唐以后中国赋税制度的中枢，为随后宋元明清王朝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墓志主人生活年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今人读志文难免生疑，引导今人疑而探究，这也是文物的欣赏价值所在。

三、唯好林园，靡采名利——看儒家的养生之道

志文记载，李府君“春秋八十有一”，这在当时已是长寿之人了。俗语“人生七十古来稀”。从志文可以看出，这与墓主人“唯好林园”“靡采名利”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古人以“能以周终”来言其高寿。

八十一年里，墓主人生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世代名家，望贵著族，却“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栖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可见其修身甚严，生活中厉行节约勤俭，不求居住于高堂华屋，但求有凌云之志。“恂恂乡党，怡怡兄弟”，对邻里恭谨温顺，与兄弟和睦相处。此府君与人相处的态度，处处散发出儒者之风。“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轨范。”可见其娶妻贤淑，家庭生活和美。“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可见其尊师重教。

墓主人是一个节俭、温和的平凡人物，是一个被历史和尘土轻轻一拂就会掩埋得干干净净的小人物。因为他太普通、太平凡了，除了他的家人，谁也不会记得他。也许时间久了，家人也会把他淡忘，随之对其仅有的记忆也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随着墓志罐的重见天日，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再次被现代人认识。

“德者寿”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儒

家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养生中的作用，主张突出个人养德的主动性，来达到道德自我完善的境界，并认为这是人们得以长寿的基本要素。“德者寿”的原因，儒家有“天佑说”“情志说”等看法，该志文应该是“情志说”的演绎。读此墓志，我们看不到墓主人世俗意义上的显赫成就，但是主人公的高寿，鉴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可以看成是他战胜当时生存困境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从墓志撰写者的角度来看，离不开墓主人的优良品性。

一个墓志罐随着主人的下葬深埋地下千年，当它因为某些原因重见天日时，也为人们带来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文物赏析，是今人与文物的对话。本馆所藏青瓷墓志罐是越窑青瓷技艺的佳品，其上所撰志文，字里行间又流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儒家思想的精华，从中还可以窥见一段社会变迁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墓志的发展和越窑青瓷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① 历祖浩：《越窑瓷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晋代动物造型瓷灯具赏析

杭州博物馆　许丹阳

灯具自古就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材质多样，造型丰富。同时，灯具受社会经济的发展，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提升，世俗审美观念的转变等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可以说，灯具不仅具有实用性，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反映出造物之美。

我国的灯具目前普遍认为是由陶器豆演变而来的，所见的最早实物是战国时期的瓦豆灯，陶制，铜质灯具也出现于这一时期。东汉晚期诞生了成熟的瓷器，瓷器与灯具的结合顺势而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瓷质灯具成为主流，在民间逐步普及，并流行将瓷器的外形塑造成动物形象。总体上看，陶瓷灯具的应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可透过其表象来研究其所隐含的制瓷工艺技术和时代风尚。杭州博物馆“最忆是杭州”杭州通史陈列展出数件晋代越窑瓷灯具，在此选取三件展开介绍。这三件瓷灯具均为动物造型，形象生动写实，不仅体现了当时越窑制瓷的精湛技术，也映射出晋代社会风尚和世俗的审美特征。

西晋越窑青釉狮形辟邪瓷烛台（图 1），杭州半山钢铁厂西晋太康二年（281）纪年墓出土[①]。高 11.9 厘米，长 16.5 厘米，宽 8.6 厘米。狮子呈俯卧仰首状，双耳竖立，双目圆睁，背部有一管状竖孔，用作插烛，狮子胸前有堆贴卷毛纹饰，尾巴下垂贴于后腿间，腹部两侧刻划有双翅。胎质坚硬，胎体厚重。通体施青釉，釉面均匀光亮，灰白胎，底部露胎，器体表面有细碎开片。整体造型丰满敦实，面部表情活泼有趣，集堆贴、刻划等工艺于一身。

图 1　西晋越窑青釉狮形辟邪瓷烛台

西晋越窑青釉熊形瓷灯座（图 2），高 11.8 厘米，口径 5.6 厘米，底径 8.6 厘米。整体呈柱状，顶部敞口，通体空心，腹部造型为一蹲状熊，双耳竖立，左前爪握一果实，右前爪搭在右腿上，面部表情生动。两腮下方和下腹部有圆孔，熊身饰有不规则的连珠纹。通体施青釉，釉面丰润光亮。器物造型

图 2　西晋越窑青釉熊形瓷灯座

精美，动物形态惟妙惟肖，显得顽皮可爱，憨态可掬。

晋越窑青釉鸡形瓷盏（图 3），杭州半山 11 号墩出土。高 5.9 厘米，腹径 10.4 厘米，底径 5.2 厘米。口内敛，浅腹，平底，盏的口沿一端塑一鸟首，圆头尖喙，对称的一端塑一尾巴，尾巴上翘似扇形，内部中心处也塑一鸟首，器体外腹部饰有网格纹。胎体坚硬，施釉，釉层均匀，呈青灰色。整体造型似鸡，小巧精致。

图 3　晋越窑青釉鸡形瓷盏

从这三件瓷灯具的造型来看，它们均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塑造原型，将动物形象与日用器皿完美结合，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动物形灯具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有象形灯、雁足灯等，但材质为铜质。两汉时期，动物形灯具的种类有所增加，有牛、羊、鱼形灯等。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凭借自身造型更为美观、原材料分布范围广泛、制作手法方便等优势，逐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器具，铜质灯具便走向没落，瓷质灯具得到推广，并以动物造型为主流，这也是当时制瓷的风尚特征。动物形瓷灯具在多地有所发现，常见羊形、熊形、狮形等造型，如江宁张家山西晋墓出土的狮形烛台（图 4）[②]、镇江东晋晋陵罗城城内出土的青瓷羊形烛台（图 5）[③]、安吉天子岗汉晋墓出土的人骑羊形烛台（图 6）[④]、南京将军山西晋墓出土的青瓷辟邪形烛台（图 7）[⑤]等。灯具形式主要为灯盏和烛台，灯盏需配合灯捻来使用。杭州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鸡形盏属于搭捻式，使用时将灯捻的一端插入灯油，另一端搭在盏内立柱上，引燃灯捻用于照明。而烛台则是将蜡烛直接插入圆孔状管套内使用，有单管烛台和多管烛台之分，动物形烛台多为单管。除灯具被制作成动物造型外，还

图 4　张家山西晋墓狮形烛台

图 5　镇江东晋晋陵罗城青瓷羊形烛台

图 6　天子岗汉晋墓人骑羊形烛台

图 7　将军山西晋墓青瓷辟邪形烛台

有蛙形水盂、鸡首壶、虎子等动物形器皿，堆塑罐的上部也常堆塑有熊、鸟、狮子、狗等各类动物。这些动物造型瓷器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自然条件较为舒适，环境利于动物生存，古人将可见到的动物形象融入制瓷，将日用器具做成了工艺品。

这些动物形象被应用于制瓷，除具有美观艺术性外，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某种程度上也是古人的精神寄托。狮子是西汉时期的外来物种，因其高大威猛的形象，被奉为瑞兽、神兽，认为狮子有驱除邪恶、招财纳福的神力，而一些有双翼的狮子也被称为辟邪，是祥瑞的象征。熊代表力量和勇猛，《诗经·小雅》的《斯干》中有“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的诗句，认为梦到熊是生男的预兆，梦到蛇是生女的预兆。熊被视为雄性的象征，被赋予阳刚、勇敢的品格。鸡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动物，“鸡”与“吉”谐音，寓意吉祥如意、大吉大利，并且鸡的繁殖能力强，也象征着多子多孙。可见，这些动物不只是自然界的生灵，将它们运用于瓷器制作，更是身处乱世的古人对生活的一种祈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政权更迭，南北地区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北方地区的混战动荡较南方地区更为频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人口也随之流失。而南方地区的战乱相对较少，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大量的北方流民南下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杭州在两晋时期为钱唐县，属吴郡，靠近此时越窑烧造的中心地上虞一带，在江南地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制瓷业快速发展，窑场数量也比东汉时期大幅度增加，墓葬中多有越窑青瓷出土。这三件动物形瓷灯具真实地反映了晋代越窑制瓷的精湛工艺，技艺高超的工匠们将制瓷技艺与动物形象结合，烧造出一件件形态饱满而又富有神韵的瓷器。在那战争纷乱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流离失所，他们将期盼家国安定、生活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等美好愿望寄托于瓷器，从而造就了独特的世俗审美情趣。

注释：

① 张玉兰：《杭州半山西晋太康二年墓》，《杭州文博》2007 年第 2 期。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 年第 10 期。

③ 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 年第 5 期。

④ 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 年第 6 期。

⑤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将军山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3 期。

绍兴博物馆藏明代黄景昉书法赏析

绍兴市兰亭文化公司　朱文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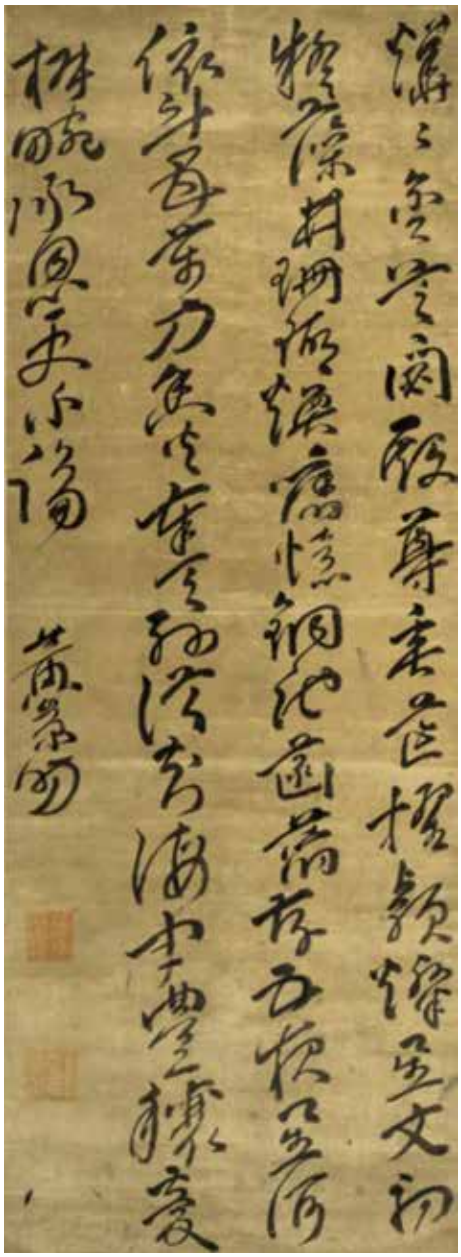


图1　黄景昉行草轴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文化多元，作为文化艺术的书法也最为活跃。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在继承宋、元以来的帖学传统上有所发展，涌现出不少别具一格的书法名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张瑞图、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等。张瑞图(1570—1641)，福建晋江人，其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多方侧，笔势迅猛，凌厉劲峭，结体收缩紧密，字形险峻雄奇。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其书用笔苍莽倔强，结体欹侧平扁，笔法刚劲有力，雄奇硬朗。张瑞图、黄道周是明代书风中有扎实功底但不愿守古而极富反叛精神的代表。

绍兴博物馆藏有一件明末清初黄景昉的行草轴，作品画心纵135厘米，横48.5厘米，绫本立轴，画面基本完好。

释文：

烨烨金首闷殿尊，垂范擢颖灿星文。

初疑藻井珊瑚焕，旧忆铜池菡萏存。

五夜星落依斗母，万刀鱼火奉天孙。

从知海尹丰穰庆，椒畹承恩更不论。

卷尾款落“黄景昉”。钤白文方印“黄景昉印”、朱文方印“东崖居士”。

黄景昉(1596—1662)，福建晋江人，居泉州，字太稚，号东崖。《泉州府志》赞他“好古能文，出于天赋”。七岁即作《鸿雁麋鹿》时艺，“博瞻陆离，斐然成章”。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十五年(1642)，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十六年(1643)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清顺治三年(1646)任唐王政权礼部尚书。

康熙元年(1662),景昉家居十余年后卒。一生著述宏富,有《馆阁旧事》《国史唯疑》《经史要论》《双声叠韵谱》《古今明堂记》《东崖诗稿》《鹿鸠咏》《燕楚游咏》《读诸家诗评》等。黄景昉与张瑞图、黄道周均为晚明时期福建籍宰相。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卷十三·黄景昉传》中称“人服其胆”,意即当时人们对竭力保护黄道周、刘宗周等忠良的黄景昉十分心服。

从此件书作来看,应为黄景昉自作诗,主要描述了对于明清转折之际产生的多样化的时代潮流之感慨。其书法结体紧凑,吸收了章草的元素并得欧、褚遗法,笔法连贯,气势迅捷,与同期书家书风相近。沈语冰在《历代名帖风格赏评》中说道:“(晚明书风)由徐渭发其端,张瑞图导其流,黄道周、倪元璐扬其波,王铎、傅山助其澜,终于成为帖字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对清代乃至近现代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晚明的书法变革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并探索着创新求变,而黄景昉身处其时,未必不受那个时期美学思潮的影响。

“宫保宰相”黄景昉身历明清两朝,山川如故,梦若隔尘。他可能至死也未能从亡国的悲凄情绪中解脱出来。一度贵为阁相,转眼却成亡国遗老,这份苦涩滋味又岂是旁人所能想象的。

图2　位于晋江东石镇檗谷村黄氏宗祠内的“宫保宰相”匾额

何周福抗战时期笔记一篇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申伊欣　何　旷　张　依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柯桥区博物馆在6—8月举办了“红色百年　柯桥印记——庆祝建党100周年柯桥区党史回眸”展览，以史为纲，以物相佐，用一帧帧精美的图版和一件件朴实的展品，真实而生动地展现柯桥这片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巨大成就。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梳理馆藏革命文物，获知不少文物背后的故事。现释读离休干部何周福同志革命时代笔记本内容一篇(1945年“七七”纪念日)，以缅怀革命先辈并牢记革命精神。

何周福，1930年11月出生于浙江诸暨。1944年11月参加革命，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任司号员。1945年，随部队北撤，编入华野某连任司号员，后任某师司号班号长、某军教导团号长。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翌年4月，任某营机炮连副指导员。1953年12月，到某步兵学校学习。1956年3月，分配到某营任副政治教导员、代教导员。1963年3月转业，分配至绍兴县供销社日用品公司任副经理。其间，抽调到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围海指挥部工作。再任海涂供销社副主任，后调绍兴县日用品公司工作。1980年11月离休，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历经抗日游击战、鲁西南战役、济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斗，先后参加战斗近40次，数次负伤，右手致残。曾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释读内容如下：

本报讯：我军某部，为纪念一年来壮烈牺牲的64位同志特于15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从去年“七七”到今年“七七”，

何周福笔记本封面及内文一篇(何周福捐赠)

该卫队转战金萧、四明地区，也参加了许岙讨田战役。在一年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八位干部、56位战士，他们都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大会在上午举行，会场正中挂着“精神不死”四个大字，两边的联语是：“死葬在历史大关节里永垂不朽，生活着一刻求解放中视死如归。”会场四周挂满了各机关各团体的挽联，联语亦悲亦壮，八寸左右。

大会在军号并爆竹声中开始，首由主席□□□宣布了开会的意义。接着郑股长、周教导员、程教导员相继报告64位为人民事业而光荣牺牲的先烈的历史和他们的英勇的功绩。继由钟政委讲话，他首先指出，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同志，是值得每一个革命战士、每一个被压迫的人民来追悼的，没有图个人享乐，图个人好处而已为真理牺牲的同志，是无上光荣的，除了革命战士，天敌日本鬼子、和平军以及反动派，他们都是企图欺压人民、图个人享乐、谋个人好处，他们的死是不光荣的，是遗臭万年的。钟政委更指出我们的同志在敌伪特务进攻下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使他们[的]阴谋并企图彻底被粉碎，使得浙东军民，从危机转入到胜利，我们纪念牺牲的同志，首先要认清楚他们所留下未完成的任务，已落在我们今天全体来开会同志们的身上。我们不需要流眼泪，坚决为他们复仇。第二，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的精神，学习他们为国家民族、为人民、为真理而艰苦斗争的精神。第三，我们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实际斗争中来纪念他们。

张主任继钟政委讲话，他首先叙述和他比较熟悉的戈扬、毛仲清、朱□朗诸同志的进步，并善意地指出他们的缺点，说明他们的牺牲，使我们获得了军事技术胜利和地形地物不畅的血的经验教训。接着张主任要求每个到会的同志，要注意和做到下面几件事，第一，目前卫队中有许多新来参军的□，应该团结、帮助、教育和培养他们，使他们变成老□□一样；第二，我们对新地区的群众纪律更需特别注意；第三，秋收来了，我们要准备保卫秋收，来打击敌寇抢粮，保证人民有饭吃；第四，干部加紧学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最后张主任亦同意钟政委的号召说：“以实际行动来安慰牺牲的同志。”大会至此在严肃的气氛中宣读祭文，唱挽歌，献花。最后在雄壮的军歌声中散会。（《新浙东报》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第180期）

绍兴古纤道创建修缮功勋人物考述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周燕儿

摘　要：绍兴古纤道是古代以行舟拉纤为主要功能的通道，沿浙东运河建造，全长约100千米，是运河的重要辅助设施。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托，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佐证，对唐至民国时期，为柯桥区段古纤道创始、改建、修缮、保护建功立业的15位代表性人物作一考述。

关键词：古纤道　柯桥　创建　修缮　人物

绍兴古纤道又称运道塘、新堤、官塘、纤塘路等，依浙东运河而建，是古代行船背纤的重要通道，同时兼行旅和船只避风等功能。唐代创建，明代全面改用石砌，绵亘约100千米，尤以柯桥区柯桥街道上谢桥至钱清街道板桥段保存最为完好且最具代表性(图1)。1988年1月，该段古纤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之浙东运河遗产点。历史上，创建、修缮古纤道者，既有贤守名牧，又有乡宦缙绅，还有僧尼平民和职能部门。现钩稽正史、方志、谱牒及其他文献，佐以实地调查资料，将涉及柯桥区段相关功勋人物考述如下，以志纪念。

图1　古纤道

一、孟简

山阴，……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

——《新唐书》(图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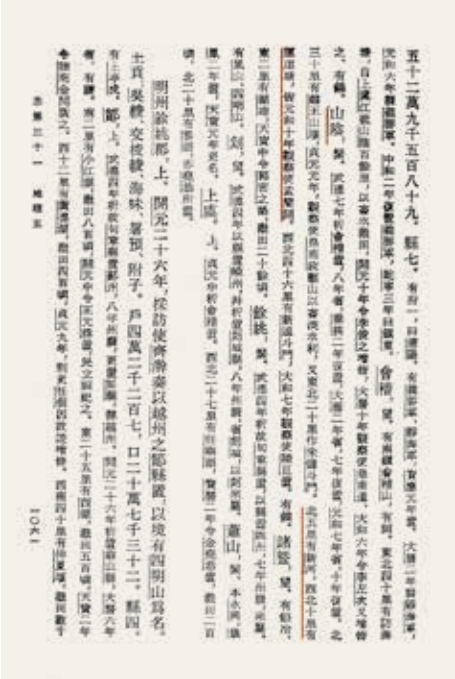


图 2 《新唐书》中有关孟简创建古纤道记载

孟简，字几道，唐德州平昌（今山东德平）人。自幼勤学苦练，惜时如金。唐贞元七年(791)前后进士及第，又连登博学宏词科。贞元九年(793)，任浙东观察使皇甫政从事。累迁仓部员外郎。元和四年(809)，官谏议大夫。以论事忤旨，出为常州刺史。疏浚泰伯渎和孟渎，灌溉沃壤四千余顷。元和九年(814)九月，以给事中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驻山阴。任上，凿新河、筑运道塘、建新泾斗门，对越中水利多所建树。元和十二年(817)，返京任户部侍郎。唐穆宗即位，被贬吉州司马。长庆元年(821)，量移睦州刺史。长庆二年(822)，复授常州刺史。不久，入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是年十二月卒。精佛典。元和六年(811)，曾受诏至醴泉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生性“俊拔尚义”[2]，常抚恤朋友孤儿，一时名士如柳宗元、韩愈等，都乐于与之交往。工诗，驰名江、淮间。《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共收录其诗 9 首。其中《谒禹庙》诗，即写于越州。又善书法。元和十一年(816)八月，行书《唐经禹庙诗》，宋赵明诚《金石录》有载。

运道塘是古纤道唐代之名。孟简创建纤道，是浙东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南宋《嘉泰会稽志》亦有相似记载：“运道塘在（山阴）县西一十里，唐地里志云：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筑。”[3] 当时，越州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出产的绫罗绢纱、青瓷、纸笔等，不仅畅销大江南北，而且还被列为朝廷的贡品，由此浙东运河的航运地位日渐突出。负重之舟行驶河中，顺风时可借助风帆提增行速，但无风或逆行时则行速滞缓。孟简莅任后，为改善航运条件，便在越州城西沿运河南侧筑起一条以行舟背纤为主要功能的土堤型纤道。尽管这条纤道用土方堆筑、夯实、硬化，属古纤道初级阶段的形式，存在着易被水流吞噬、雨天路途泥泞等缺点，但瑕不掩瑜，它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纤道，对航运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

二、汪纲

新堤在府城之西门，距西兴逾百里，塘堤废坏久矣。外为牵夫蹂践，内为田家侵掘，混为泥涂，往来艰阻。……嘉定十四年，郡守汪纲增筑之，徒行无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绋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储积，其利已博矣。

——南宋宝庆《会稽续志》（图 3）[4]

汪纲，字仲举，南宋徽州黟县（今属安徽）人。以祖荫出仕。初知诸暨、萧山等县，后提点浙东刑狱，均取得优异政绩。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知绍兴府。刚到任，即访得浙东运河萧山西兴至山阴钱清一带被泥沙淤塞，深度仅二三尺，舟楫往来十分困难。他便奏请朝廷批准，采取上拨和下筹相结合的方式，耗资一万三千贯，对该段运河进行全面疏浚。又于西兴堰上建江口闸，以拒潮蓄水。从此，“河流通济，舟楫无阻”[5]。嘉定十六年(1223)，重修绍兴府城各城门。城周长二十四里，有陆名五所，水名四所。并疏浚城内河道，使通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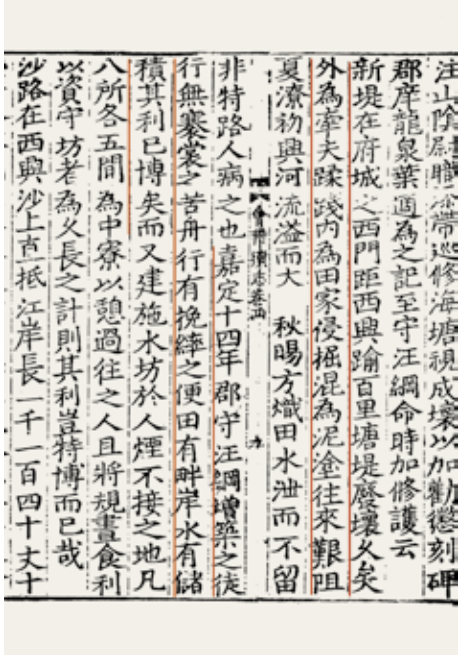

注山陰縣丞帶巡修海塘視成壞以加勸懲刻碑
郡庠龍泉葉適為之記至守汪綱命時加修護云
新堤在府城之西門距西興踰百里塘堤廢壞久矣
外為牽夫蹂踐內為田家侵掘混為泥塗往來艱阻
夏潦初興河流溢而大　秋暘方熾田水泄而不留
非特路人病之也嘉定十四年郡守汪綱增築之徒
行無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縴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儲
積其利已博矣而又建施水坊於人煙不接之地凡
八所各五間為中寮以憩過往之人且將規畫食利
以資守坊者為久長之計則其利豈特博而已哉
沙路在西興沙上直抵江岸長一千一百四十丈十

图 3　南宋宝庆《会稽续志》中有关汪纲修缮古纤道记载

楫，史称宋城。又因府治濒临海道，靠近行都，兵力薄弱，他便招募水军，创立军营千余间，增修铠甲兵器，从而威声大振。嘉定十七年(1224)，他又用五万余根桩条做路基，将萧山西兴抵钱塘江岸的沙滩改筑成沙路，以利行人。宝庆三年(1227)，绍兴属县发生水患，发粟 3.8 万余石、缗钱 5 万，以赈济灾民。同时，还上疏减免租税 6 万余石，使灾区得以及时复苏。绍定元年(1228)十二月离任。后权户部侍郎，致仕卒。越人获悉噩耗，纷纷来到寺观哀悼。葬黟县金鸡原。

汪纲学有本原，博闻强记，对兵农、医卜、阴阳、律历诸书无不研究。生性机灵聪明，办事雷厉风行。在越期间，身兼四职，公文堆积如山，但却能“操约御详”[6]，处理神速。同时，官府也廉洁如水，被越人爱若“慈父母”[7]。工文辞，尤以论事见长，《宋史》评为“援据古今，辨博雄劲”[8]。著有《絜斋集》《左帑志》《漫存录》等。曾修订补充《万首唐人绝句》。今绍兴卧龙山、宛委山飞来石，有他留下的摩崖题记。

新堤是古纤道宋代之名。宋室南渡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浙东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重要。南宋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描绘当时运河舟楫穿梭、纤夫背纤的繁华场景：“浪桨风帆，千艘万舻；大武挽縴，五丁噪呼；榜人奏功，千里须臾。”[9] 汪纲莅绍后，审时度势，在疏浚浙东运河的同时，将沿河一线因长年被纤夫踩踏、农夫蚕食，已泥泞不堪的土堤型纤道加以增筑硬化，既便利纤夫、行人，又减少了初夏久雨河水漫溢农田、烈日曝晒田水干涸不留的弊病。同时，还在人烟稀少的纤道路段，每隔十里许，建造施水坊一所，共计八所，每所五间，供过往之人避雨憩息。并派员值守巡查，将人员经费纳入长远规划。为此，南宋孙因在《越问》中有“新堤平而拟掌兮，沸行歌以载路”[10] 之句予以赞美。

此外，《宋史》和明万历《绍兴府志》在记及汪纲疏浚浙东运河时，还有一段文字值得留意。《宋史》云：“萧山古运河……于涂则尽甃以达城闉。十里创一庐，名曰‘施水’，主以道流。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暑寒，意行利涉，欢诉忘勩。”[11] 万历《绍兴府志》云：“疏浚萧山运河三十里，创碑江口，以止涨沙。甃石通途，凡十里，中为施水亭，往来称便。”[12] 对于上述记载，之前很少有人将之与汪纲增筑古纤道联系在一起。其实，“于涂则尽甃以达城闉”“甃石通途”，均指萧山段古纤道有 5 千米被扩改为石砌路面，时在宋宁宗嘉定年间。因此，汪纲之举开浙东运河古纤道局部路段砌石之先河，为明代纤道全线砌石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

三、李良

李良，山东人。弘治初，知山阴。……运河土塘，霖雨即颓，水溢害稼，且病行旅。良周谘计度，甃以石，亘五十余里。塘以永固，田不为患，至今便之。

——明万历《绍兴府志》(图 4)[13]

李良，字遂之，明山东齐河人，寄籍神武左卫。早年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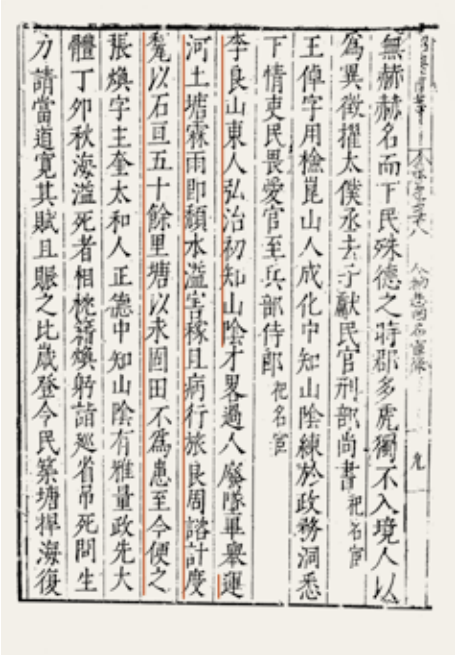


图4　明万历《绍兴府志》中有关李良修缮古纤道记载

翰林院学士刘健，为刘氏所器重。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考取第三甲第一百零三名进士。弘治元年(1488)，授山阴县知县。在任6年，“才略过人，轻徭节费”[14]，为士民所爱戴。当时的浙东运河纤道，绝大部分是土塘，地方官府和民间屡修屡塌，收效甚微。李良到任伊始，注重调研，深知改善水上交通乃当务之急，于是在城西“自虹桥达钱清”[15]段运河沿岸的土堤外侧，用石板或条石砌叠成石坎；又在水深河宽处，筑起双面临水的实体型石砌纤道，从而逐渐形成了“白玉长堤路”[16]的水上奇观。弘治七年(1494)，迁监察御史，曾奉敕巡按庐、凤、淮、扬等处。适逢当地发生饥荒，他设法赈济，救活上万民众。正德元年(1506)六月，升光禄寺少卿。正德五年(1510)九月，改任大理寺左寺丞。正德六年(1511)二月，擢大理寺右少卿。同年六月，升左少卿。正德七年(1512)七月，任光禄寺卿。同年十二月，因女儿改婚事，被人弹劾，遂称病致仕。正德九年(1514)三月，卒于家中，皇帝赐一祭。《明实录·武宗毅皇帝实录》誉其“性宽厚，知大体”[17]。

李良修缮古纤道事迹，首载于万历《绍兴府志》，之后的清康熙《山阴县志》、清雍正《浙江通志》、清乾隆《绍兴府志》、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清宣统《山东通志》等，均有类似记载。[18]

四、孙如法

先兄讳如法，字世行，别号俟居。……癸丑，……见兄于舟中，以躬督筑塘事在古钱清。地当孔道，河涛啮而圮之，往来病涉。兄捐赀甃石，蜿蜒四十里许，人咸颂德焉。

——清《余姚孙境宗谱》(图5)[19]

孙如法，明余姚县人。孙氏为余姚最负盛名的氏族，自如法曾祖燧登科及第以来，连续六世均“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20]。父鑨，官至吏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清

图5　清《余姚孙境宗谱》中有关孙如法修缮古纤道记载(局部)

简，始迁居绍兴府城。如法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六月。身材短小，“长不满五尺，而广颡碧眼”[21]。但天资英敏，喜读经史，每当读到古代权奸擅政，便破口痛骂。万历三年(1575)，考取诸生。次年中举。万历十一年(1583)，考取第二甲第五十名进士。次年，授刑部山西司主事，“立朝风节棱然”[22]。万历十四年(1586)，因谏论建储及阻郑贵妃进封，触怒皇帝，被贬为广东潮阳县典史，虽属闲职，但对民间疾苦依然直陈于地方官府，提携后进也不遗余力。后因感染瘴毒返乡，日与图书为伍。其间，朝中大臣屡次举荐，都未被重新起用。生性好施，曾出资修复柯桥古寺，修筑古海塘、古纤道等。据祁彪佳撰《越中园亭记》载，孙如法在绍兴的别业有两处：一为柳城，在钱清沙头村；另一为孙庄，在越王峥下。[23]每年冬夏，常乘舴艋舟，往来隐居。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二月卒。天启元年(1621)六月，追赠光禄寺少卿，并赐葬。墓在山阴凤凰山。

孙如法工词曲，被明会稽籍名士钱榜誉为“游戏词学，亦绝技也”[24]。他与同时代戏曲家汤显祖、王骥德、吕天成、沈璟等均有交往。特别是王骥德，更是在他的指授和帮助下成名成家。孙如法提出的“衡曲十法”[25]对明末戏曲界产生较大影响。又善书法，近似欧体，遒劲有力。著有《春秋古四传》《广战国策》等。

据孙如洵撰《先兄光禄卿俟居公行状》显示，孙如法修筑古纤道的年代，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26]具体修筑情况，明陈继儒撰《光禄卿俟居孙公暨配史宜人合葬墓志铭》亦有记述：“修梅市至浪桥官塘数十里，移舟躬督甃石，为周行，时宜人区画赞助居多。”[27]“梅市”，今名梅墅(绍兴方言“墅”与“市”同)，在浙东运河畔，地属柯桥区柯岩街道；“浪桥”，未见方志载录，但依据上文所及地名“古钱清”、长度“四十余里”推测，应在今浙东运河钱清段纤道上。

五、僧圆澄

圆澄，字湛然，东关人，俗姓夏。……晚年募筑往西塘路，民至今利赖。

——清康熙《会稽县志》(图 6)[28]

圆澄是明代高僧。俗姓夏，号无用、散木，会稽县东关(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人。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容貌“大目昂鼻，哆唇露齿”[29]，较为奇特，但天资颖悟，善于言辩。由于家境贫寒，十一二岁时即充当邮卒，栉风沐雨，不辞辛劳。后因错投公牒，怕遭刑罚，投江自尽，漂流数里，被渔民救活。适逢一僧人途经此地，经其开导，遂生皈依佛门之念。万历十二年(1584)，正式在天荒山妙峰禅师处削发为僧。一

得戒于雲棲蓮池師以古佛期之掩關者六年適
慈舟和尚謫南海還寓越之止風塗相見弊治慈
舟遂付囑焉時萬曆辛卯也歷諸勞瘁向不曉文
字一旦豁然直接曹洞之宗開闡顯聖道場講經
說法不事粧點日頭家常話俱有妙理晚年募築
往西塘路民至今利賴祭酒陶望齡甚敬禮之
皇清圓信字雪嶠鄞縣人幼穎悟嗜重不嗜世緣素性
脫畧志趣高遠常往來雲門雙徑兩山間後覩古
雲門二字開悟遂終老茲山嘗圓寂之前預寫小
會稽縣志　卷二十六　人物志　釋　十三

图 6　清康熙《会稽县志》中有关僧圆澄修缮古纤道记载(局部)

年后，得戒于云栖寺莲池禅师，闭门6年，领悟佛理。万历十九年(1591)，得曹洞宗二十六世传人慈舟禅师亲炙。不久，出住会稽云门寺，后又迁余杭径山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建云门显圣寺并任住持，筚路蓝缕，开堂说法，“曹洞一宗，遂耀腾今古”[30]。后又至绍兴法华、华严、天华、明心，云门广孝诸寺及京都、余杭、嘉兴等地，传播曹洞宗风。天启六年(1626)十二月初四日，圆寂于天华寺。葬显圣寺南钵盂山之阴。墓塔铭由明陶奭龄撰文、祁豸佳书丹。塔铭拓片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圆澄在晚明佛教界地位尊崇，影响巨大。据《云门显圣寺志》载：圆澄“踞讲席者凡四十余，开堂说法凡六所”“嗣法者九人”。[31]《大清一统志》称其“讲经典，俱有妙理”[32]。同时代名人陶望龄、周汝登、祁承㸁、王舜鼎、陶奭龄、吴用先、张鲁唯等，亦慕名执弟子礼，与之交往，请教佛法。

圆澄的佛学著述原有不少，但多散佚。现仅存门人明凡录，丁元公、祁骏佳编《会稽云门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八卷，收录于《新编卍续藏经》第126册[33]。又精于戏曲。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分别著录其所作传奇《妒妇记》、杂剧《地狱生天》(南北五折)各一种。前者被列入“具品”[34]，评曰：“湛然大师以妇人悍妒，多入三涂，遂取房玄龄事，讳其名为白心室。虽大师一片婆心，亦未免老僧饶舌。”[35]后者被列入“能品”[36]，评曰：“老僧说法，不作禅语而作趣语，正是其醒世苦心。词甚平，然无败笔。”[37]

据清姚夔《重修越郡石塘纪略》载，圆澄修筑的纤道，“大率因循旧制，宽不逾丈”。[38]可见这是一次按原规制修缮和增筑的工程。又据《新续高僧传四集》显示，圆澄“筑石塘一百五十里”。[39]故其范围不仅限于绍兴城西段运河纤道，还应包括绍兴城东段纤道。鲁迅二弟周作人在《夜航船》中说：“绍兴主要的水路，东边自西郭门外到杭州去的西兴，东边自都泗门外到宁波去的曹娥，沿路都有石铺的塘路，可以供舟夫拉纤之用，因此，夜里航行的船便都以塘路为标准，遇见对面的来船，辄高呼曰‘靠塘来’或‘靠下去’，以相指挥。”[40]就是对这条全线石砌古纤道的真实写照。

六、余国瑞、倪宗贤、姚国助、姚夔

> 於越泽国也，自郡城东百里抵曹江，为四明孔道；西百里抵钱江，为武林孔道。……石塘一线绵亘二百里，由来尚矣。……鼎革之初，山海未靖。……十余年来，风浪摧残，湍流漱激，根脚既虚，倾圮日甚。……同学余子涵赤而筹之，匪杞人之忧，实由己之患也。始难之终，任之未暇。鸠工先谋经费矣，一言经费，必出劝输矣。于是，……倪子涵初以医劝；仲父祐之以上中下三则劝；余以百缘劝；而涵赤则总司其出纳运筹之事。
>
> ——清姚夔《重修越郡石塘纪略》(图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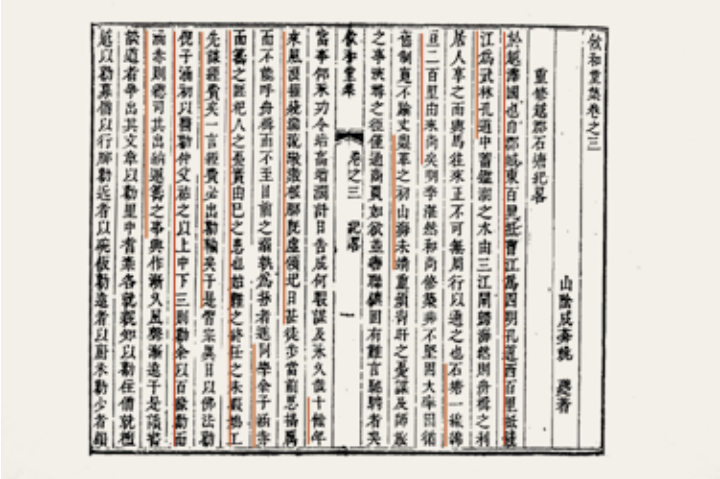

欽和堂集卷之三
山陰姚壽鵬 選者
重修越郡石塘紀略
於越澤國也自郡城東百里抵曹江爲四明孔道西百里抵錢
江爲武林孔道中間鑑湖之水由三江閘歸海然則舟楫之利
居人享之而舟馬往來王不可無周行以通之也石塘一線綿
亘二百里由來尚矣明季雖然和尚修築弗不堅固大率因循
舊制寬不踰丈鼎革之初山海未靖重洪背圩之變謀及師旅
之事洪濤之後僅通商賈如欲垂春聯碑則有難言疑將者矣
欽和堂集 卷之三 紀略 一
當事仰承功令始高增闊計日告成何艱謀及永久費十餘年
來風浪摧殘湍流漱激根脚既虛傾圮日甚徒步當前思補爲
而不能呼舟楫而不至目前之覆轍爲孫者能何學會子祈澤
而慕之既犯人之憂實由己之患也始難之終任之未暇鳩工
先謀經費矣一言經費必出勸輸矣于是管宗吳日以佛法勸
倪子涵初以醫勸仲父祐之以上中下三則勸余以百緣勸而
而赤則總司其出納運籌之事與作新久風雨漸遠于是頑者
欲造者爭出其文章以勸里中者素各就親炙以勸在僧就禮
延以勸募僧以行脚勸近者以苑仮勸遠者以尉來勸少者顧

图7　清姚夔《重修越郡石塘纪略》中有关余国瑞等人修缮古纤道记载

余国瑞，字涵赤，山阴县亭后村（今属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亭西村）人。生活于明末清初。诸生。事母甚孝，品行端正。常告诫子孙曰："制行不可作第二等人，落笔不可作第二等文。"康熙十二年(1673)，其从子余应霖考中进士，依然以"杜浮交，绝私援"[42]为诫。生性乐善好施，遇到因贫卖女的人，出钱赎回；老而无依的人，给予膳食；修纤道、建禅院等，都是他一生业绩的亮点。善文辞，被同学姚夔尊为"文学领袖，骎骎称亢宗大家"[43]。著有《畏庵文集》。

倪宗贤，字涵初，山阴县亭后村人。生活于明末清初。诸生。精研岐黄，博览《内经》及历代医家医案，声名驰誉江南。他治病先贫而后富，不论昼夜，随叫随到。明祁彪佳曾多次请他至山阴梅墅家中，为自己及妻子商景兰治病。这在《祁彪佳日记》中均有提及。[44]生平为人坦荡，为善弥殷，出诊时常携带名贵药材，遇有贫病之人，就杂和于普通药材中廉价出售，甚至分文不取。家无积资，行医收入多用于修筑纤道、螺山桥，设立义田、义冢、义学，造福乡民。在绍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倪宗贤慈厚待人、妙手回春的故事。清乾隆《绍兴府志》即记有一则：一天傍晚，倪氏乘船出诊归来，看到有恶棍在偷割其邻田稻谷，便大声疾呼："这是某寡妇的田地，千万不可割，割了会使寡妇活不下去。旁边是倪涵初家的稻田，他是医生，虽割了，也不至于饿死！"[45]说罢便离去。

倪宗贤行医余暇，喜好理学。年轻时，曾与同里张子宏担簦负笈，拜刘宗周为师探究理学。清初，又曾徒步数百里，至江苏武进，聆听"海内大儒"李颙（号二曲）讲学。晚年，更是每月延请张子宏至家塾，聚集乡中子弟阐扬刘宗周"慎独"义理。他曾对人说："蕺山之学，濂洛嫡派也！"[46]并将"慎独"始终贯穿于行医生涯。

倪宗贤卒年64岁。学者私谥"庄惠"。里人誉其"今人中之古人，古人中之贤人"[47]。著有《治疟痢方》。该书被清李冠仙《知医必辨》称为"方论不多，而精妙绝伦"[48]。倪氏"生而为英，死而为灵"[49]，在民间更被奉为"天医"。其墓在今柯桥区湖塘街道古城村，系圆形土墩墓，墓圈直径6米，用块石围砌。墓前有天医殿。1990年2月经调查，尚有两进清代建筑。第一进殿内壁间，竖有清道光年间《修路碑记》一通，碑文前半部分记述倪宗贤"术善岐黄，奄穸是地，生平济世之心，声传于后"。为方便祭奠，里人捐资修建一条通往该殿的石板路。碑文后半部分镌捐助者姓名及金额。第二进正殿柱梁结构采用木、石相结合的方式，牛腿雕刻精美的人物图案。殿内塑倪宗贤像，常年香火不绝。过去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倪"天医"生日前后，殿前还搭台演戏，热闹非凡。[50]现该殿仅存一进一间。又太平桥北堍原有天医庙，亦为奉祀之所。

姚国助，字佑之，号培风，山阴县管墅村（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管墅社区）人。生活于明末清初。父万全（字嵩岳），博学多才，曾任曲周县（今属河北）县丞，后又游幕南昌卫。明天启四年(1624)辞职返里，以课子教孙娱老。国助年轻时，常与兄长明俊、三弟振宗等聆听其父讲授谋身治世之道和宋儒性理之学。后与兄弟及侄子夔，师从祁豸佳、陶安龄等越中名士。明崇祯年间考取庠生。尚义好善，并以诗文、棋艺自娱。

姚夔，初名可咸，字皆生，后改名夔，字胄师，号成庵，山阴县管墅村人。明天启四年(1624)生于山阴亭后村。父明俊（号天随），明崇祯三年(1630)诸生。姚夔幼沐家风，6岁启蒙，9岁诵读古文辞，10岁起专攻举子业。清顺治二年(1645)考取诸生。顺治十一年(1654)，中第26名举人。

康熙十七年(1678),任浙江开化县教谕。在任十年,曾2次捐资、3次主持修建县儒学,并拓展讲舍,制定课期,一年后学风为之大变。又教导士子学习《易经》,阐发程朱理学精华。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升贵州安化县知县。安化为该省险要城邑,治安混乱。他“绝苞苴,安狱市”[51],对顺从者施以恩惠,对顽固不化者进行惩处,受到上司的器重和民众的爱戴。后历署思州、石阡、黎平、思南四府知事。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移山东曹州知州。离任赴曹之日,当地文武官绅士民百里相送,含泪道别。曹州地势平坦,水患频繁,他考察地貌,寻访古田间水道遗迹,经多方开掘疏浚,终于消除水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因年老多病,致仕返里,寄居绍兴府城南门次子家中。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享年79岁。葬山阴古城村(今属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土名圣筊坯。

姚夔居官以民生为重,“无玷于清议”[52]。政务余暇,坚持诗文创作不辍。著有《饮和堂集》《周易群铨合璧》。前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载,并有“其诗流易有余”“文亦肉多于骨”[53]等评价;后者则被时人誉为“微妙渊泓,不同帖括家言”[54]。另,又主纂康熙《开化县志》。

据姚夔《饮和堂集》、清嘉庆《山阴县志》记载,此次修缮古纤道工程,始于清康熙三年(1664)仲冬,历时8年竣工。修缮地段为浙东运河曹娥至钱清段纤道。工程负责人为余国瑞,率先捐资,并苦心孤诣,“总司其出纳运筹之事”[55];倪宗贤、姚国助、姚夔等人为分工协作者。他们除自己慷慨解囊外,还各司其职,发动同行以及通过张贴《弁言》、宣扬《百缘经》等形式劝捐。随着募资接踵而至,一鼓作气完成修缮工程。余国瑞又与姚夔商定,在纤道上设置功德碑,将“捐一丈者,列名一丈之内;捐十丈、百丈者,列名十丈、百丈之内”[56],舟楫往来,万目共赏,从而使社会各阶层人士络绎奔赴,一而再,再而三,少而多,多而倍,资金源源不绝。工程告竣后,姚夔撰写《重修越郡石塘纪略》立于捐资碑前,详细记述此次重修纤道始末。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亦收录姚氏此文,但将年代记“清顺治年”[57],有误,应更正为清康熙年间。此外,姚夔还写有《余涵赤塘工告竣序》[58],以彰扬余国瑞热心公益、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无私无畏的精神。

七、冯士毅、冯光昂

冯士毅,字再可,山阴柯桥人。……镇之南岸东西官塘一带,绵亘数百里,日久倾仄,行者苦之。士毅先自捐金若干,与二三同志协力修复。

冯光昂,山阴柯桥人。邑之西有玉带桥、行义桥,连络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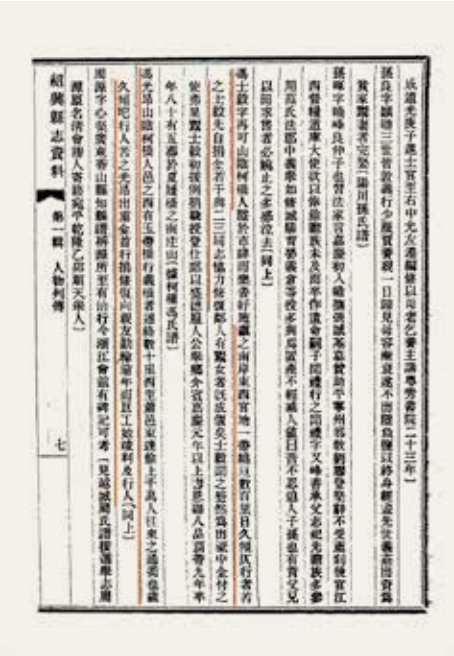


图8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有关冯士毅、冯光昂修缮古纤道记载

十里，西至萧邑，东达余上，千万人往来之通衢也。岁久倾圮，行人苦之。光昂出重金首行捐修，复向亲友劝输，逾年而巨工始竣，利及行人。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图8）[59]

冯士毅系清山阴县柯桥钟泽村（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中泽社区）人。钟泽冯氏，始迁祖为冯阳春（明代儒士），隆庆、万历年间由亭后迁于钟泽，至冯士毅为第六世。士毅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年少时即失去父母，因为家里没有固定的资产，便以贩卖粮食谋生。由于精明能干，经营有方，经数十年拼搏，终于家道殷实。年逾花甲后，他将经商事务交与光日、光昂二子，自己则优游林泉，致力于公益善举。士毅最初援例捐职，被朝廷授予登仕郎。后又被地方官府推举为乡介宾。嘉庆元年（1796），因德高望重，被恩赐修职郎。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无疾而终，享年85岁。葬山阴夏履桥（今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夏履桥村）土名南庄山。

官塘是古纤道明清时期之名。冯士毅的义行，除捐资修葺柯桥段纤道外，文献记载的还有不少。如柯桥镇上有名刹融光寺，乾隆五十三年（1788）毁于火。众人集议重建事宜，但因经费需上万，束手无策。他获悉后，与同仁李元平毅然捐资，承担复建重任，并躬亲督理，寒暑无间，不出三年，该寺恢复原貌。又如有一邻居因贫卖女，双方已达成价格，他闻讯后闷闷不乐，便出重金付与买方，帮助邻居赎回女儿。再如族中无米下锅之家，他也总是给予物质上的资助。清代会稽籍状元茹棻总结他的业绩，曾发出“生前负令誉，没后播芳声”[60]的赞叹。

冯光昂为冯士毅次子，又名业，字鼎中。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太学生。早年即克绍箕裘，经营米肆。中年后，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开始“好仁不怠，见义必为”[61]。冯光昂重修柯桥段古纤道相关桥梁，除上述玉带桥、行义桥外，据《山阴柯桥冯氏宗谱》载，尚有宝带桥。其中的玉带桥和宝带桥，均系单孔石梁桥，穿插突兀于平坦的纤道之上，使纤道变得高低错落、绰约多姿，同时也为船只遭遇风浪，及时穿越桥孔进入纤道另一侧躲避带来便利。现二桥尚存。行义桥，位于钱清街道秦望村。据1985年4月调查，系单孔石拱桥，南北跨运河。全长22.5米，面宽3.8米，净跨7.4米。桥上望柱雕刻坐狮、莲瓣等图案。[62]该桥规模较大，技艺精湛，谱牒称光昂“出重金首行捐修”，所言不虚。现行义桥已改建成混凝土结构。

清嘉庆十四年（1809），冯光昂在柯桥镇东南隅兴建冯氏宗祠，以供奉和祭祀祖先。至于他帮扶贫困居民婚丧嫁娶、周济灾民、调解民事纠纷等等，不胜枚举，是镇上有名的“智多星”和“老娘舅”。不仅如此，他还将两个儿子取名为仁（又名“培仁”）、义（又名“培义”），希冀后裔能传承家风家训，弘扬传统美德。其二子成年后，亦不辱父名，一切义举都踊跃参与，在柯桥街头巷尾传为美谈。光昂卒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其曾孙冯景星（谱名宗祥，字瑞卿，号庆云），考取清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乡试第十一名举人。

八、章文镇、章文锦

公讳文镇，字安邦。……绍郡官道失修，多倾陷，公创议，纠资治平之。易低洼为孔道者，凡十余里。……至修梅墅、行义等桥，则公独任之费，虽多不吝。

公讳文锦，字锦堂，号彩彰。……修阮社、荫毓、行义诸桥，且填平官塘之倾陷者，凡数十处，皆公与文镇公协力

为之。

——清《山阴阮社章氏宗谱》

（图 9—1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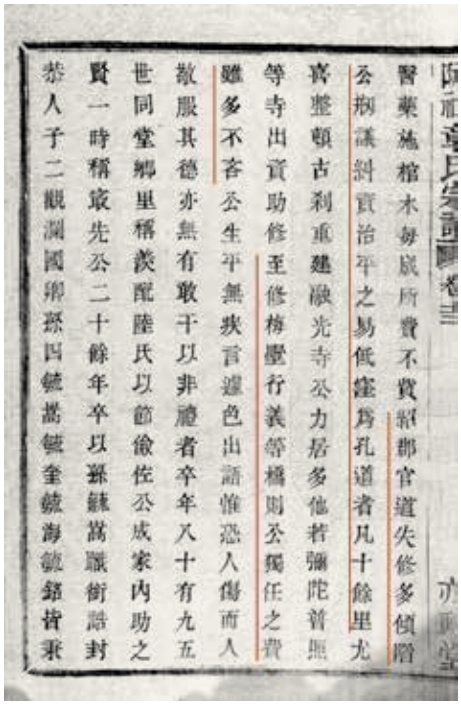


图 9　清《山阴阮社章氏宗谱》中有关章文镇修缮古纤道记载（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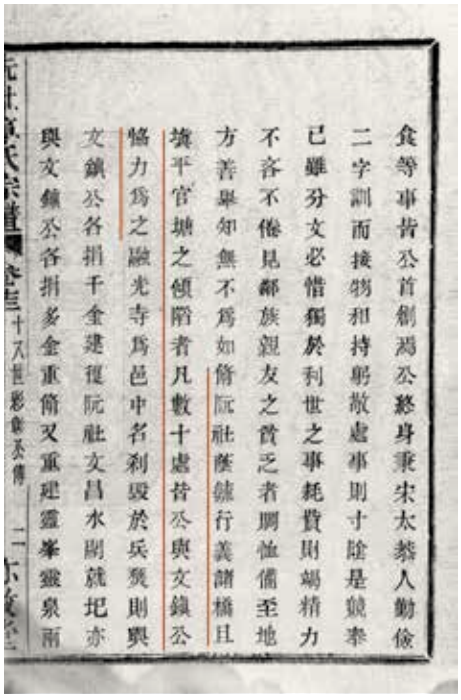


图 10　清《山阴阮社章氏宗谱》中有关章文锦修缮古纤道记载（局部）

章文镇、章文锦系同胞兄弟，山阴县阮社东江村（今属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人。生活于清代中晚期。章文镇 9 岁丧父，事母至孝，俨若成人。其时阮社黄酒已冠绝天下，他居家主持酿造，而文锦则在外负责营销。兄弟联手，经数十年打拼，终于发家致富。他自奉节俭，好施不倦。清咸丰、同治之交，绍兴一带战乱不断，灾荒频繁。他用船只载粥施药，救活无数饥民。又购置大批棺木，殓葬贫困村民和流民。他热心公益，与弟文锦等修缮古纤道之上的荫毓桥、阮社桥，改建部分地势较低的古纤道；出资重建越中名刹融光寺；修复弥陀寺、柯岩普照寺、信公桥文昌阁等。晚年以孙毓嵩职衔，诰封朝议大夫。卒年 89 岁。葬山阴古城村大园门。

章文锦出生未满周岁便失去父亲。12 岁时，母亲病故，依赖兄长维生。16 岁时，在族人的帮助下，赴宁波恒丰号酒肆当学徒。由于虚心好学，业务大进，使原本濒临倒闭的酒肆得以重新恢张兴旺，并被族人推为掌柜。他走南闯北，先后在山东、福建等地添置诸多门铺，并设立酒局，家境日丰。晚年在村内新建筠记、鹤记、望记等台门，分与诸子，自己则居于旧宅。这些台门布局独特，做工考究，互相贯通，且设有后门，与村后弄堂衔接。抗日战争时期，绍兴沦陷，日军曾进犯阮社，村民闻讯后及时躲入台门，并从后门弄堂撤至村外，免遭劫难。

章文锦秉承“勤俭”[64]家训，致富不忘桑梓。清咸丰、同治之际，他将在外门铺托付亲友料理，只身返回故里，竭力赈困扶危。凡地方善举，无不悉心参与。除与兄长文镇合资修葺上述古迹外，还独资重建大、小尖山的灵峰、灵泉二寺。卒后葬于灵泉寺旁。经调查，该墓在今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街道芝塘湖村小尖山灵泉寺南侧，墓向坐西南朝东北。墓冢呈馒头形，用封土。边长 6 米，高 4 米。正面砌条石挡土墙。原墓碑已佚，现碑为近年章氏族人重立。墓前设石祭桌和拜台。拜台分上下两层：上层呈长方形，长 5 米，宽 3.5 米；下层呈半圆形，半径 6.8 米，高 2.5 米。台身外沿均用块石砌叠。[65]

上文所引章氏兄弟“易低洼为孔道者”之句很重要。“易”，《辞源》释为“改变”。“《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66]说明章氏兄弟曾将柯桥段塘身低矮、易被河水淹没的两面临水实体纤道加以增高，改变成一跨紧扣一跨、接连不断的石墩石梁式平桥。又，1985年调查发现，玉带桥桥墩一侧，嵌有章氏兄弟等捐资碑记一通，青石质，楷书，阴刻，上覆石雕瓦楞。碑文云：“自太平桥起至板桥止，所有塘路以及玉带、宝带桥，共计贰百八十一洞。光绪九年八月日，阮社村绅士章文镇、章彩彰重修。余支桥东西，匠人周大宝、毛文珍修。”[67]该碑所记与“易低洼为孔道者”，应系同一件事。因为这次改建的纤道桥，是在原址上以原有石料为基础，故碑记称“重修”，实则与创建无异。这种纤道桥当地俗称百孔官塘、铁锁桥，位于柯桥太平桥以西，保存较完整的有“十八洞头”“宝带桥段”“玉带桥段”等实例。其设计形式，不仅不影响纤夫引船，而且使纤道更加轻盈通透、灵活多变，同时还有利于调济水源，避免雨季因河水涨高而被淹没的可能，实现了科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和和谐统一，成为国内外罕见的石桥类型、绍兴古纤道精华中之精华。对此，日本汉学家冈千仞在清光绪十年(1884)所作的《观光纪游》中，曾发出“不特美观，实为伟功”[68]之赞叹。不少反映绍兴水乡风貌的影视片和宣传古纤道的照片亦取景于此。至于纤道桥的断代，唐寰澄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认为：“始建于唐·宪宗时。……清·同治、光绪间重修。”[69]陈从周、潘洪萱编著的《绍兴石桥》则称“建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70]。其实均不确，今据谱牒及碑记，应以创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为宜。

章氏兄弟重修或重建的荫毓桥、阮社桥，也在柯桥区段古纤道上，现基本保存完好。荫毓桥的桥墩一侧，嵌有章氏兄弟等乡绅于清光绪七年(1881)捐资《重建荫毓桥》碑记一通，可与谱牒记载相印证。碑文云：“重建荫毓桥。李静庵助洋壹百元、茅长顺助洋壹百元、章文镇助洋壹百元、章彩彰助洋壹百元、李晓峰助洋式拾元、沈豪助洋式拾元。光绪七年七月吉立。”可见此次建桥捐助者共六人，以章氏兄弟等人的金额最多。现该碑部分字迹已剥蚀难辨。

九、倪兆锦

倪兆锦，字绣章，山阴亭后人。……太平桥至柯桥官塘，水涨时，行旅病涉，锦出资培高尺余。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图11)[71]

倪兆锦，山阴县亭后村人。生活于清代中晚期。父成孚，经商致富，以济困扶危，为里人所称颂。倪兆锦秉承家教，亦以积德行善为乐事。太平桥至柯桥段纤道，由于塘身较低，若

图11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有关倪兆锦修缮古纤道记载

连降暴雨，河水上涨，容易漫没纤道，不仅影响通行，而且会使沿河农田受灾。他耳闻目睹，心怀怜悯，出重金将原有单面临水纤道筑土垒石增高，从而根治水患。方志、谱牒所载，倪兆锦的善行尚有：客居诸暨时，出资设立培荫会，以收埋无主尸骸；又与诸暨孙氏合修赵家步至暨城大路，以方便行人往来。寓居故里时，曾创办临浦埋济会，资助无力下葬的贫民；清咸丰年间，捐田三亩，作为十世祖倪瑞祥墓地祭扫之需；又独资营建倪氏宗祠；清同治七年(1868)，捐资重建太平桥北首太平庙戏台；光绪二年(1876)冬，与同里姚山麓房族合建太平庙后殿；光绪三年(1877)春，与同里姚尔侯倡修土谷祠；又曾独资修葺柯桥。还有重建融光寺、重修狄猻湖避塘等，亦与其倾囊相助分不开。

今柯桥区华舍街道亭西村亭后自然村原有倪兆锦故居。据2008年9月绍兴县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故居坐北朝南，共有四进晚清木结构建筑。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均面宽三间；第三进为座楼，第四进为后楼，均面宽十一间，南窗外设有檐堂栅栏。牛腿木雕及檐墙砖雕麒麟、福寿、神话故事等祥瑞图案，技艺精湛。整体用材粗壮，豪华气派，彰显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艺术品位。可惜该处建筑今已不存。

十、茅长顺

我年轻时听长辈说过，岳父茅长顺家境富有，喜做善事，曾先后出资重修柯桥镇以西坍塌的纤塘路、阮社前庙和后庙、阮社小学，重建荫毓桥等。

——2004年5月14日章瑞鹤先生（时年86岁）口述[72]

茅长顺，原名宝安，山阴县阮社中巷村（今属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人。生于清道光年间。家世酿酒，开设的酿坊在当地数一数二。生平待人诚恳，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是里人心目中的道德楷模。清末，曾捐同知职衔。与爱国人士陈仪（绍兴东浦人）为表兄弟。民国十八年(1929)卒。育有二女。茅长顺捐资修缮古纤道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但重建荫毓桥之事，上文所述《重建荫毓桥》碑记中有“茅长顺助洋壹百元”可证。“洋壹百元”，即为银圆100元，这是此次建桥捐资数额最大的乡绅之一。

绍兴素有“泽国”[73]之称，历代名宦多将疏浚河道、修筑堤塘、造福于民作为第一要务；绍兴民间又有修桥铺路、行善积德的优良传统，俗谚道：“修桥铺路管子孙，烧香念佛图自身。”更何况修筑的是浙东水上交通枢纽运河的辅助设施古纤道，文献记载和遗存于纤道上的碑刻便是明证。当今，绍兴市正在加快建设“三大文化带”，即浙东运河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古越文明文化带，而进一步挖掘、整理古纤道相关人物和故事，对丰富浙东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内涵，拓展文化旅游新品牌，以及充实完善古纤道“四有”记录档案都有裨益。

（摄影：任金娜）

注释：

①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四册）志第三十一《地理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1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十三册）列传第一百一十三《孟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58页。

③ ［宋］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四《堤塘》，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④ ［宋］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四《堤塘》，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⑤ ［宋］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四《水·山阴萧山运河》，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⑥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十五册）列传第一百六十七《汪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309 页。

⑦ ［宋］张淏纂修；［宋］孙因撰：宝庆《会稽续志》卷八《越问·良牧》，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⑧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十五册）列传第一百六十七《汪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309 页。

⑨ ［宋］王十朋撰：《会稽三赋》卷一《会稽风俗赋》，明天启元年（1621）刻本。

⑩ ［宋］张淏纂修；［宋］孙因撰：宝庆《会稽续志》卷八《越问·良牧》，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⑪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十五册）列传第一百六十七《汪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308 页。

⑫ ［明］萧良干修；［明］张元忭等纂：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七《名宦前》，明万历十五年（1587）刻本。

⑬ ［明］萧良干修；［明］张元忭等纂：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人物志四·名宦后》，明万历十五年（1587）刻本。

⑭ ［明］许东望修；［明］张天复，柳文纂：嘉靖《山阴县志》卷七《宦迹传》，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

⑮ ［清］悔堂老人撰：《越中杂识》上卷《名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53 页。

⑯ ［清］齐召南撰：《宝纶堂诗钞》卷二《山阴》，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

⑰ 《明实录》第三十六册《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一十“正德九年三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年，第 2259 页。

⑱ ［清］高登先修；［清］沈麟趾等纂：康熙《山阴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二·名宦·李良》，清康熙十年（1671）刻本。［清］嵇曾筠，李卫等修；［清］沈翼机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三《名宦八》，清光绪刻本。［清］李亨特修；［清］平恕，徐嵩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三《人物志三·名宦下》，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五《绍兴府二·名宦·李良》，《续修四库全书》第 61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28 页。［清］杨士骧修；［清］孙葆田等纂：宣统《山东通志》卷百六十一《人物志第十一·历代循吏》，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⑲ ［清］孙仰堂等纂修；［明］孙如洵撰：《余姚孙境宗谱》卷二《传赞类·先兄光禄卿俟居公行状》，清光绪二十五年（1760）木活字本。

⑳ ［清］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三《姚江孙氏世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55 页。

㉑ ［明］张岱撰：《三不朽图赞·立德·忠谏·孙俟居公》，民国七年（1918）重印版。

㉒ ［明］张岱撰：《三不朽图赞·立德·忠谏·孙俟居公》，民国七年（1918）重印版。

㉓ ［明］祁彪佳撰：《祁彪佳集》卷八《越中园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14 页。

㉔ ［清］孙仰堂等纂修；［明］钱椟撰：《余姚孙境宗谱》卷二《传赞类·光禄卿俟居孙公传》，清光绪二十五年（1760）木活字本。

㉕ 王汉民：《祁彪佳品曲理论浅探》，《戏曲研究》2000 年第 55 辑，第 195 页。

㉖ ［清］孙仰堂等纂修；［明］孙如洵撰：《余姚孙境宗谱》卷二《传赞类·先兄光禄卿俟居公行状》，清光绪二十五年（1760）木活字本。

㉗ ［清］孙仰堂等纂修；［明］陈继儒撰：《余姚孙境宗谱》卷三《祠墓志·光禄卿俟居孙公暨配史宜人合葬墓志铭》，清光绪二十五年（1760）木活字本。

㉘ ［清］王元臣修；［清］董钦德，金炯纂：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六《人物志·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㉙ 藏经书院编：《新编卍续藏经》第 126 册《会稽云门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八卷，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第 313 页。

㉚ ［清］赵甸编；［明］陶履卓撰：《云门显圣寺志》卷首《叙》，清雍正年间刻本。

㉛ ［清］赵甸撰：《云门显圣寺志》卷四《云门显圣寺住持湛然澄禅师法语（有传）》，清雍正年间刻本。

㉜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六《绍兴府三·仙释·圆澄》，《续修四库全书》第6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㉝ 藏经书院编：《新编卍续藏经》第126册《会稽云门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八卷，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74—350页。

㉞ ［明］祁彪佳著；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3页。

㉟ ［明］祁彪佳著；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3页。

㊱ ［明］祁彪佳著；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9页。

㊲ ［明］祁彪佳著；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9页。

㊳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三《纪略·重修越郡石塘纪略》，清康熙年间刻本。

㊴ ［民国］喻谦等编：《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七《明余杭径山寺沙门释圆澄传》，民国十二年（1923）。

㊵ 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71—72页。其中“东边自西郭门外到杭州去的西兴”句中的“东”系“西”之误。

㊶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三《纪略·重修越郡石塘纪略》，清康熙年间刻本。

㊷ ［清］徐元梅修；［清］朱文翰等纂：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乡贤三》，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

㊸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四《序·余氏族谱序》，清康熙年间刻本。

㊹ ［明］祁彪佳著；张天杰点校：《祁彪佳日记》（下册）第十五卷《乙酉日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30、836页。

㊺ ［清］李亨特修；［清］平恕，徐嵩等纂：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一《人物志·义行下》，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㊻ 绍兴图书馆整理：《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十八类《文征》第六十二册《响山楼诗集》，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79页。

㊼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三《传·倪子涵初传》，清康熙年间刻本。

㊽ ［清］李冠仙著；王新华点注：《知医必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㊾ 《山阴柯西姚氏宗谱》卷十一《艺文·倪子涵初传》，清光绪年间存乐堂刻本。

㊿ 1990年2月，笔者调查记录。

51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52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六后附《成庵自序》，清康熙年间刻本。

53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二《集部三十五·别集类存目九·饮和堂集二十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40页。

54 ［清］陆祚蕃撰：《〈饮和堂集〉序》，清康熙年间刻本。

55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江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56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江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57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江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58 ［清］姚夔撰：《饮和堂集》卷四《序·余涵赤塘工告竣序》，清康熙年间刻本。

⑲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⑳ ［清］冯培坤，冯培仁辑：《山阴柯桥冯氏宗谱》卷十《敕授登仕郎再可汉公行状》，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㉑ ［清］冯培坤，冯培仁辑：《山阴柯桥冯氏宗谱》卷十一《太学生鼎中冯公德配沈儒人像赞（并序）》，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㉒ 1985 年 4 月，笔者参加绍兴县文物普查时调查记录。

㉓ ［清］章锡龄等纂修：《山阴阮社章氏宗谱》卷十三《十八世安邦公传》《十八世彩彰公传》，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木活字本。

㉔ ［清］章锡龄等纂修：《山阴阮社章氏宗谱》卷十三《十八世彩彰公传》，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木活字本。

㉕ 2019 年 11 月 8 日，笔者调查记录。

㉖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765 页。

㉗ 1985 年 4 月 3 日，笔者参加绍兴县文物普查时调查记录。

㉘ ［清］王锡祺等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册）第五帙《观光纪游九》，杭州古籍书店据清光绪十七、二十、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印本影印，1985 年，第 174 页。

㉙ 唐寰澄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87 页。

㉚ 陈从周，潘洪萱编著：《绍兴石桥》，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42 页。

㉛ ［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纂：《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印。

㉜ 2004 年 5 月 14 日，笔者采访章文锦曾孙、茅长顺女婿章瑞鹄先生（时年 86 岁）记录。

㉝ ［宋］张淏纂修；［宋］孙因撰：宝庆《会稽续志》卷八《越问·舟楫》，明正德五年（1510）刻本。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遗存调查

嵊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王鑫君

一、背景

2018 年 6 月，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大花园建设动员部署会，决定举全省之力全面推进大花园建设，把浙江打造成“幸福美好家园、绿色发展高地、健康养生福地、生态旅游目的地”。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建设工程是全省大花园建设行动标志性工程之一，是《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明确的工程项目。

在这一背景下，开展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历史遗存调查，系统梳理反映唐诗的古代交通遗存、古代儒家隐逸文化、释道遗迹、地方经济文化和沿线其他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历史文化遗产分布状况，科学评估位于浙东唐诗之路核心区的嵊州段文物遗存保存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综合价值，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概述

唐代盛行漫游之风，我们将唐代诗人行踪密集、诗歌数量众多的古代水陆交通线路称之为唐诗之路。在众多诗路中，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提出最早，影响最大。1991 年 5 月，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在首届中国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剡溪——唐诗之路》一文，首次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1993 年 8 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对“浙东唐诗之路”予以正式认定。

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穿越浙东而形成的山水人文之路。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线路走向，目前普遍认可的主要线路是始于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经萧山到绍兴鉴湖，沿浙东运河至曹娥江，然后沿江而行入嵊州剡溪，再经新昌天姥山，抵天台石梁飞瀑。

浙东唐诗之路既是一条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遗产线路，又是一条产生伟大思想和艺术，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遗产线路。嵊州地处浙东唐诗之路的地理中心，魏晋遗风的风流潇洒与唐太宗热捧的羲之书法，刘阮遇仙的美好传说与佛宗道源的修身养性，秀异剡溪的诗韵墨香与神奇山水的风俗物产，吸引了众多唐代诗人入剡寻根溯源、求道问仙以及采风吟诗，以至在浙东唐诗之路中到剡的诗人最多，留下的诗篇最多，留存的行迹也最多。据统计，《全唐诗》2200 余位作者中，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之问、元稹、温庭筠、李绅、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方干、颜真卿、杜牧、贺知章等 396 位诗人曾乘舟逆剡溪而上，饱览美景，写下了众多的咏剡之作。包括《全唐诗》中存诗数量居前五位的诗人（白居易、杜甫、李白、刘禹锡、齐己）在内的 80 位诗人，共创作了 153 首（句）带“剡”字的吟剡诗。“诗

仙”李白更是四入浙江、三入剡中，是剡中山水的知音，仅他一人吟剡诗就多达12首，为吟剡诗数量之冠。在剡地，诗人们留下了“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等众多诗句，成为千古绝唱。同时，也留下了众多文物遗存和历史典故。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嵊州这个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区，就不可能形成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提出后，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反响的同时，也得到了嵊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18年10月，浙东唐诗之路剡溪智库第一次年会暨浙东唐诗之路建设联席会议在嵊州举行，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各县（市、区）签署了浙东唐诗之路建设联动框架协议，并向全社会发出了浙东唐诗之路建设联动志愿者倡议。与此同时，嵊州市根据省政府关于“打造浙东唐诗之路”的目标要求，把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打造纳入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的重要内容，并着手编制《浙东唐诗之路核心区（嵊州）旅游总体规划》，拟加大投入、加快建设，进一步打响“唐诗路、越剧源、书圣情”文化旅游品牌。

三、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古迹资源情况

1. 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的文物遗存

现存的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的嵊州段沿线文物古迹主要有以下类别。

（1）反映浙东唐诗之路交通的相关遗存。主要包括剡溪等水路交通和沿线摩崖题记——嶀浦潭摩崖题刻，以及敕书岭古道、石门岭古道、招士湾泰平桥等古代陆路交通遗存。

嵊州四面环山，四明、天台、会稽山山脉连绵抱合，唯有剡溪与外界相通。剡溪古时又称剡江、剡汀、戴湾、戴逵滩等，在嵊州境内曲折迂回30多千米，一路有艇湖、竹山、禹溪、清风、嶀浦、鼋头渚等景点，统称剡溪九曲胜景，是唐代诗人游历浙东的交通枢纽。剡溪与浙东运河西段、甬江、奉化江、始丰溪、永安溪、好溪、东阳江、浦阳江诸水流连接，诗人们游历浙东无论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均需经过剡溪。如唐代诗人崔颢的“鸣棹下东阳，回舟入剡乡”，表明是从金华江上游入剡，再经浙东运河回归的；杜甫的“归帆拂天姥”，则是由临海方向经剡溪北返的；等等。

剡溪水边有古代文人游历留下的摩崖题记——嶀浦潭摩崖题刻。据清同治《嵊县志》卷二十六《杂志·金石》载：“‘剡北奇观’四字，在县北五十里嶀浦桥西南崖壁间，相传谢灵运书。”“《石床石壁书》，在嶀浦庙下半里许，龙爪岩康乐钓台之上。正书二十余行，相传亦灵运所书。”此题刻目前未曾发现。但嶀浦庙下钓台之上岩壁现存一处宋代题刻：“淳祐辛丑，相山王立爱、雪川陈造、山阴石保之、四山石正洪恭谒。”阴刻楷书，5行25字。循溪而下，在其不远处的黄岩头岩壁上亦有一题刻：“淳祐丙午春，乐庵陈造、竹野王立爱、蓬莱山翁石保之省鹤轩先生墓，同来。”阴刻楷书，6行29字。这两处题刻均作于南宋淳祐年间，前后相距仅五年，内容亦有关联。

敕书岭古道又名官大路，在三界镇车骑山里钓自然村与剡东大水坑自然村间，路面石砌，长约1.5千米，宽约1米，至今保存较好。东晋太元十年(385)，谢玄为会稽内史，开始在始宁县县治（今三界镇）南的嶀浦、车骑山一带营建庄园。初于车骑山岭上建一精舍，名曰南山楼。他常自南山楼下岭至剡溪垂钓，此地后来称钓鱼潭。朝廷传递皇帝敕书，也是从钓鱼潭上岸，登此岭送达南山楼，故此道被称为敕书岭。

其孙谢灵运归居始宁后，又在钓鱼潭岸边建临江楼，敕书岭就成为临江楼至南山楼的必经之道。谢灵运《游名山志》曰："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余，左望湖中，右傍长江。"

石门岭古道，自三界镇祝岙村越石门岭，经崇仁镇石门村，沿石门涧、石门瀑布、沸水水库至茶亭岗村，长约12千米。其中从祝岙村至石门村的里石门自然村的古道长约7千米，多为大块石或卵石路，间有石阶，宽约1.5米，保存较好。从嶝浦经石门岭古道通嵊西、东阳。谢灵运居始宁时，与昙隆法师经石门岭游石门瀑布，谢灵运《山居赋》有记。又谢灵运《游名山志》曰："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石门瀑布在石门涧上游、石门村南500米处，两座岩壁相揖如门，下有潭，《剡录》曰"石门潭"。

覆卮山古道，是从下王大杉树附近稠木庙北上的一条块石铺砌的古朴山道，穿越茶园、树林，达前岗村，与该村辛亥革命志士俞丹屏出资修建的环村石板路连接。村北登覆卮山顶的古道，今已整修为青石游步道。覆卮山是古始宁县最高峰，明弘治《嵊县志》载："谢灵运尝登此山，饮罢覆酒卮石上，故名。"谢灵运游山曾作《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

(2)反映魏晋遗风、隐逸文化的相关遗存。魏晋南北朝时期，剡县成了北方士族的避难胜地，更得到了王、谢等名门望族的青睐，在此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观——魏晋风度。这些文人士子盛行清谈，追求脱离世俗、崇尚自然、纵情山水的隐逸生活，发生在剡溪的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典故就是最好的例证。唐朝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剡中地区留存的悠游吴山越水，"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的魏晋遗风恰好迎合了诗人回归自然、祈盼心灵超越的思想潮流，这也是那么多唐代诗人纷至沓来、形成浙东唐诗之路的原因之一。反映这类魏晋遗风、隐逸文化的相关遗存有王羲之墓及金庭观，华堂古村，炉峰庙，洗屐、砥流、招隐桥，艇湖塔，谢康乐钓台，强口井及谢仙君庙等。

王羲之墓及金庭观位于金庭镇华堂羲之新村。王羲之墓地现存明弘治十五年(1502)墓碑、碑亭，清道光墓道坊和墓道。宋高似孙《剡录》卷八《物外记·道馆》载："金庭观，在剡金庭山，是为崇妙洞天，金庭福地……旧为王右军宅，东庑设右军像，有书楼、墨池、鹅池。右军舍宅为观，初名金真馆，又名金真宫。"近年在旧址重建金庭观。每年春季于此举行盛大的国际书法朝圣节，迄今已十六届。

华堂古村是嵊州王羲之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保留着宗祠、更楼、民居、水圳、老街等一系列文物建筑，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其中华堂王氏宗祠(含大祠堂和新祠堂)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东晋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称病弃官，入金庭筑室隐居，卒后葬于金庭瀑布山麓，被奉为始祖，王氏后裔遂聚族居住于金庭华堂。

炉峰庙位于金庭镇济渡村，为纪念东晋名士、文学家、玄言诗人代表许询(字玄度)而建。许询慕剡之山水，自萧山徙居剡东金庭济渡村，与好友王羲之为邻，其宅曰"知己寺"。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有句"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诗句中的"王、许"指的就是王羲之和许询。后人为纪念许询，在知己寺东建许家庙(即今炉峰庙)。

洗屐、砥流、招隐三桥位于崇仁镇逵溪村。戴逵，字安道，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中年定居剡县之剡山今戴望一带。戴逵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尤精雕塑。首创"夹纻"漆艺雕塑佛像，是我国美术史上一位

卓有成就的雕塑家，有“雕圣”之誉。戴逵曾于逵溪之雨花山滴水岩筑有别业。后人为纪念戴公，将所在村庄和溪流均以逵溪命名，村人又于逵溪之上砌筑石桥纪念戴逵。洗屐、砥流、招隐三桥均系单孔石拱桥，顺流而下，以500米、200米的间距，南北走向架于逵溪之上。现存石桥均为清代晚期建筑。

艇湖塔位于剡湖街道艇湖山巅，为“雪夜访戴”故事的发生地。东晋时，戴逵居剡县，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阴。一日，夜大雪，子猷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民国《嵊县志》记载：“自剡山以北五里许东出曰艇湖山（道光志作县东五里），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舟至此返，故名（名胜志），俗呼并湖。山上有塔，下有子猷桥、访戴亭（万历府志），艇湖今淤为田（同治志）。”从此段记载中，我们可知王子猷是在艇湖山下返还的。艇湖一带旧有“子猷桥”“访戴亭”，古迹今存艇湖塔。艇湖塔系楼阁式砖塔，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知县谭潜建，明崇祯七年（1634）知县方叔壮重建。

谢康乐钓台，位于三界镇嶀浦潭。郦道元《水经注》载：“嶀山东北太康湖，晋车骑将军谢玄旧居所在……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山有三精舍……江有琵琶圻，临江有石床，名钓鱼台。”宋《剡录》卷四《古奇迹》又记：“嶀山下有石床，康乐尝垂钓于此。”嶀浦潭有一块临江凸出的如床巨石，随着水位高低出没于江面，相传为钓台旧址。

强口井及谢仙君庙，均位于仙岩镇强口村。宋《剡录》卷四《古奇迹》载：“世传王谢诸人，雪后泛舟至此，徘徊不能去。曰：虽寒，强饮一口。”强口井井壁用自然块石叠砌而成，井水清澈可饮。井东侧百米有谢仙君庙。此庙于清同治年间拓建，惜毁于1991年火灾，现存庙宇系灾后重建。

（3）反映求神问仙、浙东佛宗道源的相关遗存。汉晋之际剡县人刘晨、阮肇两人去天台采药遇仙的神话故事，为历代文人雅士追慕、吟诵。葛玄、葛洪先后在西白山修道炼丹，开剡地道教之先河。东晋中兴时期，江南佛教形成了京都建康和剡县两大中心地。在求神问仙、佛宗道源盛行的大唐，剡地同样吸引了诸多诗人前来朝圣，抒发心迹，表达对道教圣地的仰慕和高僧大德的崇敬及追随之思，表现对求佛参禅、学道成仙愿望的追求。反映这一遗存的有阮庙、葛英葛仙翁丹井、崇仁葛翁井、瞻山庙、龙宫寺旧址等。

阮庙位于城南新区（三江街道）。传说东汉永平年间，剡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二仙女，留住半年，及至返乡，子孙已历七世。后人建庙奉祀。宋《剡录》卷四《古奇迹》载：“县之南有阮公庙，即故居也。”庙坐落在今阮庙自然村，现存大殿三间，北壁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启圣碑和道光三十年（1850）重建阮庙碑。庙边尚存古井一口，为清康熙年间所凿，井水清澈可饮。

三国时期著名道学家、丹师葛玄，号仙翁，道教尊为葛仙翁。宋《剡录》载：“剡有仙翁丹井、石梯、钓鱼台。”丹井遗址在今西白山东南麓，长乐镇山口葛英自然村西南，系葛仙翁入剡修炼时所遗。赵广信亦在此炼丹。丹井之上覆以一方巨石，南侧可供人弯腰入内。丹井水清澈、甘洌。丹井近旁有葛仙翁庙，山下有飞瀑高数十丈，岩壁上镌刻有清人品尝剡中泉水后留下的题刻“剡中第二泉”五个正楷大字。

崇仁葛翁井，位于崇仁镇六村老家庙东侧屋内，系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仁村建筑群之老家庙的本体构成部分。葛翁井为圆形井壁，用自然块石叠砌而成。相传，东晋道学家、医学家葛洪曾汲此井水炼丹，故名葛翁井。明中期建造老家庙时，为保护此井，便于村民公用，庙让井而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葛翁井的重要地位，以及旧时百姓处理公共设施的行为准则。

瞻山庙，位于崇仁镇廿八都村，主祀东晋时期结庐廿八都村瞻山之麓的高僧帛道猷。据传，高僧暮年入天台采药不返。后人寻其故址构一小祠以祀之，谓之“灵威王”。南宋乾道八年(1172)，迁祠于村东，并赐额曰“灵辉庙”，后改称瞻山庙。今存之瞻山庙系民国十八年(1929)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立首功之里人张伯岐出资重建，该庙现为嵊西一带民间影响较大的一处寺庙。

龙宫寺旧址，位于三界镇华发茶厂内。龙宫寺初建于梁天监二年(503)。民国《嵊县志》记载：“浙东观察使李绅少年寓此肄业，有绅所作碑存寺中。”“寺侧旧有李公垂书堂。”此碑即龙宫寺碑，《全唐文》卷六百九十四、《剡录》卷四等收录碑文。寺与碑今皆毁失，旧址现存古井一口、石柱残件若干及“剡溪”残碑一方。另有清道光年间龙宫寺碑拓片传世。

(4)反映古代民俗、物产和秀异山水的相关遗存。山水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人们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为基础，以描绘山川名胜、自然风物为主写景抒情。风流倜傥的唐代诗人喜欢遍游名胜古迹，吟诗弄文。而在唐代，剡县是浙东重地，正如杜甫《壮游》中写的那样：“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剡县在当时名望颇高。反映这类古代民俗、物产和秀异山水的嵊州段沿线相关文物遗存，主要包括禹后庙、始宁城隍庙、嶝浦庙、嵊县古城墙、嵊县城隍庙等。

禹后庙位于剡湖街道里坂村。嵊州的大禹治水遗迹有禹余粮岭、甑山、了溪、禹王庙、禹后庙等。宋《剡录》卷四《古奇迹》载：“禹余粮岭，在了山。山下为了溪。王铿序言：‘禹治水止于此。山中产药，称禹余粮，盖余食所化。近有甑山，谓尝炊于此。’”古迹今存禹王庙记碑、禹后庙。禹王庙原在剡湖街道禹溪村东，后建为村校，现仅存清道光十九年(1839)禹王庙记碑一块，收藏于文物管理处。禹后庙现存建筑建于明崇祯年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

始宁城隍庙位于三界镇北街村北面。东汉永建四年(129)，析剡县北乡及上虞县南乡，置始宁县，县治在三界镇。民国《嵊县志》载：“始宁城隍庙在三界古始宁治也。”庙创建于东汉。东晋咸和年间，中原士族迁隐于始宁者甚多，以谢氏一脉为著。隋开皇九年(589)，废始宁县归并会稽县。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洪水决堤，大坏民居，今之大江即古之始宁官巷也，由是县治废而神祠尚存。民国三十六年(1947)，日军纵火毁庙，仅存寝殿三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失火烧尽。1949年，重建城隍庙钟鼓楼，是始宁建县的历史见证。

嶝浦庙在三界镇嶝浦招士湾自然村村东小山上。南宋《嘉泰会稽志》载：“庙在县北四十五里，以祀陈长官。”郦道元《水经注》云：“庙甚灵，邑有水旱必先致祷。”庙创建较早，宋庆元、嘉定及清嘉道年间多次重修，见于志书记载。现存庙宇大殿为清代晚期建筑，余为近年重建。

嵊县古城墙位于嵊州市区，宋《剡录》载：“剡县治在江东，吴贺齐令，始移今治。”可知三国吴贺齐为剡令时，县治自江东迁今址，并建城筑墙。唐末裘甫起义军曾据守剡县

对抗唐军，在剡县建立政权，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今存城墙主体乃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吴三畏寻故址临溪沿山而筑。现尚存南侧部分城墙，残长1001.20米，高约3.80米，宽5.18米，内外侧均用条石砌筑。古城墙是见证嵊州建县历史的标志性建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嵊县城隍庙，位于嵊州市区鹿胎山东南麓。南宋《嘉泰会稽志》、清乾隆《嵊县志》云："在县西五十步，创建失考。"说明至迟在南宋嘉泰年间已经存在。元、明、清各朝几经修葺和重建。其中，明万历四年(1576)知县谭礼建仪门及东西厢房，清康熙八年(1669)知县张逢欢重修。清嘉庆九年(1804)重建，东为听雪山房，前为溪山第一楼，全览剡中之胜。城隍庙及溪山第一楼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戏台为重檐歇山顶，整组建筑以砖、石、木三雕精美著称。

2. 沿线文物遗存统计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浙东唐诗之路沿线文物古迹在保护级别、分布区域、始建年代、文物类别和价值内涵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

(1)保护级别。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等级从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省级文保单位、市级文保单位、市级文保点到三普登录点，各保护级别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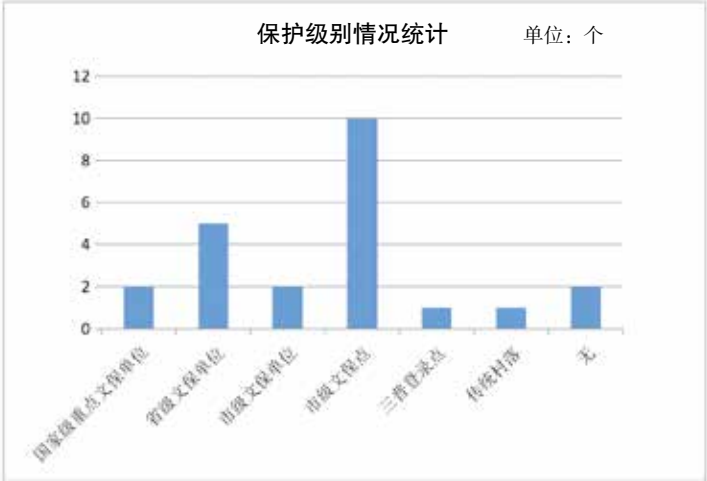


图1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保护级别情况统计

(2)分布区域。从地域分布来看，浙东唐诗之路相关文物数量较多的依次是三界、剡湖、崇仁和金庭四个乡镇(街道)，这四个乡镇(街道)的浙东唐诗之路文物遗存占到了全市文物遗存总量的五分之四，特别是三界镇，占到了全市唐诗之路文物遗存总量的三分之一，凸显其在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的重要地位。仙岩镇、下王镇虽然看似文物数量不多，但其作为剡溪沿线的乡镇，和浦口街道(经济开发区)一样，应该在今后多开展对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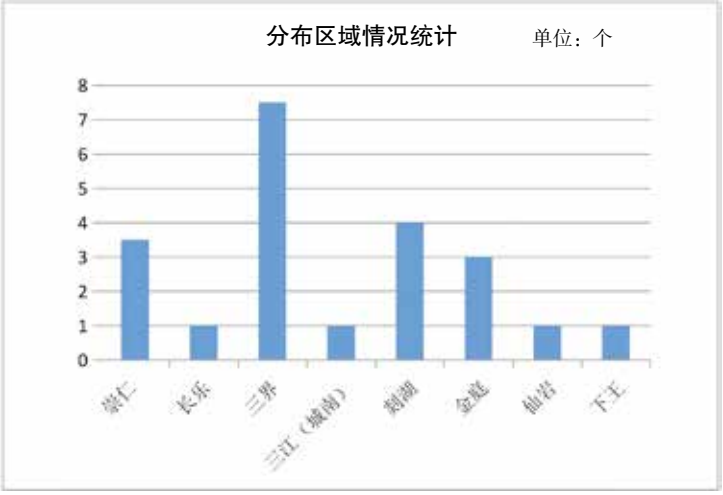


图2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分布区域情况统计

(3)始建年代。从文物始建年代的统计结果来看，始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代的文物遗存有葛英葛仙翁丹井、始宁城隍庙、强口井、王羲之墓及金庭观、敕书岭古

道、谢康乐钓台、覆卮山古道、龙宫寺旧址、石门岭古道、嵊县古城墙等，文物数量较多，证明嵊州拥有足够丰富的文物资源来支撑浙东唐诗之路的相关研究和利用工作。同时，宋代特别是南宋，浙东属于政治和经济中心，文化昌明，明、清两代和民国距今年代较近，也有大量文物得以保留。

(4) 文物类别。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相关文物遗存的类型较为丰富，驿站古道以及沿线文人留下的摩崖石刻等相关文物，能够反映当时的交通线路。寺庙建筑、寺观塔幢、城垣城楼等文物，体现的是当时嵊州地区极大的文化魅力，是浙东唐诗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和历史遗迹。墓葬文物、传统民居、池塘井泉等文物，则是以王羲之、戴逵、谢灵运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雅士来此游历、定居的印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我们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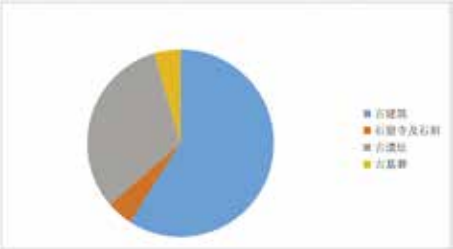


图 3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类别情况统计

四、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存在问题及保护利用建议

由于年代久远，浙东唐诗之路上诗人们吟诵的、历代方志和相关史料记载的亭台楼阁、风物景致绝大多数已经不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幸运留存下来的以上这些文物，也在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中，日益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挑战，变得岌岌可危。

1.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遗存损毁原因

(1)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嵊州境内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剡溪横贯其中，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貌构成大体为“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样的地形地貌加上人类对植被的大面积破坏、雨水多集中于夏季、多台风等特点，易发生洪涝灾害。历史上桥梁被毁、木构房屋倒塌现象时有发生。如嵊州留存下来的桥梁最早不超过明代就是一个例证。

(2) 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水路逐渐被陆路取代，人挑马驮逐渐被汽车运输所淘汰，近现代的公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扩建，并串联起沿线的古村落和古建筑，那些蜿蜒的河道和驿站古道因此而废弃。如敕书岭古道、覆卮山古道由于年久失修，部分路段已遭水毁或被植物遮蔽，路廊等相关建筑已基本不存。石门岭古道局部路段损坏或被现有公路覆盖，特别是石门岭古道自石门村向西南经石门至沸水水库一段，已在修筑马路时毁坏殆尽。

(3) 人为破坏。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迅猛发展，剡溪两岸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和人口爆发式增长后对资源的过度索取，给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及周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带来了巨大影响。另外，管理缺失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酸雨等，也给古建筑带来致命的打击。如：强口井原真性存在问题，已失古风；华堂古村重点区域现代民居高楼影响古村环境风貌；嶀浦庙、阮庙大殿为清代古建筑，其余重建部分已失古建筑风貌；禹后庙主体建筑油漆太新，有失古朴，两侧厢房倒塌被改建；谢仙君庙毁于 1991 年火灾，现存庙宇系灾后重建；嵊县城隍庙石雕年久风化，目前缺乏延缓风化的现代科学手段，无根本性解决办法；等等。

2.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保护利用建议

(1) 系统规划。在田野调查、摸清现状的基础上，以设计中的《浙东唐诗之路核心区（嵊州）旅游总体规划》为总纲，

尽快编制完成《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保护规划》方案，并根据文物的残损程度与保护的急迫性，有计划地开展对各个文物遗存项目的修缮设计方案、保护利用和周边环境整治方案的编制工作。

(2)加快修缮。对于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的保护修缮，建议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措施，停止并逆转因自然、历史和人为等因素对文物造成的损伤，制止新的破坏，并尽可能恢复、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在修缮过程中，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此外，还要对其周边的整体环境实施大面积整治和保护，尽量把它定格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对日渐湮没的始宁城隍庙、强口井、嶝浦潭、石门山、敕书岭古道等加快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已经埋没的历史遗存进行恢复重建，如始宁墅、金庭山第二十七洞天金庭崇妙洞天等。

(3)综合开发。文旅融合，将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遗存融入旅游线路。“不走唐诗路，不识唐诗美”，要积极结合嵊州段沿线文物推出研学游、考古游、体验游、修心游等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市内外游客重走浙东唐诗之路，重吟唐诗之韵。通过将嵊州段沿线文物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具有高端文化品位的黄金旅游线。

附录

浙东唐诗之路嵊州段沿线文物遗存汇总表

序号	名称	保护级别	地址	始建年代	现存年代	类型	子类	内涵
01	葛英葛仙翁丹井	文保点	长乐镇山口葛英自然村西南	三国吴		古建筑	池塘井泉	佛宗道源之道教文化
02	崇仁葛翁井	国保单位保护本体	崇仁镇六村老家庙东侧屋内	至迟明中期		古建筑	池塘井泉	佛宗道源之道教文化
03	嶝浦庙	文保点	三界镇嶝浦招士湾自然村村东小山上	南朝	清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儒家文化
04	嶝浦潭摩崖题刻	文保点	三界镇嶝浦潭	南宋		石窟寺及石刻	摩崖石刻	儒家文化、交通线路
05	始宁城隍庙	文保点	三界镇北街村北面	东汉	民国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儒家文化
06	强口井及谢仙君庙	文保点	仙岩镇强口村	东晋		古建筑	池塘井泉 寺庙建筑	儒家文化
07	艇湖塔	省保单位	剡湖街道艇湖山巅	明		古建筑	寺观塔幢	儒家文化
08	洗屐、砥流、招隐桥	市保单位	崇仁镇逵溪村	待定	清	古建筑	桥涵码头	儒家隐逸文化

续表

序号	名称	保护级别	地址	始建年代	现存年代	类型	子类	内涵
09	瞻山庙	省保单位	崇仁镇廿八都村	宋之前	民国	古建筑	寺庙建筑	佛教文化
10	王羲之墓及金庭观	省保单位	金庭镇华堂村	东晋	明清	古墓葬	名人或贵族墓	儒家隐逸文化
11	华堂古村	中国传统村落（含一处国保单位）	金庭镇华堂村	宋—清		古遗址	传统民居	地方经济与文化
12	炉峰庙	市保单位	金庭镇济渡村	待定	清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儒家隐逸文化
13	敕书岭古道	文保点	三界镇车骑山村、剡东村	东晋—南朝宋		古遗址	驿站古道遗址	交通线路
14	谢康乐钓台	无	三界镇嶝浦潭	东晋—南朝宋		古遗址	其他古遗址	儒家隐逸文化
15	覆卮山古道	文保点	下王镇前岗村	东晋—南朝宋		古遗址	驿站古道遗址	交通线路
16	阮庙	文保点	城南新区（三江街道）阮庙新村	宋之前	清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地方经济与文化
17	禹后庙	文保点	剡湖街道里坂村	明	清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地方经济与文化
18	龙宫寺旧址	无	三界镇华发茶厂内	南朝梁		古遗址	寺庙建筑	佛教文化
19	石门岭古道	文保点	三界镇祝岙村、崇仁镇石门村	东晋—南朝宋		古遗址	驿站古道遗址	交通线路
20	嵊县古城墙	省保单位	剡湖街道老城区	三国	明代	古遗址	城垣城楼	地方经济与文化
21	嵊县城隍庙	省保单位	剡湖街道鹿胎山东南麓	宋之前	清	古建筑	寺庙建筑	儒家文化
22	泰平桥	三普登录点	三界镇嶝浦招士湾自然村	待定	清	古建筑	桥涵码头	交通线路

浙江绍兴江桃村东晋墓发掘简报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王　策

摘　要：2020 年 2 月，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街道江桃村门前山一座三国砖室墓被盗，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在对被盗古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在三国墓的西南侧发现一座东晋墓，早年修建高压线塔时墓葬北端被破坏。此墓为单室砖墓，平面呈“凸”字形，发现“×”纹、胜纹、人面纹等墓砖，出土青瓷文物 1 件。该墓葬的发掘为杭绍地区东晋时期墓葬结构特征和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绍兴　东晋晚期　人面纹　胜纹

2020 年 2 月，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街道江桃村门前山一座三国“嘉禾三年”砖室墓被盗，柯桥区博物馆工作人员随即对被盗墓葬（编号 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①]。在发掘的过程中，在 M1 的西南侧 10 米处发现一座东晋砖室墓（编号 M2），北端甬道和封门处在早年修建高压线塔时被破坏。出土青瓷文物 1 件，发现“×”纹、胜纹、人面纹等纹饰墓砖。M2 位于萧绍交界地带，西距区界 3.5 千米，杭衢高速绍兴连接线从墓前山下经过。（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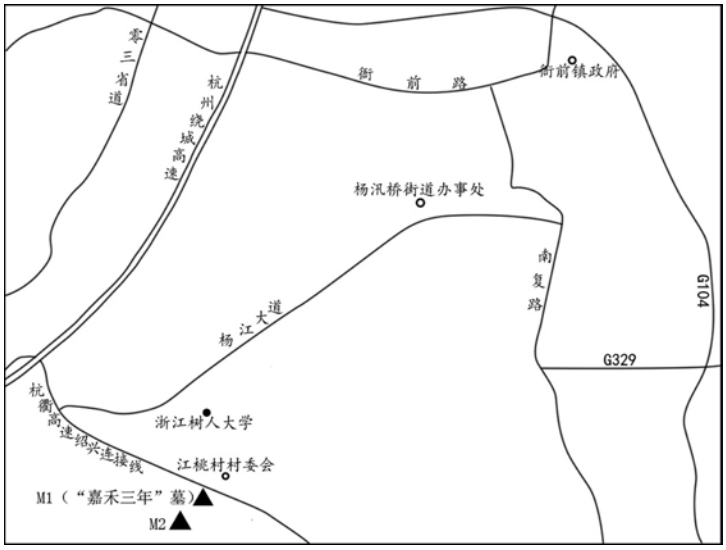


图 1　江桃村东晋墓 M2 位置示意图

现对 M2 介绍如下。

一、墓葬形制

M2 位于江桃村门前山北坡半山腰上，地表南高北低，墓底南端距地表 3.80 米。坐南朝北，方向 30°。（图 2）南北残长 4.31 米，东西宽 1.43 米，残高 1.22 米。平面呈“凸”字形。自北向南依次为甬道、墓室。甬道和墓室顶部已无存，由残存的刀形砖、楔形砖可推知，甬道和墓室均为券顶。排水沟、封门、甬道前部均在后期建高压线塔时破坏无存。（图 3）墓内填土为扰乱过的黑灰色杂土，较为疏松，含有较多的碎砖、石子和植物根茎。墓圹修造规整，光滑较硬，颜色发黑，其上发现先民用工具的痕迹（图 4），长 0.05 米，宽 0.07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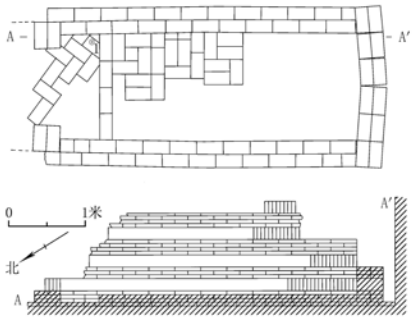


图 2　M2 平、剖面图

图 3　M2 发掘现场（北—南）

图 4　M2 墓圹西壁工具痕迹

1. 甬道

已严重破坏，仅存与墓室相接处少量墙体。形制不明，残长 0.34 米，南宽 1.02 米，北宽 0.99 米，东壁残高 0.31 米。系在墓室东西两壁北端各内收一砖的宽度形成甬道。砌法是在铺地砖上三顺一丁起基，其上无存。与两侧墓壁底部砌法相同，并与墓壁相互咬合。券顶已毁。底铺一层斜“人”字形地砖。

2. 墓室

墓室南壁外弧较甚，东西两壁稍外弧，平面略呈弧边长方形，内长 3.88 米，内宽 1.43 米，残高 1.22 米。

墓室墓壁、券顶均被盗扰毁坏，仅存东、西两壁中部部分直壁，前、后两壁保存较差。直壁砌法为三顺一丁 2 组加四顺一丁 1 组，其上四层顺砖，第四层系刀形砖，开始微微内收起券，其上尚存丁砖一层。

铺地砖与甬道相同相连，亦为长方砖斜“人”字形平铺。

距前壁 0.51 米处至后壁砌出与墓室等宽的棺床，长 3.37 米，高 0.10 米。棺床分上下两层。上层无甚规律，系用长方砖纵横相垂直铺砌，三块一组的长方形青砖一横两纵平铺居多，厚 0.05 米，北端用一行长方形青砖平铺。（图 5）下层未发掘，铺法未知。

图 5　M2 棺床(南—北)

墓室和甬道均为双层砖壁,丁砖为整砖。

二、墓砖形制与纹饰

墓葬用砖分为长方砖、刀形砖和楔形砖三种。

长方砖为 M1 的主要建筑材料。规格相同,长 34 厘米,宽 17 厘米,厚 5 厘米。用于墓壁、棺床、墓底。

刀形砖用于墓内券顶部分。一种稍薄,长 33 厘米,宽 17 厘米,厚 3.5~4.0厘米;一种稍厚,长33.5厘米,宽 17 厘米,厚 5~7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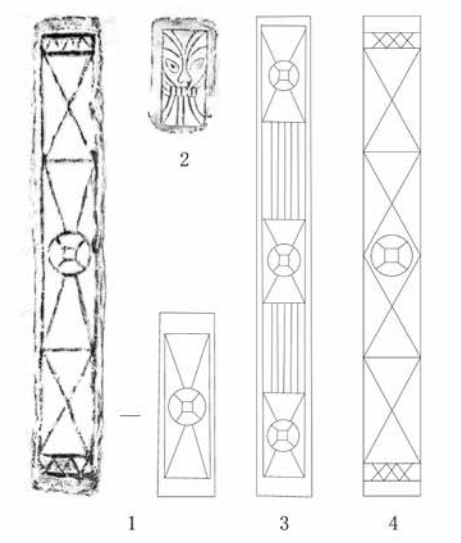


图 6　M2 墓砖拓片及线图
1. 胜纹、双“×”锯齿纹 2. 人面纹 3. 三胜纹间平行线纹 4. 四“×”间钱纹

扰土内发现数块楔形砖,原应用于起券,长 33.5 厘米,宽 9~16 厘米,厚 5 厘米。

每块墓砖上都模印有纹饰,均为阳文,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Ⅰ类:形制为长方砖。砖的顶面和底面印有绳纹,砖的一侧模印胜纹和双“×”锯齿纹,一端面模印胜纹(图 6-1),另一侧和另一端面无纹饰。

Ⅱ类:楔形砖。砖的顶面和底面印有绳纹,砖的一侧模印胜纹和双“×”锯齿纹,窄端面模印人面纹(图 6-2)。人面眼、眉斜立,有水滴状眼眶,长方形口,露五齿,口部左右及其下有飘扬的胡须,胡须向上弯曲,蒜头鼻,鼻梁细长,上端作树枝状,雄健威武。另一侧和宽端面无纹饰。

Ⅲ类:刀形砖。砖的顶面和底面印有绳纹,一种在砖的薄侧印有三胜纹间平行线纹(图 6-3);另一种在砖的薄侧印有四“×”间钱纹(图 6-4)。厚侧和两端面无纹饰。

三、出土器物

墓主尸骨及葬具不存。该墓遭严重盗掘及后期破坏,随葬品洗劫一空,仅在墓室前部靠棺床处的东侧出土青瓷水盂 1 件。

青瓷水盂　1 件。M2:1,敛口,圆唇,弧肩,鼓腹,下腹斜收,假圈足微外撇,平底内凹。口沿下饰凸弦纹一道。灰白胎,除外底外,内外满釉,胎釉结合紧密,釉色青绿莹润。器底呈现赭石红并有 4 个较大的泥点支烧痕。口径 8.4 厘米,

图 7　青瓷水盂(M2:1)

图 8　青瓷水盂外底(M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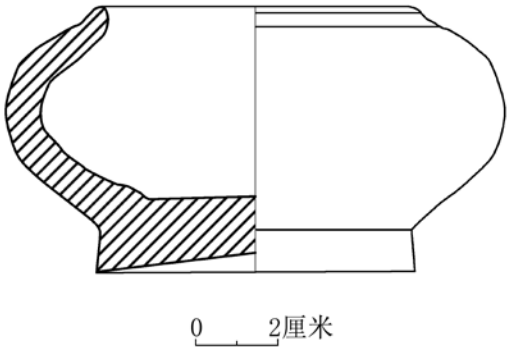


图 9　青瓷水盂剖面图(M2:1)

底径 8.6 厘米,高 7.3 厘米。(图 7—9)

四、结语

关于墓葬的年代,M2 未发现有确切纪年的墓砖。通过对墓葬形制结构、墓砖纹饰、出土器物造型及时代特征的分析,结合考古资料,可以推断出该墓的大致年代。青瓷水盂 M2:1 与新昌县岭脚村东晋“太元十年(385)”墓[2]青瓷水盂形制基本相同。相较于新昌县张家庄村西晋“永康元年(300)”墓[3]、大岙底村东晋“大兴三年(320)”墓[4]出土越窑青瓷水盂,M2:1 已经呈现假圈足、腹径缩小、肩部斜方格纹消失、通体施釉、釉色青绿、外底有 4 个泥点支烧痕等东晋晚期青瓷水盂特征。M2 墓室呈三壁略外弧的长方形,与慈溪市窑头山东晋“太元十六年(391)”墓[5]类似。棺床用长方砖纵横垂直铺砌,墓室两壁各缩减一砖宽度砌筑甬道的做法与嵊州市上高村东晋“义熙二年(406)”墓[6]类同。墓砖上的胜纹与杭州市老和山东晋“兴宁二年(364)”墓[7]基本相同。“×”纹、平行线纹也见于慈溪窑头山东晋“太元八年(383)”“太元十六年(391)”墓[8]。综上所述,M2 的年代应为东晋晚期。

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彩陶盆上已出现人面鱼纹。[9]商周时期,青铜鼎[10]、青铜短剑[11]、青铜钟[12]等青铜器上也出现了人面纹。战国时期的齐临淄城、燕下都遗址开始出现人面纹瓦当。[13]六朝时期,南京出土的人面纹瓦当最多,时代上限是孙吴中后期,下限到东晋初期,东晋时期逐渐被兽面纹瓦当取代。[14]孙吴两晋时期墓砖上多见兽面纹或人像纹(人形纹)[15],人面纹墓砖比较罕见,在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16]、福建南安丰州东晋“咸和元年(326)”墓[17]和福建厦门下忠晚唐薛瑜墓[18]中曾有发现。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有学者认为是借助巫师形象表现半坡文化的神徽。[19]有学者根据铭文考证青铜鼎上的人面纹为后稷。[20]南京出土瓦当上的人面纹,学者推测与佛教人物有关,是佛僧讲经时经师与听众之间情感互动时自然情绪的表现。[21]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具有灭火之术的某位神灵”的形象。[22]厦门下忠晚唐薛瑜墓出土的人面纹墓砖,发掘者认为极可能是墓主形象。[23]M2 出土的人面纹墓砖,线条流畅,组合协调,在平面上以简洁的线条构图,融写实性与夸张性于一体,富含文化意蕴。其眼睛斜立,面部布满胡须,又近似绍兴本地西晋墓砖上的兽面纹,应从兽面纹过渡而来,其性质当为祈福治鬼镇墓之用,其造型寓意与纹饰内涵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

胜纹是伴随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而出现的一种纹饰。

《山海经·西山经》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24] 胜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头饰。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及图像资料可以确定，篆体的"五"字中央加一个形如方孔钱币的图像，就是文献中所称的"胜"。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常见装饰胜纹的墓砖。墓砖上模印胜纹，是西王母信仰的反映，是对西王母形象的简化，不仅具有辟邪与吉祥的功能，还是祥瑞的象征。[25]M2 墓砖上遍饰胜纹，表达了祝愿亡者安定幸福及子孙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江桃村东晋墓墓砖上的人面纹、胜纹等图像为了解和认识六朝时期的思想意识、丧葬习俗与宗教信仰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萧绍地区早期开发历史和当时物质文化面貌及社会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意义。

（附记：参加本次发掘人员陆菊仙、王策；拓片周燕儿；绘图、摄影任金娜）

注释：

①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浙江绍兴江桃村孙吴"嘉禾三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 年第 4 期。

② 新昌县文管会：《浙江新昌东晋墓》，《考古》1993 年第 5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纪年墓与纪年瓷·绍兴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第 351 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纪年墓与纪年瓷·绍兴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第 254 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纪年墓与纪年瓷·绍兴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第 305 页。

⑤ 慈溪市文管会、宁波市博物馆：《浙江慈溪窑头山东晋纪年墓清理》，《东南文化》1992 年第 1 期。

⑥ 孙金玲：《嵊州市东晋义熙二年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六十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⑦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晋兴宁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7 期。

⑧ 慈溪市文管会、宁波市博物馆：《浙江慈溪窑头山东晋纪年墓清理》，《东南文化》1992 年第 1 期。

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第 110—111 页。

⑩ 王树金：《商代大禾人面纹铜方鼎》，《中国中小学美术》2019 年第 8 期。

⑪ 高西省：《西周扁茎人面纹铜短剑初论》，《文博》1997 年第 2 期。

⑫ 潘汁：《西汉人面纹羊角钮铜钟》，《民族艺术》2016 年第 2 期。

⑬ 王飞峰：《汉唐时期东亚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纹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 7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⑭ 王志高，马涛：《论南京大行宫出土的孙吴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文物》2007 年第 1 期。

⑮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考古》2008 年第 11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嵊州市祠堂山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王屹峰，施加农：《浙江萧山航坞山晋墓》，《南方文物》2000 年第 3 期。

⑯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第 4 期。

⑰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东晋、南朝、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 年第 6 期。

⑱ 郑东：《福建厦门市下忠唐墓的清理》，《考古》2002 年第 9 期。

⑲ 马雨林：《人面鱼纹新解读——兼谈对人面鱼纹盆的评价》，《中国文物报》2021 年 7 月 20 日第 006 版。
⑳ 李茜，吴卫：《大禾人面纹方鼎的文化意蕴》，《艺术百家》2010 年第 7 期。
㉑ 梁白泉：《你是谁？人面纹瓦当四问》，《艺术学界》2012 年第 2 期。
㉒ 王志高，马涛：《论南京大行宫出土的孙吴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文物》2007 年第 1 期。
㉓ 郑东：《福建厦门市下忠唐墓的清理》，《考古》2002 年第 9 期。
㉔ 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6 页。
㉕ 冉万里：《说“胜”》，《西部考古（第 8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44 页。

刘宗周绍兴府城旧居考

绍兴市越城区文物局　张　慧

摘　要：根据《刘宗周年谱》的生平记载，梳理刘宗周绍兴府城旧居主要有四处，分别是祖居及出生地水澄巷、暂居地武勋坊、僦居地陈思石宅、筑楼地蕺山。结合绍兴地方文史资料、绍兴方志及实地调查采集的口述历史资料，考释四处刘宗周绍兴府城旧居现存情况。

关键词：刘宗周　绍兴府　刘宗周旧居

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明万历进士，晚明理学家。刘宗周是“阳明后学”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蕺山学派创立人。明万历六年(1578)，刘宗周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水澄里。幼年在道墟外祖家生活、读书，返乡后主要居住在绍兴府城内，晚年讲学于蕺山之下，被称为蕺山先生。关于刘宗周在绍兴府城(今绍兴古城)内的旧居说法较多，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考证。本文以刘汋《蕺山刘子年谱》(以下简称“《刘谱》”)、姚名达《刘宗周年谱》(以下简称“《姚谱》”)为主线，综合地方文献和实地调查，对绍兴府城内几处刘宗周旧居进行梳理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刘宗周故居”说

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越州升置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附于府城。绍兴府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建设，至明清时期，城内格局和衢路设置稳定，城河环绕之内就是现在的绍兴古城，这利于我们结合早期的地图较为准确地判断明代刘宗周府城内居所的方位。

对刘宗周的研究，学界多关注刘宗周哲学思想、学术性格和王学、蕺山学等学派理论，几乎没有针对刘宗周旧居、故居的研究。绍兴地方文史、文物专家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究。经阳明研究学者张炎兴教授的梳理，目前关于绍兴古城内的“刘宗周故居”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为延安路刘家台门；其二，为西小路胡家台门，认为即西小路 3 号；其三，为西街 18 号。

“延安路刘家台门”说。《绍兴市志》如是记载：“位于延

安路。俗称刘家台门。台门为明代建筑，坐北朝南。现存三进，均为五开间，第三进为楼屋。一说刘宗周故居在今西小路。”[①]

“西小路”说。《越中揽胜》这样写道：“西小路胡家台门后面有池，据传乃明末刘宗周为嫁女儿而掘，名送嫁池。”[②]“西小路3号（今胜利西路437号）”说。1983—1985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由原绍兴市文物管理局调查定名为刘宗周故居。可惜管理机构几度拆并，人员更替，原始调查资料已无可查。

“西街18号”说。最早也出自《越中揽胜》的记载：“厅上原悬‘一代完人’匾额，‘文革’中被毁。门前旧有‘明末遗臣刘念台先生故里’石碑一块，近年建路时拆去。”[③]后来也有《绍兴名人传略》《刘宗周研究》等论著提出相同观点，皆引用结论，没有证据补充。现在民间都称西街18号为刘宗周故居，但可惜所提的两件重要实物已不存。

以上三处“故居”是目前仅有的关于绍兴府城内刘宗周旧居与故居的研究考证。

二、刘宗周在绍兴府城内的几次迁居

（一）祖居及出生地水澄巷

水澄刘氏，“始迁：刘文质，元大德中以幕官来越，始居水澄巷，今属城中镇”。[④]刘文质长子瑞卿（大宗）传后至三代而绝，由次子瑞吉（小宗）之后进承。瑞吉（小宗）又分为华三、华五两宗，“华三之后世居郡城水澄里，即所谓水澄刘氏也”[⑤]。《姚谱》记载：“明神宗万历六年戊寅春正月二十六日卯时，刘宗周先生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水澄里。”[⑥]《刘谱》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冬十一月，还水澄旧里。”[⑦]《姚谱》记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先生以饔飧不给，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赡。十一月，始自麻溪还居城中水澄旧里。”[⑧]水澄刘氏世居水澄巷，刘宗周出生于此，二十六岁返乡也居住在此，是水澄刘氏后裔小宗十一世。

（二）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三十九年（1611）居于武勋坊

《姚谱》记万历三十六年（1608）：“是年，先生迁居武勋坊。”[⑨]《刘谱》记万历三十九年（1611）：“冬十月，迁居蕺山之麓。先是，戊申，先生迁居武勋坊，至是自武勋坊迁居蕺山之麓。”[⑩]刘宗周曾在武勋坊居住两年。武勋坊自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设立，属山阴县界第四厢下20坊之一。坊名延续至今，现称武勋坊路。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绍兴府城衢

《绍兴府城衢路图》［清光绪十八年（1892）］

路图》,武勋坊(路)东接西小路,东有古武勋桥,北有送嫁池。

(三)万历三十九年(1611)迁居蕺山之麓

万历三十九年(1611),刘宗周迁居蕺山之麓。“婿陈刚祖思石公以先生无栖椽,乃辑室以迎先生,仍遗之僦钱以居。”[11]《姚谱》记万历四十三年(1615):“解吟轩在先生所居屋后,为门人朱昌祚别业。先生僦居于所亲陈思石,仅足蔽风雨,无余房可为诵读处,故昌祚延先生之轩中,朝夕讲论。”[12]刘宗周迁居蕺山是租住女婿陈刚祖父陈思石的屋宅,但屋小局促,无处读书,便在屋后朱昌祚别业解吟轩中与求教之人讲论。朱昌祚病逝前,曾将解吟轩赠予刘宗周,刘宗周再三推辞,并在晚年出郭前交还朱昌祚继孙天植房契,嘱咐道:“绵之病中,吾再三辞却,今日绵之死,我何敢负之于地下乎?”[13]当时,刘宗周已绝食数日,但仍挂念解吟轩的归处,让天植和其岳父共同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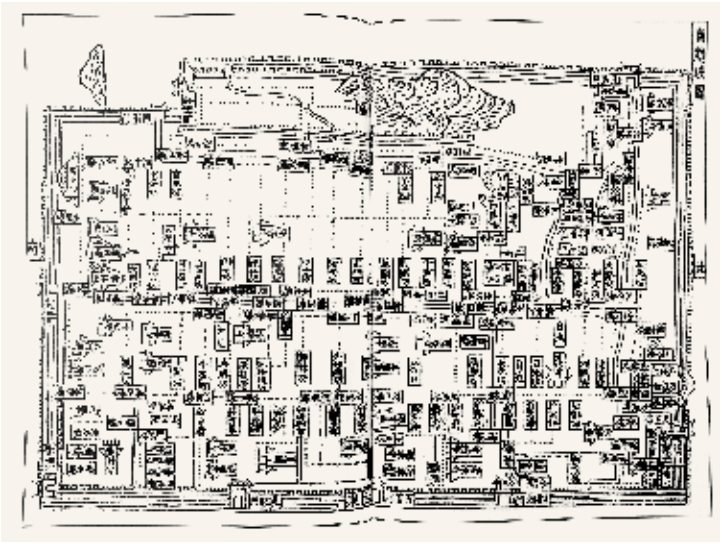
(四)构筑蕺山小楼

“先生构小楼于蕺山之麓,读书其中,书壁帖曰:‘读书有要,在涵养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从己出;做人有方,只谨凛幽独以防未然之欲,庶时时还于兽门。’”[14]“其堂联曰:‘门以内,和气蒸蒸,式表宜家之德;鸡既鸣,善端惺惺,时严作圣之几。’廊柱联曰:‘潜伏孔昭,凛神明以对越;物来顺应,体天理之周流。’书斋联曰:‘每于独觉还真觉,敢谓凡心即圣心。’又曰:‘道证形而下,心求良以前。’又曰:‘过而能改,圣;心因无用,神。’先生平生未尝有嗜好,即有以书籍贽者,如义不可受,先生亦不受。笔墨之类,适用而已。晚年辑书,稿本以废书覆折而用之。一小几,以之为书案,即以之为食案。又无书室,每就檐前著述,米盐杂处,风日倾薄,而先生安之。食不重味,衣不加采,惟冬日复襦及絮被用缯,其他裳裤之类及内襗外袍,终身未尝以寸帛加体也。”[15]据《刘谱录遗》,刘宗周僦居之外,确有营建家宅于蕺山之麓,建筑应包括厅堂,且有廊,但不论建造布置,还是生活起居,仍是克勤克俭,绝不奢侈。与其说小楼是安身的家,不如说是一处读书悟学的书斋更为恰当。

三、几处“刘宗周故居”与迁居地考

(一)水澄巷的“刘宗周故居”考

“家史氏曰:邑幕公卜居水澄,盖郡城中风气最胜处。形家者言,城南二水,从南石匽水偏两郭门入,北流数里,至此交会,其水澄泓不流,故名。”[16]据明万历十五年(1587)“今门都赐曰都泗,偏门曰水偏,常喜曰常禧,亦曰岸偏,殖利曰南堰,迎恩曰西郭,三江曰昌安。都泗、五云、东郭、稽山隶会稽;南堰、水偏、岸偏、西郭、昌安隶山阴”[17]和《旧越城图》[明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刻本],南堰(南石匽)即现在城南大桥一带,水偏即现在廊桥一带,两处城门现已不存,但河道



《旧越城图》[明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刻本]

仍在，城南两水交会处约是现在胜利路，东端胜利路口位置有水澄坊、古水澄桥的记载。又据《绍兴市志》："胜利路旧称水澄巷，与解放路成'丁'字街，东西向，东起水澄巷口，向西经仓桥、大木桥、鲤鱼桥、锦鳞桥、府山桥至西环城路，全长1310米。原为临河石板小路，民国35年(1946)，水澄巷口至仓桥段改为宽5至6米沥青路；仓桥以西至府山桥为碎石路。1953年，填水澄巷河，水澄巷口至鲤鱼桥改为沥青路；1958年，改鲤鱼桥至府山桥为沥青路面；1965年，路幅拓宽至12米。1988年，尽拆仓桥至府山桥段南侧民居，全线拓宽，行车道12米，并于胜利路与环山河之间设置绿化带。"[18] 尔后胜利路沿街传统建筑相继拆整殆尽，水澄旧里难寻踪迹。

（二）西小路胡家台门与西小路3号的"刘宗周故居"考

据《绍兴县城区地籍图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位于送嫁池北有"胡家台门"字样的记载。当时西小路12号（今西小路71号）的业主为胡永棠，其屋宅占地面积很大，坐西朝东。宅邸西接送嫁池，符合"西小路胡家台门后面有池"的描述，池北有大片胡永棠等胡氏名下田地。原籍胡家台门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越中揽胜》提到胡家台门与送嫁池，是因送嫁池后被填埋，而胡家台门建筑尚有部分遗存。以胡家台门标志送嫁池原来位置，后人因此理解为刘宗周曾住西小路胡家台门，实为误解。

西小路3号位于西小路口，与胡家台门并不是同一处建筑。现在常将西小路胡家台门与西小路3号合称为"西小路3号胡家台门"，也是一种误解。西小路3号为明代晚期

西小路3号座楼

西小路3号大厅前天井遗存水井

西小路3号大门

建筑，坐西朝东，沿街而建，原三进，现存二进，合院式，屋面硬山式，阴阳合瓦，石板铺地。大厅五开间，每间七柱九檩立中柱，明间、北次间和梢间前槽单步已毁。前天井中遗存一水井，井圈外侧有题刻，地面以上可辨“腾□ 崇祯元 司马”。这是该处唯一一件有纪年文字的实物。从井圈题刻判断该水井于崇祯元年所修，“司马”何人暂不明。座楼五开间，每间五柱七檩立中柱，带前后廊单步，前设天井，南、北披厢各三开间。建筑布局严谨，后期有局部改建，已经修缮的部分保存较好。查阅《绍兴县城区地籍图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发现，西小路3号原门屋一间和后天井，及西小路正对面一小间屋宅都记业主为刘姓公堂，此处应是刘氏居住和家族聚会议事的场所。

据“瑞吉次子子名谱行畢五之后徙居夏履桥者，其子孙行第皆自为叙，称夏履桥分宗。此外又有武林分宗，始于第六世；西小路分宗、紫金街分宗，始于第九世；江桥分宗，始于第十一世”[19]，西小路一带确有刘氏一族分宗。又据《绍兴县城区地籍图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小路北端还有一组规模不亚于胡家台门的建筑登科台门(今西小路103号)，业主多为刘姓，以西有刘氏名下一片杂地与胡氏田荡相接。据现场调查，登科台门为清代早期建筑，坐西朝东，共五进，屋面硬山式，阴阳合瓦，石板铺地。门屋三开间，每间四柱六檩立中柱。大厅三开间，明间四柱八檩五架抬梁，前卷棚式，后双步；次间五柱八檩立中柱，前后梁架同明间，南、北厢房已重建。座楼三开间，每间五柱七檩立中柱，带前后廊单步，南、北厢楼各三开间。第四进也是三开间座楼，明间四柱七檩五架抬梁，前后单步带前廊单步；次间五柱七檩立中柱，前后梁架同明间，南、北厢楼各二开间。第五进已毁。据台门内刘氏后人刘永康(现年76岁)回忆，台门因其祖上父子登科赐名为“登科”，原第三进正中“神堂”有供奉祖宗牌位。祖辈传给他的父辈及堂兄一代还有三亩二分八毫杂地一块。另外，《绍兴县城区地籍图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中送嫁池南侧与武勋坊路之间也有坐北朝南数间屋宅，业主为刘姓。可惜这些建筑现已不存。《水澄刘氏家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记载西小路分宗至十六世，认为刘氏后人至少到清代早期还有不少在西小路一带聚居，可以推测刘宗周迁居武勋坊的两年应是借住西小路分宗之宅，将此处刘氏聚居之地作为女儿的娘家，才因此留下送嫁池“为嫁女儿而掘”的传说。结合建筑年代，西小路3号确有可能是刘宗周曾居地。

(三)陈思石宅的“刘宗周故居”考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曾查访刘宗周讲学遗迹，并分别为解吟轩、石家池等作诗。作诗前有《朱绵之解吟轩当蕺山之左，念台先生主讲地也，今为比丘所居》《石家池当蕺山之右，亦念台先生主讲地也，暇日过之，有作》的题记。但清光绪十八年(1892)《绍兴府城衢路图》标注“石家池”“里石家池”在蕺山西面，与全祖望的“蕺山之左解吟轩”“蕺山之右石家池”题记表明的解吟轩与僦居之所陈思石宅均在蕺山东麓方位正好相反，因而不可采信。

(四)蕺山小楼与西街18号的“刘宗周故居”考

万历三十一年(1603)刘宗周还居绍兴城中，没有自己名下的屋宅，生活也十分拮据。《姚谱》记万历三十五年(1607)：“承重守制，居丧之暇，假馆于大善寺僧舍，进宗人戚属而授以举子业，教学者一准规矩，出入进退，具有成度。……先生饔飧不给，岁贷米于大善寺僧，取之如外府。然恒越一年必偿其值。方偿毕而复贷，如是者二十载。”[20]“至官仆少时，夫人始以纺绩之余置田二十亩，得免贷米事。”[21]回城中后，

西街 18 号门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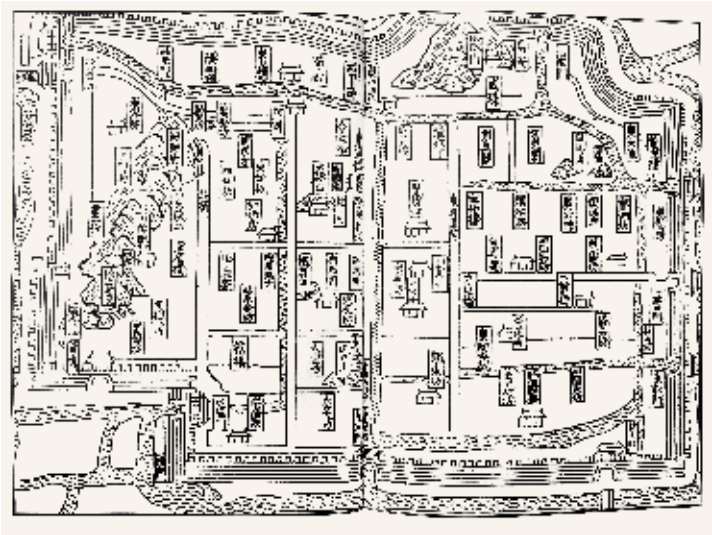
西街 18 号大厅后天井遗存水井

西街 18 号大厅

刘宗周曾在大善寺借住两年，并贷米二十年，直至天启三年(1623)官至太仆寺少卿后才有余钱置办田地，不再贷米度日。因此认为天启三年(1623)以前刘宗周所居都是借、租的暂居之所，此后或有可能营建家宅。

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二年(1639)等，刘宗周陆续为宗族置办祠田、祭产，其间有记："崇祯八年、十年，越郡饥。……先生所居昌安坊即以所积为社仓损益旧法行之，一坊遂无饥者。"[22] 崇祯年间，刘宗周已有些积蓄，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建筑小楼于昌安坊。"父没，遂杜门绝人事，坐卧蕺山一小楼，竟二十年。"[23] 清顺治二年(1645)刘宗周殉节后，其子刘汋也回到小楼静修，直至康熙三年(1664)辞世。清代藏书家杜煦在《王刘两先生祠会序》中写道："忠介(刘宗周谥忠介)祠蕺山下临书院，山麓即故居，后嗣一线幸存，祠尚清……"[24] 表明刘宗周祠、蕺山书院与"故居"三者的紧密位置关系，并明确了该处即刘宗周故居。蕺山东昌安门内为昌安坊。昌安坊自元代增设，属山阴县界西北隅 30 坊之一。据《府城厢坊图》[明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刻本]，昌安坊位于蕺山东麓一片，戒珠寺以东，因 20 世纪 80—90 年代昌

西街 18 号增建座楼及披厢



《府城厢坊图》[明万历十五年(1587)《绍兴府志》刻本]

安立交桥和中兴路的建设，该区域的传统民居建筑多数已不存，仅蕺山历史文化街区中保留部分。

西街 18 号位于蕺山历史文化街区东端，背靠蕺山，坐北朝南，传始建于明代，现存为清代建筑遗存。原二进，现第三进座楼为后期增建，合院式，后院上山可通往原蕺山书院。门屋三开间，明间四柱五檩立中柱。大厅三开间，明间四柱九檩五架抬梁，前后双步，南、北披厢已改建，后天井中遗存一水井，井圈留有“牛鼻孔”。建筑用材和做工普通，因后期改建较多，现状保存一般。据调查采访第三进户主章荣庆（现年 71 岁）及其家人得知，章氏祖上是刘宗周外祖章颖。20 世纪 60 年代，西街 18 号（曾记门牌为 16、18、20 号）由刘家后人转让给章荣庆大祖母和祖父。儿时，章家祭祖会一并祭祀念台大人。章氏后人与西街 18 号老邻居们共同回忆，当时沿街大门为竹丝门，明间石门框出（入）。天井正中石板铺地，左右各有一块泥地。厅堂明间地面铺有方砖，檩下正中自南向北依次悬挂“一代完人”、刘念台事迹牌匾及神像牌位。1966 年夏天，两块牌匾被抬走，后下落不明。门屋西首原立有 1 米多高的“明末遗臣刘念台先生故里”石碑，在街区路面整治时被拆除，现在仅留基座。

原“明末遗臣 刘念台先生故里”碑基座

西街 18 号典让字据

西街 18 号典让曾立字据，内容是：“缘我们共有祖遗坐落西街十六、十八、二十号房屋一所，计楼屋叁间，平屋陆间，披屋柒间（原捌间，倒坍壹间），曾于一九三六年间出典与章景洲（倬夫、杰夫的父亲）居住。至今三十年之久，只以经济困难，逾限未赎。现在私有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依然无力赎回。我们兄弟协商，情愿放弃该出典屋的所有权，归典主所有。事出自愿，决不翻悔。恐口无凭，立此为据。此致。胡阿杏、章杰夫典主存照。立字据人：刘德钤、刘德钫。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立。”据查《绍兴县城区地籍图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戒珠寺前业主刘德钤等的屋宅范围、字据中“计楼屋叁间，平屋陆间，披屋柒间（原捌间，倒坍壹间）”的描述和西街 18 号现存建筑格局一致。《水澄刘氏家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记载，立字据人刘德钤、刘德钫为水澄刘氏小宗二十一世，是刘宗周第七代曾孙。绍兴著名文史专家陈惟于先生曾与绍兴酱业名人刘振一之女在省立绍中同窗求学，始知刘合兴酱园是刘氏后裔开设，更指出刘宗周故居确在蕺山脚下之西街。［“刘合兴酱园草创于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该酱园老板刘静甫经过多年打拼，设法盘进开设在大木桥的俞

和兴酱园及其分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刘合兴酱园迁至绍兴最繁华的水澄巷。……刘静甫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取名刘振一,他将刘合兴酱园及其所有分号如数归划刘振一的名下。”[25]结合以上文献、现场调查与采集的口述历史记录,西街 18 号应是蕺山小楼旧址所在。

《水澄刘氏家谱》[刘应桂、刘锟鼐主修,刘德钤等编纂,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记载水澄刘氏一至二十一世世表,梳理如下:

一世　文质二子(瑞卿、瑞吉)

二世　瑞吉(小宗)二子(子方、子名)

三世　子方三子(谦、谨、训)

四世　谨三子(玘、琪、珩)

五世　玘四子(铎、钺、鋈、鉴)

六世　铎三子[济、泽(迁居新河)、汉]

七世　济三子[概、枏、楙(出继)]

八世　概三子(煇、焞、恢)

九世　焞三子(坡、瑛、瓒)

十世　坡一子(宗周)

十一世　宗周一子(汋)

十二世　汋四子(茂林、士林、长林、道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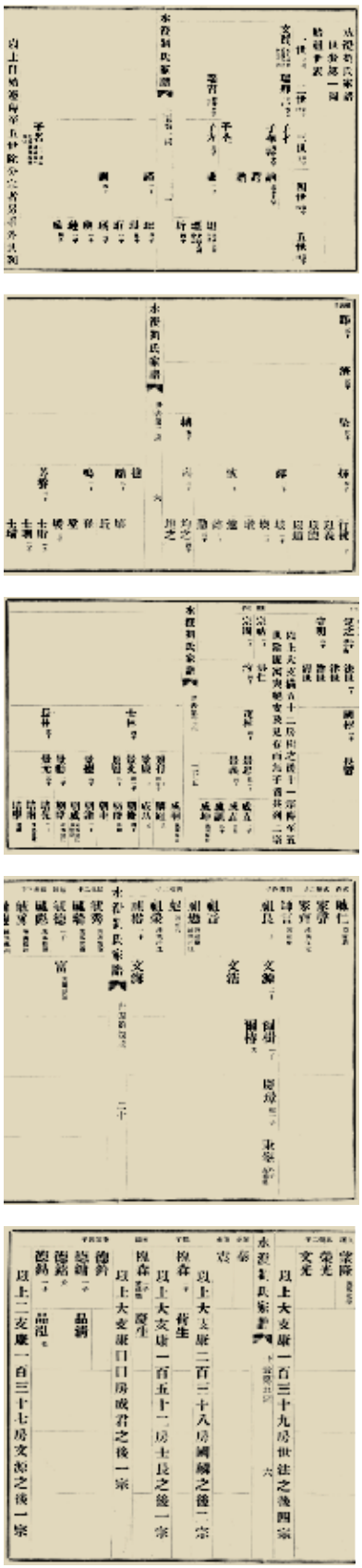
十三世　士林四子(景文、景贤、景德、景勋)

十四世　景文(继景贤一子朝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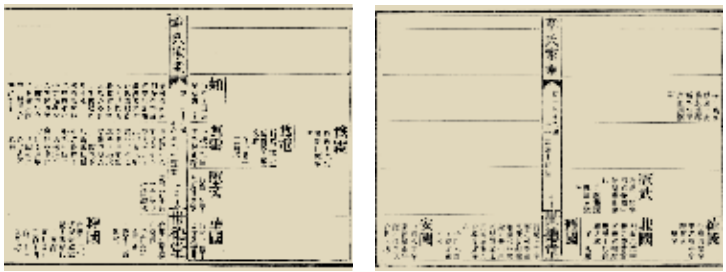
十五世　朝俊四子[师言(原祖年)、祖良、祖音、祖懋(原祖德,流寓松江)]

十六世　祖良二子(文源、文浩)

十七世　文源二子[尔楫、尔椿(夭)]



《水澄刘氏家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水澄刘氏一至二十一世世表



《会稽偁山章氏家乘》[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活字印本]关于刘宗周外祖章颖的记载

十八世　尔楫一子(庆璋)

十九世　庆璋(继大受一子秉鋆)

二十世　秉鋆四子[德铃、德镛、德铭(夭)、德钫]

二十一世　德铃、德镛一子(品清)、德钫一子[品泓(夭)]

《会稽偁山章氏家乘》[章贻贤主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活字印本]记载刘宗周外祖章颖、后人章景洲至章荣庆世表梳理如下:

曾祖　景洲二子[倬夫(妻胡阿杏)、杰夫]

祖　杰夫二子[光祖、小儿(夭)]

父　光祖三子(荣庆、伟成、伟康)

孙　荣庆、伟成、伟康

四、总结

经考,刘宗周绍兴府城旧居主要有四处:一是祖居及出生地水澄巷;二是暂居地武勋坊,推测为西小路一带刘氏分宗之宅西小路3号;三是僦居地陈思石宅,在蕺山东麓;四是筑楼地及故居,西街18号蕺山小楼旧址。只有武勋坊西小路3号和西街18号的故居(旧居)建筑遗存至今。西小路3号已由原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登记为绍兴市文物保护点,并于2002年公开挂牌;西街18号于2021年由越城区文物主管部门登记公布为越城区文物保护点。

刘宗周的理学思想是晚明理学的一首绝唱,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其守正不阿、勤俭内省,更是一位留下"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次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绝命诗的忠贞之士。乾隆皇帝在为《刘宗周黄道周集》题序时,评价他为"一代完人"。刘宗周曾在绍兴城中多处居住、讲学,是绍兴人文思想和社会教育事业的重要建设者。希望对其故居(旧居)的辨明,可以为日后进一步探寻刘宗周在绍遗迹和刘宗周遗迹的保护利用提供依据和思路。

注释:

①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第四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76页。

② 张能耿,盛鸿郎,单家琇编著:《越中揽胜》,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82页。

③ 张能耿,盛鸿郎,单家琇编著:《越中揽胜》,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82页。

④ 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第1468页。

⑤ [明]刘宗周纂修:《(浙江山阴)水澄刘氏家谱》,明崇祯八年(1635)刻本。

⑥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83页。

⑦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07页。

⑧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12页。

⑨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24页。

⑩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26页。

⑪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26页。

⑫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54页。

⑬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65页。

⑭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55页。

⑮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67页。

⑯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四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466页。

⑰ ［明］萧良干修；［明］张元忭，孙鑛纂；李能成点校：《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⑱ 《绍兴市志》（卷五第三章），绍兴市人民政府网。

⑲ 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第1469页。

⑳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122页。

㉑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49页。

㉒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4页。

㉓ 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573页。

㉔ 杜煦：《王刘两先生祠会序》，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547页。

㉕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绍兴老字号企业协会编：《绍兴老字号》，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50—51页。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性质及诸陵位置蠡测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雷长胜

摘　要：历来对宋六陵诸陵的位次研究，侧重于“次”即诸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和排列规则，多认为是由东南向西北顺次排列；而对于其“位”的研究则仅限于各陵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不能确定其绝对位置。本文尝试以考古发掘的一号陵园遗址为切入点，通过推测其性质，进而依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判断诸陵的具体方位。

关键词：宋六陵　南陵区　一号陵园　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陵

一、缘起

宋六陵位于绍兴市富盛镇，现青龙山水库西北、绍兴师专旧址以南，整体地形为山间盆地，北为雾连山（宝山），西南为紫云山，西为五峰岭，东为青龙山，正南通常认为是《康熙会稽县志》中记载的“新妇尖”。陵区内南宋帝陵有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及度宗永绍陵六座，故称宋六陵。另有宋徽宗永祐陵和祔葬的宋哲宗废后孟氏等七位皇后的陵墓，共“七帝七后”。平陶公路东西向横贯而过，将陵区分作南、北两区。南陵区整体“东南仰高、西北低垂”，符合赵姓的“国音姓利”之说；北陵区位于雾连山山脚，北高南低。依据明清史料及近现代地表遗迹，曾将宋六陵划分为若干保护区（图一），其命名仅供参考。

图一　宋六陵原各陵保护区位置图

元初，宋六陵遭杨琏真迦盗掘，毁坏殊甚，理宗顶骨被截为“饮器”。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将理宗顶骨归葬，并以浙江献上的《绍兴诸陵图》为蓝本，重树碑石，但“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今亦颓废。理宗陵有顶骨碑亭”[①]。近现代又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陵区先后被充作劳改农场、养鸡场、茶场。现南陵区地面建筑无存，只能以日益稀少的松树为参照物。目前对宋六陵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思陵录》《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等历史文献资料的解读，探讨诸陵的排列次序和相对的位置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有孟凡人等对攒宫及石藏结构的研究[②]，刘毅、刘未、郑嘉励等对诸陵位次的研究[③]。因每座帝陵分上宫、下宫，并有各自的围墙，是相对独立的区块，另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总数量远远大于现地表可确认的遗迹分布区数量，增加了确认某一处遗迹性质的难度。以南陵区为例，多数学者认为南陵区共有徽、高、孝、光4位皇帝的上、下宫及6座后陵，而目前可确认的遗迹分布区(有或曾有松树分布)仅5处。目前对宋六陵的“位次研究”，侧重点在于“次”，即诸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和排列规则，多认为昭慈孟皇后陵及徽、孝、高、光四帝陵由东南向西北顺次排列；而对于“位”仅限于各陵之间的“相对位置”，不能确定其“绝对位置”。换言之，原十处保护区中，除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外，其余八处的陵墓主人身份均存在较大争议。一号陵园、二号陵园的考古发掘及前期的调查与勘探，为进一步探讨南宋诸陵的具体位置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一号陵园的性质推测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宋六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与发掘，于2008年年底完成了一号陵园(原“高宗陵”保护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该遗址的中轴线建筑布局和垣墙范围，发现享殿和龟头殿、门殿及其正前方疑似望柱的遗迹，并探明了石藏墓室的具体位置与规模，基本判定一号陵园遗址为某座帝陵的上宫或皇后陵基址。[④]

七座帝陵中，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的位置虽相关记载较少，但并无争议。明清史料均指向北陵区，且有“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残段于2006年7月在永穆陵附近发现，拼合后藏于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⑤]关于宁宗永茂陵位置，本文基本同意刘毅先生的观点[⑥]，应位于“徽宗陵”保护区附近，其北的“徽宗后陵”保护区应为宁宗杨皇后陵，或两个保护区分别为后陵与下宫，宁宗上宫位于其东偏南方向。文献载永茂陵“冈峦怀抱，气脉隐藏，朝揖分明，落势特达……今神穴坐壬向丙，亦与国音为利益”[⑦]。赵姓属角音，据《地理新书校理》“角音，壬向坐丙穴，亥子为案，水出戌亥中间”[⑧]，是为角音大利向；“角音丙向，水流坤出，安坟在壬”[⑨]，为角音小利向。北陵区原“徽宗陵”保护区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西北高东南低且落差较大，正是坐壬向丙的角音小利向，该地地表仍有清代补种之松树，经勘探确认附近确有遗迹分布。而徽宗永祐陵与南宋早期诸陵相对位置关系在《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等文献中有多处明确记载，应在南陵区无疑。故本文认为南陵区分布有昭慈圣献孟皇后陵、徽宗永祐陵(显肃、宪节、显仁三后祔葬)、高宗永思陵(宪圣慈烈吴皇后祔)、孝宗永阜陵(成肃谢皇后祔)和光宗永崇陵，一号陵园只能是其中之一，而考古发掘材料与史料均无法直接证实一号陵园主人身份，故逐一分析各陵与一号陵园对应的可能性，从而间接确定一号陵园性质。

(一)高宗永思陵

一号陵园所在区域曾被命名为“高宗陵”保护区。可以说

“一号陵是不是高宗陵”是考古发掘人员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周必大《思陵录》中附有官方的工程照会，记载永思陵上宫“殿一座，三门六椽，入深三丈，心间阔一丈六尺，两次间各阔一丈二尺。并龟头一座三间，入深两丈四尺，心间阔一丈六尺，两次间各阔五尺……殿门一座，三间四椽，入深两丈，心间阔一丈六尺，两次间各阔一丈二尺”[10]。其中一尺约合31~32厘米[11]。

《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公布了一号陵的平面布局和详细数据：享殿台基东西宽15.3米，南北进深12.1米，根据磉墩的分布判断享殿建筑为三开间，明间柱心距约5.2米，两次间柱心距约3.7~3.9米，进深方向柱心距约3.0~3.2米；享殿以北的龟头殿东西宽10.7米，南北约7米，龟头殿之下的石藏平面近方形，边长约9米；门殿东西宽14.4米，南北进深8米，门殿基址东西排列四个长方形磉墩，中线间距离分别为3.515、3.890、3.812米，亦为三开间。

经计算并对比，一号陵园享殿、龟头殿平面布局及磉墩的柱心距与《思陵录》的记载基本吻合；一号陵园垣墙发掘了北、东、南三面，西围墙压于现代路面之下，按建筑遗迹中轴线东西两侧垣墙长度相等计算，与《思陵录》所载永思陵“红灰墙周回长六十三丈五尺”亦大致相当。而一号陵园门殿三个开间均接近一丈二尺，与《思陵录》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参考一号陵园建筑复原研究的结论，门殿屋顶可能为单檐歇山顶，而《思陵录》记载永思陵门殿为“直废造”，即一般认为的悬山顶。[12]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南宋陵寝制度多是“依某帝（后）体例施行”，故多有形制相似者，所以一号陵园并非高宗永思陵上宫。若一号陵园为永思陵，也与《中兴礼书》记载的永思陵与永祐陵相对位置关系（下文详述）不符。

（二）光宗永崇陵、昭慈孟后陵、徽宗永祐陵及祔葬后陵

依据历史文献及宋代赵姓的“国音姓利”理论，南陵区最西（偏北）侧为光宗永崇陵，最东（偏南）侧为昭慈孟后陵，次为永祐陵，目前对宋六陵诸陵位次的研究对其相对方位亦无分歧。故只需确定一号陵园西北及东南另有陵墓分布，即可排除一号陵园是永崇陵和永祐陵的可能性。

2013年，在对一号陵园西北，原“哲宗孟后陵”保护区范围调查时曾发现石圹结构[13]，应为另一石藏，光宗李后别葬于临安府的寺院中，故光宗永崇陵在“哲宗孟后陵”保护区或再向西北方排列，不可能在一号陵园。2019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一号陵园以东的原“宁宗陵”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按顺序暂编号为二号陵园，发现了较一号陵园规模更大的建筑基址，初步判断为某帝陵下宫遗迹，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因哲宗昭慈孟后御容崇奉于泰宁寺，南陵区无其下宫，徽宗永祐陵下宫即为南陵区最东（偏南）侧下宫，应在二号陵园或其东南方向，昭慈孟后陵亦在二号陵园东南方向，一号陵园不可能是永祐陵或昭慈孟后陵。祔葬永祐陵的三座后陵在永祐陵西偏北，与一、二号陵园间距不符，且据《中兴礼书》记载三座后陵神围方25步（1步约合1.6米），与一号陵园神围约35步不符，遂排除。

（三）孝宗永阜陵

孝宗永阜陵位置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按行使副孙逢吉、吴回言：荆大声等相视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神穴在永祐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那趱向南石板路上，乞差官覆按施行。诏副之。先是，按行使赵彦逾言：判太史局荆大声等相视，神穴合在永思之西。缘其地土肉浅薄，虽民有献者，又皆窄狭与国音相妨。乞于永思之西向南近上安建。朝廷未以为然。”[14]

光宗永崇陵“神穴系在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委是国音王气秀聚之地，依得尊卑次序，可以安建……遂从之”[15]。

文献中永阜陵与其他各陵的相对位置关系较明确，历来并无

争议，即高宗永思陵位于徽宗永祐陵西北方向，孝宗永阜陵位于二者之间偏北。若一号陵园为永阜陵上宫，则有诸多矛盾之处：1. 虽永祐、永思二陵具体位置暂不能定，如前文所述，永祐陵下宫只能在正在发掘的二号陵园或其以东（南）区域，而永思陵又在一号陵园以西，则徽、高二陵间距至少 300 多米，孝宗永阜陵因为地形所限而选址于二者之间，高宗永思陵选址时亦不可能为后世的孝宗预留如此大的空间。另据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永思穴心在永祐穴心之西 100 余步[16]。2. 因永崇陵只能在原“哲宗孟后陵”保护区或再向西北方排列，均在一号陵园西北，若一号陵园为永阜陵，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永崇陵在永阜陵西不相符。

一号陵园与孝宗永阜陵均位于南陵区中心位置，但二者难以对应。

（四）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陵、孝宗成肃谢皇后陵

除前文已排除的诸帝后陵外，南陵区仅有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和孝宗成肃谢皇后两座后陵，《思陵录》记载永思陵上宫附属建筑“土地庙”和下宫附属建筑“庙子”均有龟头建筑，可知龟头献殿非皇帝攒宫独有，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一号陵园有可能是两座后陵之一。

据《宋会要辑稿》“礼三四”记载：

“修奉使司言：今来修奉攒宫，并依显仁皇后体例施行。所有皇堂石藏，省记得显仁皇后石藏里明长一丈四尺八寸八分，阔一丈三寸，深九尺。若依此铺砌，窃恐至期安下神杀外椁，空分窄狭，事属厉害。照得高宗皇帝石藏里明长一丈六尺二寸，阔一丈六寸，深九尺，欲乞依上件丈尺修奉施行。从之。”[17]

从以上记载可知，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陵石藏内壁长宽是参照高宗永思陵铺砌，石藏外椁（文献所称擗土石）和垣墙（神围）的尺寸是否参照永思陵上宫修建并无明确记载。北宋帝陵上宫神墙方 150 步，后陵方 65 步，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神宗钦圣献肃向皇后因听政展作 75 步。南宋昭慈圣献皇后及帝陵上宫方 35 步，显肃、宪节、显仁陵因北部地势低下，神围由方 35 步缩减为 25 步[18]。若非地形限制，祔葬永祐陵的三座后陵神围亦为 35 步，神围大小可依据实际情况随意调整。另外，《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记载：“寻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册夫人韩氏为皇后，撤帘。”[19]宪圣慈烈吴皇后历经高、孝、光、宁四朝，曾短暂垂帘，又有北宋先例可依，神围 35 步合理，亦合礼。

孝宗成肃谢皇后陵形制也可能与一号陵园相近，其位置应在永阜陵正北或西北，若与一号陵园对应，则永阜陵与其他各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均与文献记载不符，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在南陵区其他各陵均被排除的情况下，暂且认为一号陵园为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陵。

三、南陵区诸陵位置推测

以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陵（一号陵园）为基点，重新讨论南陵区各陵的位置（图二）。

图二　南陵区各陵位置假想图

首先可确定：

（一）高宗永思陵上宫位于一号陵园正南或南偏东方向，永思陵下宫位于一号陵园正北或北偏西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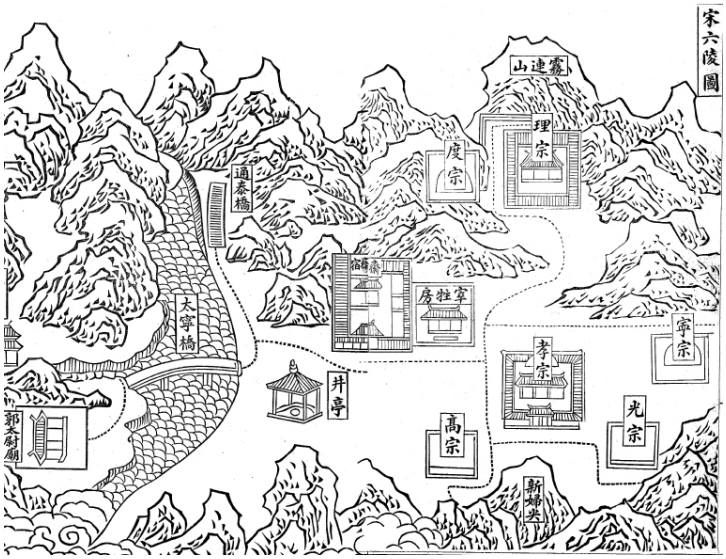
（二）光宗永崇陵上宫在原“哲宗孟后陵”保护区（调查时发现石藏），永崇陵下宫则位于上宫正北或北偏西方向。

（三）徽宗永祐陵和祔葬后陵在今二号陵园发掘区及其以南（若二号陵园为孝宗永阜陵下宫，则各陵相对位置关系的记载皆不成立，故只能是徽宗永祐陵下宫）。

（四）哲宗昭慈孟后陵在二号陵园东南约 200 米，靠近青龙山水库。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航片中，二号陵园东部偏南约 180 米（两区域中心距离）处有一片清代补种的松林，平面呈方形，方向与二号陵园基本平行，现地表植被为茶树，仅余一棵松树树桩，曾被命名为“光宗陵”保护区。此处若为昭慈孟后陵，与二号陵园下宫之间的空间不能容纳徽宗上宫、显肃、显仁及宪节四座陵墓，应是徽宗永祐陵上宫遗址，昭慈孟后陵另在其东南。

（五）孝宗永阜陵。60—70 年代的航片显示，在一、二号陵园正中另有一片松林，即原“孝宗陵”保护区。现地表仅存现代补种的小松树，其位置已向东偏移，根据二号陵园中轴线计算，该地块现在的东边界可能在二号陵园下宫范围。另据《中兴礼书》记载，永祐陵下宫曾扩建，将殿门改为前殿，在南侧另建殿门。二号陵园的发掘至今仍未发现垣墙，故二号陵园以北可能有一重大殿，现在发掘的只是下宫的一部分。如此，孝宗永阜陵位置在一、二号陵园正中略向北移，与原“孝宗陵”保护区小部分重合。成肃谢皇后位于永阜陵正北（或偏西），在现代的厂房之下。永阜陵下宫“于永思陵下宫之西修盖”[20]，在永思陵下宫以西或西北方向。

图二对各陵位置的复原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因角音大利向的南陵区无地可择而转至角音小利向的北陵区，光宗永崇陵以北及以西区域地形应有较大落差。近现代曾多次平整土地，依常理平整后不同区域间的落差应减小，而 20 世纪 50 年代攒宫养鸡场图和现在的地形仍可见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厂房以北、原“哲宗孟后陵”保护区以西地势有较大落差，可供参考。再次对照《康熙会稽县志》宋六陵图（图三），“高宗”“孝宗”相对位置无太大偏差，“宁宗”亦是在南陵区的东北部，是否仅仅混淆了“徽宗”与“光宗”？



图三 《康熙会稽县志》宋六陵图

因宋六陵遗址的考古发掘仅限于陵园建筑，并不涉及墓穴本体，故难以直接确定各陵位置及身份，本文仅是在现阶段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对各陵所在位置的推测及对未来工作方向的思考。诸陵的位置和排列次序，也只是南宋皇陵考古发掘及研究的一小部分。上下宫的形制布局、古建筑的复原、两宋陵寝制度及其背后风水观念的转变和南北文化的融合，都需要不断探索。

注释：

① 《万历会稽县志》卷十四《祠祀之属三曰宋陵》，明万历三年（1575）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② 孟凡人：《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布局》，《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009年第6期，第30—54页。其中对永思陵石藏子复原中，底版石的铺砌范围可能有误，据《思陵录》记载的底版石数量及尺寸计算，底版石总面积与石厢壁及其以内的部分面积大致相当，即胶土和擗土石下无底版石。

③ 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第67—82页；刘毅：《南宋绍兴攒宫位次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第52—62页；刘毅：《关于宋宁宗永茂陵位置问题的再思考》，《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第90—97页。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2008年第三辑，第165—189页。郑嘉励：《南宋六陵诸攒宫方位的复原意见》，《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第63—68页。

④ 李晖达等：《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第85—93页。

⑤ 周燕儿：《绍兴宋六陵出土的明敕葬宋理宗顶骨碑考略》，《东方博物》第三十三辑，第24—27页。

⑥ 刘毅：《关于宋宁宗永茂陵位置问题的再思考》，《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第90—97页。

⑦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三七《宁宗永茂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71页。

⑧ ［北宋］王洙等编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⑨ ［北宋］王洙等编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⑩ ［宋］周必大：《思陵录》，《文忠集》卷一七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

⑪ 郭正中：《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⑫ 李松阳等：《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建筑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第140—152页。

⑬ 李晖达等：《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第85—93页。

⑭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三七《孝宗永阜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70页。

⑮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三〇《光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00—1401页。

⑯ 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2008年第三辑，第175页。

⑰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三四《宪圣慈烈皇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19页。

⑱ 刘未：《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说》，《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2008年第三辑，169—172页。

⑲ 《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

⑳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三〇《孝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0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绍兴文博. 2021 / 绍兴博物馆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22.10
ISBN 978-7-5508-3878-9

Ⅰ. ①绍… Ⅱ. ①绍… Ⅲ. ①文物工作－绍兴－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绍兴－文集 Ⅳ. ①G269.27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93223号

绍兴文博 2021　　绍兴博物馆 编

出 品 人：江　吟
责任编辑：朱晓莉
责任出版：李　兵
责任校对：徐　岫
装帧设计：浙江越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社　　址：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E 座 5 楼（邮政编码：310014）
电　　话：0571-8724307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238 千
印　　张：10
印　　数：001—500
版 印 次：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8-3878-9
定　　价：60.00 元